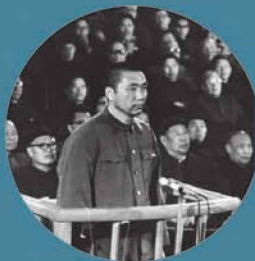


#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

MASSES TYRANNY AND POLITICAL SPECULATION :  
WANG HONGWE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

王洪文與「文革」（上）



從保衛幹部到主席接班人，  
從權力巔峰到政治深淵！

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廣大革命群眾的頭腦，  
只有這樣才能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把這場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王洪文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

MASSES TYRANNY AND POLITICAL SPECULATION :  
WANG HONGWE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

王洪文與「文革」(上)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德]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王洪文在辦公室



左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秀珍



王洪文在毛澤東書房



1973年，王洪文在機場迎接外賓



1973年，王洪文迎接法國總統蓬皮杜



1973年8月，王洪文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1976年，王洪文在毛澤東逝世追悼會上（右一）



王洪文在法庭



王洪文在法庭（左二）



##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sup>1</sup>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sup>1</sup>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sup>2</sup>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sup>3</sup>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sup>2</sup>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sup>3</sup>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sup>4</sup>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sup>5</sup>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

<sup>4</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sup>5</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sup>6</sup>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sup>6</sup>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sup>7</sup>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sup>7</sup>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sup>8</sup>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sup>8</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sup>9</sup>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sup>10</sup>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sup>11</sup>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sup>12</sup>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sup>9</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sup>10</sup>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sup>11</sup>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sup>12</sup>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sup>13</sup>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sup>14</sup>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sup>15</sup>。《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sup>13</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4</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5</sup>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干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則在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 目次

##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11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5
體例說明.....	021

## 025 | 1967

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1967.1.7.）.....	027
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澈底批臭（1967.4.7.）.....	032
大長革命人民志氣，大滅敵人威風（1967.6.18.）.....	034
整掉不良的作風（1967.7.12.）.....	036
來一個革命大聯合的新飛躍（1967.9.20.）.....	038
堅決貫徹「鬥私，批修」的戰鬥號令（1967.10.3.）.....	041
王洪文在上海工代會上的講話（1967.12.22.）.....	043

## 049 | 1968

王洪文在上海南市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68.3.10.）.....	051
王洪文談清理階級隊伍（1968.4.11.）.....	055
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開展對敵鬥爭大會」上的講話（1968.6.24.）.....	057

## 069 | 1969

王洪文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發言（1969.4.14.）.....	071
-----------------------------------	-----

## 073 | 1973

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 大會上報告，8月28日通過）.....	075
--	-----



## 081 | 1974

王洪文、江青就印發北大清華彙編《林彪與孔孟之道》給毛澤東的信 （1974.1.12.） .....	083
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1974.1.14.） .....	083
江青、王洪文在「內蒙乒乓球隊兩位革命小將反對領導弄虛作假遭打 擊報復」的材料上的批示（1974.2.21.） .....	098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首都文藝工作者的講話（1974.5.23.） ...	100
王洪文「長沙告狀」前寫給毛澤東的信（1974.10.8.） .....	101

## 103 | 1975

王洪文、江青對文化部電影局有關人員的講話（1975.4.4.）（存目） .....	105
---	-----

## 107 | 1976

王洪文在平谷縣的講話節錄（1976.10.3.） .....	109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 1976.10.18；中發〔1976〕16號 .....	109
中共中央批轉中聯部等單位《關於對涉及「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影片、 電視片、戲劇、畫片和書刊等問題的處理意見》1976.10.23；中發 〔1976〕18號 .....	116
馬天水的揭發交待（1976.11.5.） .....	117
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待（1976.11.5.） .....	126
王秀珍的揭發交待（1976.11.6.） .....	156
馬天水的補充揭發交待（1976.11.21.） .....	173
徐景賢的補充揭發交待（1976.11.21.） .....	191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 一）》的通知及附件1976.12.10；中發〔1976〕24號 .....	213
王洪文研究論文 .....	278
「文革」研究文獻 .....	280
後記 .....	304

1967

---



## 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1967.1.7.)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王洪文發言】

紅衛兵戰士們，革命造反派戰友們，同志們：

上海市委究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轟動全國的「安亭事件」，已經給它做出了明確的結論。

去年十一月中旬的「安亭事件」，標誌著上海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海工人的革命造反隊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中誕生了！全市、全國的革命造反派都為之歡欣鼓舞！就在革命人民的一片歡呼聲中，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澈底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真面目。

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瘋狂地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把炮口對準中央文革，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鎮壓工人運動和一切革命左派。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走到盡頭了，已經起了質的變化了。

我以萬分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發陳丕顯、曹荻秋一夥在「安亭事件」中，反對毛主席、對抗中央文革、圍攻張春橋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 （一）殘酷鎮壓工人的革命行動，瘋狂反對兩個「五項要求」

去年十一月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準備成立，它預告了上海工廠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上海市委的老爺們，頑固地抵制了這股革命潮流。早在成立大會之前，就有幾位工人同志找了當時在交大的馬天水，馬天水說要回去研究研究。在大會前夜，又有四位工人代表到康平路找曹老爺，曹荻秋明明在書記處，但推說不在，由別人出來擋了一下。在大會的那一天，市委負責人一個都不去聽取工人群眾對市委的批判，態度如此惡劣，就是想把這個革命組織扼殺在搖籃裡。

上海市委一手策劃了鎮壓革命工人的「安亭事件」以後，中央文革

小組及時派張春橋同志來到上海，正確處理了「安亭事件」。十一月十三日，張春橋同志在文化廣場簽署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五項要求。張春橋同志自文化廣場回來後，躲在書記處的曹荻秋大為不滿，恨恨地說：「難道我們都錯了?!」當時在場的馬天水、王一平都不同意簽字。第二天早上，曹荻秋還在書記處大發牢騷，說什麼：「春橋一簽字，我們就被動了！」

十五日，張春橋同志和韓哲一、曹荻秋又在蘇州共同簽署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控告隊的五項要求。這個簽字，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果。當時，曹荻秋拒不簽字，而且公然叫囂：「我準備讓他們把我押到北京去。」張春橋同志對曹荻秋展開了兩個小時的激烈鬥爭，最後，張春橋同志嚴肅地指出：「你不簽字，我簽。」這樣，曹荻秋才被迫最後簽了字。

## （二）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瘋狂對抗中央文革小組

十三日，張春橋同志在文化廣場簽字後，回來就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陳伯達同志回電完全同意張春橋同志的做法。十四日，中央常委開會，正式肯定了張春橋同志的處理。過了兩天，彙報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已經知道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也同意了張春橋同志的做法。這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對我們工人階級最大的支持和最崇高的鼓舞！

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常委開會的情況，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上海市委都是知道的。但是，陳丕顯、曹荻秋一夥，竟喪心病狂地進行對抗。請看事實：

十三日，文化廣場簽字後，張春橋同志剛給陳伯達同志打了電話，陳丕顯，這個隱藏在幕後的指揮人物就親自上陣，代表他和魏文伯、曹荻秋三個人也打電話給陳伯達同志。陳丕顯在電話裡態度極壞，一口一個「為什麼」，提出了很多責問：「到底中央文革給了張（指張春橋同志）多大權力」呀，「他為什麼不同我們商量」呀！等等。針對這種猖狂的態度，陳伯達同志嚴肅地指出，要讓張春橋同志大膽地處理這個

問題，要相信張春橋同志，給他這個權。陳丕顯、曹荻秋一夥，十分害怕這句話，對市委常委都不敢轉達。十多天之後，在張春橋同志的責問下，曹荻秋才在常委會上簡單地說了兩句。

張春橋同志在簽署第二個五項要求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曾給上海市委打來電話，表示支援。市委的黑打手——辦公廳一室主任蘇超，拿了王力同志的電話記錄稿，在王一平面前公然露骨地謾罵，他說：「王力支持春橋五條，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爺們自己下來處理問題吧！」這是什麼話？這是反革命的叫囂！堂堂的市委書記王一平，居然在這種反革命的叫囂面前，一聲不響，一言不發，這完全證明你們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路貨色！

特別嚴重的是，陳丕顯、曹荻秋等人，狗膽包天，竟然敢封鎖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聲音，封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聲音。十四日中央常委開會同意張春橋同志的處理，十六日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上海市委一直沒有傳達。等到張春橋同志返京的前一天（二十四日），市委常委會上還沒有傳達。在那天的會上，張春橋同志質問市委為什麼不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意見，同時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會上宣布。就在會上，曹荻秋竟然還公開想不通，說什麼「組織上可以服從，思想上不通，我有保留」。同志們！大家想一想，這是一種什麼行為？這是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的行為！曹荻秋，你回答，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你是十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以敢這樣猖狂！

### （三）召開市委常委會圍攻張春橋同志，惡毒攻擊和誹謗工人造反隊，形成在上海出現了炮打中央文革的一股逆流

就在張春橋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正確處理了「安亭事件」離開上海的前一天，陳丕顯、曹荻秋一手策劃了所謂常委擴大會，實行白色恐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對張春橋同志進行圍攻。這是一次典型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鎮壓革命群眾行為、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會。這次常委擴大會表明，上海市委已經變質了，已經爛掉了，已經

變成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了。

在會上發言的市委書記和常委老爺們，一致把矛頭對準張春橋同志，對準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現在，就讓我們把他們的黑話拿出來示眾吧：

曹荻秋胡說什麼：「我思想是不通的，承認這個組織我是可以的，但為什麼要把『由華東局、上海市負完全責任』也寫上去？對一部分不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對工人說清楚，你們不能支持這批人，如果你們要這麼做，對你們政治上不利。」

這是對工人造反隊的惡毒攻擊，就是想把工人造反隊打成反革命！

王一平胡說什麼：

「那次簽字（第一個五條）是使得我們一點沒有準備，沒有充分認識可能會帶來什麼問題。要別被動為主動，在這個問題上主動了，在大量問題上又被動了。那天春橋同志一回來，我就感到突然。」

市委社教辦公室負責人楊慧潔說了一套混帳話：

「多數派實際上是聽我們話的，他們對荻秋同志的答覆不滿意，要找春橋同志，說張春橋怕死，出賣了工人階級利益。工作隊的話，多數派是聽的，問題上工作隊思想還沒有扭過來。」

「多數派的老工人有階級感情，對黨感情很深。」（春橋同志立即指出：「不能說造反派工人對黨就沒有感情。」）

市委工業生產負責人周璧帶有挑釁性地說：

「……紛紛責問市委：張春橋、韓哲一、曹荻秋為什麼要簽字？這樣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條？問題提得很尖銳。……還要求召開萬人大會，聲討市委的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指兩個五條的簽字），還要採取革命行動，搗毀造反司令部。」「要找張春橋辯論。」……

市委組織部長楊士法說：

「工廠企業有它的特點，正在搞四清，職工隊伍比較複雜，有地、富、反、壞，肯定會有人翻案的。學生根本不瞭解情況，如果沒有階級觀點，就上當了。」（張春橋同志立即頂回去：「你不能強調這一點，現在學生在調查他們的歷史，不要把學生的覺悟估計過低了。」

張春橋又說，不能因為一個組織中有幾個壞人，就說它不是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中間也會有壞人，中央常委中不是還有牛鬼蛇神？）

常委、副市長宋季文在會上用幾個生產數字的概念威脅張春橋同志，他說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最艱苦的準備，亂無非大亂、中亂、小亂，小亂就像眼前這樣，影響百分之十，中亂影響就大些，大亂就影響生活，成為癱瘓狀態。究竟怕不怕？不怕就不怕，讓它亂。」

常委、副市長張承宗說：

「搞一條、五條，實際上影響了生產。是不是可以這樣搞下去，方針究竟怎麼樣？思想上當然要準備大亂的。」

（春橋同志指出：「今天上海之所謂亂，不是因為有了這個司令部才亂的，不能因果顛倒，因為亂才有司令部，不是因為有了司令部才亂。」他又明確地說：「承認這個組織，不僅是憲法上已有規定的問題，還有個對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你去解散



它，豈不成了陳獨秀？」）

在會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西光還大肆污蔑革命群眾。

一個常委會，真是醜態百出！

大家看：他們究竟在開什麼會？是什麼黨在開會？他們在幹什麼？是在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還是在搞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復辟呢？就在他們的叫嚷下，市內出現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罷張春橋的官」的黑風。

十分明顯，「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變質為資產階級司令部。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市委書記處到常委，沒有一個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沒有一個人支持中央文革，沒有一個人支持張春橋同志。對於這樣一個受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動路線指揮的司令部，我們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爛它！

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

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sup>16</sup>

## 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澈底批臭（1967.4.7.）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吹響了從政治上、思想上澈底打倒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戰鬥號角。

戚本禹同志揭發的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黑話，充分暴露了他那一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醜惡嘴臉。什麼「中國不

<sup>16</sup> 上海《工人造反報》，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剝削得越多，功勞越大，就越光榮」，「勞動人民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如果資本家多了，剝削多了，那麼，我們就感到舒服」，這真是混帳邏輯，把我們工人階級的肺都氣炸了。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諄諄告誡我們：「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我們最關心偉大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最關心保證我國永不變顏色。我們絕不允許這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繼續招搖撞騙，要堅決把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拉下馬，讓他靠邊站，把他澈底批臭！

我們要揭露他背著毛主席盜用職權，網羅黨羽，搞全國範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大陰謀，把他在上海的黨羽，澈底鬥倒，鬥臭。

我們要澈底批臭他提出並全力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澈底揭發他和他的黨羽在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們要澈底揭露他幾十年來的反動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總帳。特別要清算他和他的黨羽為上海反動資產階級服務，迫害上海工人階級的罪惡活動。

我們要澈底批判他的反對革命、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奪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修養》，澈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

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我們認清了中國的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質，我們要更加堅決地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中國的赫魯曉夫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他挑撥離間，大搞群眾鬥群眾，我們就堅決按毛主席的指示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他要保護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義黨徒，搞「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我們就堅決執行毛

主席的幹部政策，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他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虛偽的處世哲學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來腐蝕我們，我們就堅決照毛主席的教導，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革命作風。

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我們要發動一場人人動腦、人人動口、人人動筆的搞臭中國的赫魯曉夫的群眾性批判運動。

我們上海工人階級最最崇拜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最最熱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世界革命的偉大導師，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黨內頭號資產階級代理人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要澈底批倒他，澈底搞臭他，讓他永世不得翻身！<sup>17</sup>

## 大長革命人民志氣，大滅敵人威風（1967.6.18.）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王洪文】

激動人心的消息傳來：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這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這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輝煌成果！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最最熱烈地歡呼這一偉大勝利！

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份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都是可以解決的。」正是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光輝

<sup>17</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們終於克服了製造氫彈的各種困難，提前實現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發展原子彈、氫彈的偉大號召。

我國第一顆氫彈的爆炸成功，大長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修、反的威風。這一偉大勝利，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英勇進行抗美救國戰爭的越南人民，支持了正在反抗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這一偉大勝利，對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總決戰的關鍵時刻，第一顆氫彈的爆炸成功，對於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極大的鼓舞，對於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狠狠的當頭一棒。第一顆氫彈的爆炸成功，還大大加強了我國的國防，進一步鞏固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氫彈是核武器當中最厲害的武器，現在，中國人民已經掌握了。但是，我們有更厲害的精神武器，這就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林副主席說：「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我們掌握了這樣的精神原子彈，就能戰勝一切敵人，就能創造出一切人間的奇跡！

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大好形勢下，興起了一個更大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澤東思想指引著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出現了新局面。我們上海的工人革命派正積極貫徹執行市革命委員會《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決議，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進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開展本單位的鬥批改。在這舉國歡慶的日子裡，我們決心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並肩戰鬥，為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而奮鬥！<sup>18</sup>

<sup>18</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

## 整掉不良的作風（1967.7.12.）

編者按：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在一些革命群眾組織中，特別是某些負責人身上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等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就暴露出來了。它干擾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影響鬥爭的大方向。

克服這些錯誤思想，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面臨著的一個重要問題。要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把它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整風認真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這樣，我們的隊伍才能真正成為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的革命大軍，才能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澈底勝利。

\*\*\*

經過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經處於掌權的地位。政治地位的變化，在我們隊伍中出現了兩種情況：大多數同志能夠以毛澤東思想為指標，不斷地改造世界觀，提高思想覺悟，密切聯繫群眾。但是，也有些同志的思想作風起了一些變化。

有的同志滋長了驕傲情緒，以左派自居，不善於聽取群眾的意見，特別是聽不進不同意見。動不動就給別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奪權」的帽子。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說什麼「我是掌權的，大聯合也得聽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幹部政策來識別幹部，而是以對自己的「好」、「惡」來作為是否能結合的標準。有的人存在著嚴重的無政府主義，不要無產階級的組織、紀律，為所欲為。

這些不良傾向的存在，干擾了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影響

大批判的深入開展，妨礙抓革命，促生產，削弱和損傷了革命組織的戰鬥力。

我們要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狠抓世界觀的改造。毛主席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們絕不能認為革命造反派掌了權，就已經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就沒有改造思想的任務了。恰恰相反，政治地位改變了，對我們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過去不當權，有了錯誤影響還小一點。現在當權了，如果不注意改造頭腦裡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它就會頑強地表現出來，干擾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狠抓世界觀的改造，大破資產階級世界觀，大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在頭腦裡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進行整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改造世界觀行之有效的辦法。毛主席說：「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那種認為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正確的，用不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論的。

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辦了很多好事，作出了貢獻。但是，我們絕不能以左派自居，擺起架子，打起官腔，驕傲起來。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之所以能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了權，並不是靠哪一個人或哪幾個人，也不是靠拳頭和棍子，而是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靠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革命群眾。同樣，我們掌權以後，也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虛心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批評，永遠當群眾的小學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去掉沾染在身上的政治微生物，才能得到廣大群眾擁護，才能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果我們的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掉以輕心，脫離群眾，甚至反過來壓制群眾，發展下去，就會犯方向路線的錯誤。

當然，革命派內部的互相批評，應該是善意的，和風細雨的，是首先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毛主席指出：「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堅決反對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復；也反對一批評，就不分青紅皂白，不分主流支流，而把對方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因為這樣做，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

一年來鬥爭的實踐，使我們深深體會到：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我們就取得勝利，就能飛快地前進；只要我們稍微離開毛澤東思想，離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會犯錯誤，就要遭到挫折和失敗。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緊跟毛主席，就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不斷地向我們頭腦裡的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把我們的隊伍建設成一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的隊伍。<sup>19</sup>

## 來一個革命大聯合的新飛躍（1967.9.20.）

當前，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上海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在革命大批判的推動下，上海市閘北、楊浦、普陀等區的工人兩派組織，都已經聯合起來了。其他各區、各單位、各工廠也都積極地準備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全市八千多個工廠，已經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占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現在，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的工人，正在以最大的革命積極性，積極創造條件，來一個革命大聯合的新飛躍，在革命大聯合的新高潮中迎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

<sup>19</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向我們發出了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是一個偉大的戰鬥號令，是對我們工人階級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愛護，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讓我們千遍、萬遍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的這個最新指示，立即聯合起來幹革命，聯合起來搞生產，聯合起來築成一道不可摧毀的長城，讓帝、修、反、一切牛鬼蛇神無縫可鑽，在我們強大的力量面前發抖吧！死亡吧！

我們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的衝突。鬧分裂，搞武鬥，這絕不是什麼「革命行動」，而是上了階級敵人的當。階級敵人在製造工人之間的對立，在混水摸魚。我們千萬不要上當。我們只要實現革命大聯合，就會把敵人暴露出來。

可是有些工廠、企事業單位，為什麼不能聯合起來呢？

有的說，「你們是保守派，大方向錯了，不能聯合」。這種講法是不符合當前形勢的。經過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經過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深入揭發、批判，參加過保守組織的絕大多數受蒙蔽的群眾，已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現在，在上海，作為保守組織來說，是極個別的了。現在工廠中，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絕大多數都是革命組織，他們的大方向絕大多數是正確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革命的歷史是在前進的，群眾永遠是革命的。各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一定要做革命大聯合的模範。頭頭思想不通，廣大戰士就去促進他大聯合；如果頭頭頑固不化，那麼廣大戰士就踢開這塊絆腳石，自己搞大聯合。

有的說，「我們兩派分歧大，情緒對立，聯合不起來」。我們工人隊伍中的各革命組織，不要分什麼「東家」、「西家」，我們只有一「家」，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家；不要分什麼「張派」、「李派」，我們都是一派，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工人階級生的一條根，牽的一條藤，我們同命運，共呼吸，心連心，都在毛主席領導下搞文化大革命，搞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又有什麼對立情緒不能



消除，有什麼矛盾不能解決，有什麼理由不能聯合起來呢？

有的說，「你檢查錯誤以後，我與你搞聯合」。這也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各革命群眾組織之間，應該求大同，存小異。我們工人階級應該有廣闊的胸懷，要責人寬，責己嚴，要多看對方的大方向，多想對方的優點，找自己的缺點，多作自我批評。各革命組織應該把舊賬一筆勾銷。對自己的階級兄弟算舊賬，是一種報復行為。如果要算，這些舊賬應該統統算到階級敵人頭上，統統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賬上，統統算到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上。我們要聯合起來，對他們進行大批判，大鬥爭。

有的組織，總想吃掉另一派，壓垮另一派。他們抓住對方某些缺點錯誤，無限上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想以此整垮對方，「一統天下」。這是辦不到的，也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樣做，就是大聯合的阻力。每一個革命組織，都要正視現實，實事求是，要敢於承認對方也是革命派，既然肯定對方大方向是正確的，那麼，就大膽地承認，主動地搞大聯合。

我們工人階級是親兄弟，有共同的愛，也有共同的恨。我們無限熱愛的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我們憎恨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是以蘇共領導集團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一切階級敵人。我們完全有力量、有信心揭穿階級敵人分裂工人隊伍的陰謀，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掃清各種阻力，排除萬難，立即實現革命的大聯合。<sup>20</sup>

<sup>20</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

## 堅決貫徹「鬥私，批修」的戰鬥號令（1967.10.3.）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王洪文】

歌聲震天，捷報頻傳。全國億萬人民滿懷革命激情，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熱烈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輝煌勝利。就在這個光輝節日裡，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傳達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的「鬥私，批修」的最新戰鬥號令。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工人同志們，堅決貫徹毛主席的這一偉大指示，一千個照辦，一萬個照辦。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不僅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連同他們所販賣的種種修正主義謬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而且要同自己頭腦裡的「私」字作鬥爭，奪「私」字的權，改造人的靈魂，促進思想革命化。我們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陣地。

鬥私和批修是互相聯繫的。只有鬥私，才能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派性，樹立無產階級的黨性，從而搞好批修。只有鬥私，才能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戰勝資產階級世界觀。敢不敢鬥私，是鑒別真假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試金石。我們一定要用鬥私來保證批修，用批修來推動鬥私，以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澈底勝利。

「鬥私，批修」的最銳利武器，就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經過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被揪出來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已經樹立起來，這是最最偉大的成績，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貢獻。回想去年國慶日時，中國的赫魯曉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還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曾幾何時，這些貌似強大的傢伙，在革命的風暴中統統被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拉下了馬，打翻在地。

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建立了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創造了欣欣向榮的新局面，取得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新勝利！

在進行這場翻天覆地的偉大鬥爭的同時，也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極大地鍛鍊和壯大了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成績千條萬條，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最大的普及，我國革命人民的政治覺悟得到空前提高。我們上海工人階級，遵循毛主席「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教導，遵循林副主席「要把自己當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時又要不斷地把自己當作革命的對象」的指示，在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的同時，也狠鬥自己頭腦中的私字，在靈魂深處鬧革命，掀起了以整風精神大學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各單位普遍開辦了毛主席著作學習班，許多基層組織都逐步形成了天天讀毛主席著作的良好風氣，如饑似渴地學習。許多同志學了就用，在行動中堅決貫徹，努力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加強無產階級的黨性，從而使自己能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排除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影響，牢牢地掌握了鬥爭大方向。

最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了上海，這是我們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我們工人階級最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幹。根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們迅速掀起了一個革命大聯合的新高潮。我們工總司所屬十個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已實現了革命大聯合。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三結合，本單位的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等也出現了新的躍進。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輝煌勝利，是大學毛主席著作的結果。

放開眼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向前進。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來進一步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堅決地「鬥私，批修」，澈底剷除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實現思想革命化。我們一定要緊跟毛

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乘大好革命形勢的東風，高歌猛進。<sup>21</sup>

## 王洪文在上海工代會上的講話（1967.12.22.）

我們上海這一次工代會的召開，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從思想上、行動上落實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們工代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地位；特別是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等地區所作的一系列對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我們要堅決地貫徹，不折不扣地執行。張春橋同志曾經跟我們講過，他說：你們這個隊伍你們這個組織抓什麼？他說第一個要抓思想教育；第二個要抓階級鬥爭。如果你們不抓這兩條，你們的壽命不會長的。所以我們覺得從當前來說，如何把學習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希望同志們能夠像林副統帥教導我們的那樣，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一定要做到這一點。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是要依靠我們鐵路系統的廣大造反派和廣大革命職工群眾一起解決。特別是要通過毛主席著作的學習，用最高指示來解決我們鐵路系統的問題。這是我們工代會的第一個主要任務。

第二個任務就是狠抓階級鬥爭，也就是張春橋同志歷次跟我們所講到的，如果我們不抓階級鬥爭，我們的生產就沒有辦法搞好。我們上海經過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立了我們的臨時權力機構，奪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權。今年來，鬥爭逐步深入了，把深入我們黨內政府裡一小撮走資派以及叛徒、特務等等逐步逐步地揪出來了。最近在工作當中，我們許多同志發現農村政治部有一些人不是處處為造反派講話，而是處處在保。一部分同志認為這樣不對，就起來造反了。一造反

<sup>21</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以後，裡面揪出了五個叛徒，原來要解放的，是那個劉傑（音）。這個人看來也要打倒了。今年三、四月份以後他們大肆活動，到了南匯他說南匯的李均（音）是十個縣最好的一個縣委書記。部分群眾上了他們的當，就保。這樣就把真正的革命派打成保守派。到奉賢，他說那個曹漢林（音）是最好的縣委書記，因而又有一部分群眾上了當。所以，他走到那裡就幹到那裡，青浦的問題也同樣。農村一部分造反派殺出來以後，一些傢伙全部暴露了原形。這是一個例子。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那個舊市委的組織部長楊士法。這個老傢伙在十月份以前就準備解放了，認為這個幹部是比較好的，是可以結合的。結合給交大「反到底」的同學衝擊了一下，這個人有問題，這個所謂組織部長連黨員都不是，是個叛徒。最近總工會也揪出了一批，一共三百人都不到的總工會揭了一下就有幾個叛徒、特務。從張琪（主要頭頭）到施惠珍、周炳坤（音）等等，他們舊黨組裡面沒有一個是好的，有的是解放前參加地下黨被捕叛變自首了，出賣了組織的；有的是解放前表面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特務，然後解放前夕又伏下來繼續搞特務活動等等。這一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階級鬥爭是非常複雜、非常尖銳的，據我們瞭解（總工會）那裡面問題還大呢，還有現行反革命！最近我們揪了一個傢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還往香港、臺灣投遞我們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況。我們再看看舊華東局，那些人裡面究竟有幾個是好的？裡面大部分是十五、六級以上的，從魏文伯開始，一個個排下來，那裡面看來大部分人都有問題。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鐵路上面的。我們鐵路上竟然有人把一個特務派到長江大橋，就是那個嚴兆雄吧！嚴兆雄實際上是個特務，他企圖搗毀長江大橋。同志們想想，這不是階級鬥爭嗎！嚴兆雄已經抓了一個多月了，他不但企圖搗毀長江大橋，還在南京、全國各地搜集軍事情報，東西已被我們抄到了。就這樣一個人，居然有的同志把他當作親信，派到要害部門去。有的同志就被他們收買了，他給鈔票，我們有的同志竟然就要。人家從美國帶來的香煙伸手接過來就吸。同志們，這種煙你們都知道是誰吸的？我們鐵路上的階級鬥爭比有些部門要複雜得多，據我們知道鐵路上過去軍統特務、中統特務，都是由國民黨直接

掌握的一個部門，加上解放十幾年來一小撮走資派在我們鐵路系統的統治。

我想再舉個例子，同志們還記得南站八·二五的武鬥，你們不瞭解那裡面情況，所以要講清楚這個問題。余寶華是一個表現極壞的反革命家屬，他有兩個父親，被我們抓了，槍斃了。南站的武鬥，有個三次見過毛主席的老工人，竟然有人拿著長矛刺他一刀，就這樣講：「我再讓你去見毛主席。」我告訴你們，這個人以後一定要抓的。南站被打傷最厲害的是比較好的監督四類分子的小組長。說明我們鐵路上的階級鬥爭是很激烈的。

另外一點，當我們每一次要將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的時候，這裡面不是武鬥，就是磨擦，企圖多次轉移鬥爭大方向。我們每一次航向剛剛稍微跟上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都遇到敵人在裡面搗鬼。反正我總覺得這裡面有階級敵人在搞，有一小撮走資派在搞。春橋同志有次講話的時候講過這個問題。

我們鐵路系統裡面，有的人他的手南面伸到廣東，北面伸到北京。最近有一個叫黃盤林的被抓了，黃盤林所交待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上海局的問題，還牽涉到江蘇省的問題。最近上海抓了三個伸進江蘇的黑手，他們利用我們鐵路上的便利，幫助人家運送槍枝、運彈藥等等，造成了江蘇省的大武鬥。他們勾結了地、富、反、壞、右，把黑手伸到揚州、伸到常州、伸到南京，伸到無錫、蘇州，而且有他們一套罪惡計畫。我們今天抓了一個羅勝壽（音）和戚拯，就是這麼三個人（一個是黃盤林）。所以我們應該看到這場階級鬥爭是激烈複雜的。而這一些黑手呢？是鐵路運輸把他們包下來的，運槍枝彈藥包，人到哪裡去坐火車也包。誰包的我今天不講，同志們你們將來去揭。誰包誰負責，反正我這裡有材料，他們已交待了。

同志們，我們鐵路工人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在歷史上每一次革命運動當中，我們的鐵路工人都站在鬥爭的第一線。在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當中，我們把抓革命促生產的兩副重擔挑起來，作了貢獻。但是也應該看到，在我們的隊伍裡也混進了一批壞人。有那麼一些

單位就是壞人當道，還有的受到了一小撮走資派的委託在我們造反派內部搗鬼。我們廣大的造反派戰士，廣大的革命職工把階級鬥爭抓住了，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清理階級隊伍。在這次工代會過程中，我們先考慮的委員、常委，包括老的，很多從政治上做了一次澈底的審查。不管怎麼樣，隊伍不清，特別是頭頭不清，就不能打仗，要不你怎麼搞階級鬥爭呢？比如最近我們發現，有的抓叛徒小組本身就是叛徒。南市區的袁振林，是原來造反派負責人，是個強姦犯；盧灣區的王寶金（音）也是一個負責人，他造反到現在貪汙了八萬多元；化工間張已華是個反革命，專門搞打、砸、搶、抄、抓。還有個手工業局，最近抓了一個王文海（音），他到處搞槍、搞炮，而且跟伸向江蘇省的黑手有密切聯繫，企圖搞垮「工總司」。這些人怎麼辦呢？我們覺得都應該從組織上處理，統統清理出去，壞的該抓的要抓，該處理的要處理，該判刑的要判刑，該槍斃的要槍斃，毫不客氣。把混進我們隊伍裡的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表現極壞的反革命家屬，堅決清除出去，有些道德敗壞的也應該清理。

再一個問題，我想對當前鐵路局的情況提出我的幾點看法：我們應該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鬥私批修為綱，進一步從思想上鞏固我們鐵路系統的革命大聯合，促進革命的三結合和本單位的鬥批改。像現在這種情況，我們老是搞派。你要拉勢力，他要搞班子，不去研究黨的方針政策，這樣下去，階級鬥爭蓋子到什麼時候能揭開呢？不行的。所以我們提出來要清理隊伍，也只有這樣我們的三結合才能儘快地建立起來，才能夠把我們鐵路局的鬥批改搞好。這是一點意見。

第二點意見，有一部分同志過去跟著壞人，比如講嚴兆雄，甚至有的同志幹了些壞事，只要改正缺點、改正錯誤，甚至反戈一擊，把那些壞人壞事充分揭露出來，怕什麼！有些同志雖然犯了錯誤，但是只要認識，並能改正，每一個同志都應該歡迎，不應該打擊。

第三點意見，就是在清理我們的隊伍的過程中，必須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職工，清理隊伍。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清

理。不管你是哪一種力量，自己首先清理你那一種，那個組織。我建議同志們聯合起來！我們應該在清理組織的過程中體現我們大聯合，而且要體現思想上的大聯合。只有這樣，才能夠防止壞人趁機鑽空子，搗亂，轉移鬥爭大方向。

第四點意見，就是我們建議非鐵路系統的工人和各組織不要介入鐵路系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鐵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鐵路的廣大革命造反派和廣大革命職工自己來解決。

第五點意見，我們廣大革命造反派的戰士必須堅決貫徹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的偉大方針，在任何情況下面，我們都不能影響抓革命促生產。

在當前我們希望鐵路系統的廣大革命造反派戰士和廣大革命職工，在不久的將來把我們鐵路系統辦成紅通通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切實把我們這個隊伍建設成為一個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革命化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正像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那樣：「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我相信我們廣大革命造反派戰士和廣大職工一定會這樣做的。





1968

---



## 王洪文在上海南市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8.3.10.）

### 【摘要】

全國的形勢我們覺得很好，上海的目前形勢當然也是越來越好，階級鬥爭的形勢，就我們上海的階級鬥爭，是進一步深入下去了。我們全市繼去年十月份之後，特別張春橋同志從北京回來之後，整個形勢，階級鬥爭的形勢基本是這樣的，鬥爭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我們這個使我們要怎麼打就怎麼打，我們要打誰就打誰。階級敵人採取右的和「左」的干擾，這種就可以很快地排除，所以我們覺得從去年十月份以後，春橋同志回來給我們提出來最近我們抓階級鬥爭少了一些，因此干擾多了一些。但我們聽到這一指示以後，就檢查了我們的工作，就發現確實我們階級鬥爭抓少了，階級敵人對我們的干擾就大了，因此就抓得緊了，階級鬥爭先後對舊市委舊市人委機關，給狠狠的衝擊，通過衝擊，有些機關的階級鬥爭蓋子逐步揭開來了，就是抓叛徒特務、自首變節分子這項工作有了很深入更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對全市的流氓阿飛分子、投機倒把、給了狠狠的打擊，那就是用群眾專政的辦法，出動文攻武衛隊伍，對那些流氓阿飛分子狠狠地打擊。去年十二月份一個晚上抓了二十多。那麼我們打擊投機倒把，流氓阿飛不僅僅是打擊了這一小撮人本身，更重要的是通過打擊流氓阿飛、投機倒把抓到了一批現行反革命，抓到了反革命集團。去年我們十二月份還對各省市駐滬辦事機構，中央各部駐滬辦事處搞了查封以後，我們在那裡搜出了大量的彈藥槍支、電臺，把隱藏在上海十幾年的老特務也給揪出來了。所以通過一系列的抓階級鬥爭，實行群眾專政，充分發揮群眾專政的威力，使我們上海的新秩序穩定了，從市場到社會秩序各方面都比過去穩定下來了，所以階級鬥爭的形勢我們現在來看呢是比較主動的。階級敵人現在還弄不清楚我們又要刮一陣什麼風，我們刮一陣十二級颱風，又

刮一陣十二級颱風，所以它弄不清你們又要刮什麼風，不知道。今天我在這裡透露一個消息，最近又颳風了，因為不刮不行了，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所以我們又颳風了。你們最近兩天注意報紙就行了，階級敵人吶，我們狠狠地打擊敵人，它的氣焰就被我們打下去了、主動權就掌握在我們手裡了，我們不打擊階級敵人，他就會起來千方百計地干擾我們鬥爭的大方向。所以我們覺得上海階級鬥爭的形勢很好，那不僅是在這一方面，在工礦、企業、機關、學校都在進一步地清理自己的階級隊伍，就是以整黨建黨為中心，認真清理自己的階級隊伍，抓叛徒也是一個方面了，還有混進我們造反派內部的壞人都在認真地清理。同志們最近都看到了報紙上登了王寶全的事情，那傢伙是個大貪汙犯，一個張已華是化工系統聯絡站的一個頭頭，不僅是貪汙盜竊，而且帶領群眾搞打、砸、搶、抄、抓，搞階級報復。我們南市區出了個袁根林嘛，在這裡，同志們不要怎麼樣，袁根本的問題當然還沒有搞清楚，初步搞清楚他的問題就很嚴重了，所以我們南市區不是還有一個保袁聯絡站，還有一個打袁聯絡站，那些聯絡站已經撤銷了，那些混進我們隊伍的人，逐漸逐漸地揪出來了。前一時期有些人銷毀自己的檔案，私自把國家的檔案搶出來搞到別的地方去，甚至有的壞人就燒掉。對這樣一些人逐步給廣大群眾揪出來，過去誰製造武鬥的，也揪出來了。昨天我們在上海鍋爐廠開了個會，開了一個大型座談會，有幾百人參加，在這個會上群眾揭露出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到目前為止還在拼命的污蔑、漫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污蔑中央文革，攻擊姚文元同志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姓何的何史（音）這個傢伙是很反動的一個傢伙、是大學生，而且從去年二、三月一直在家混到今天，在這個廠裡一直沒人管，反動文章寫出來用大字報寫的，貼到門口沒有人去批駁，所以走資派廠長就支持一派打一派，他說你打人打得好、我就支持你打、見打人的時候他講什麼，專找共產黨人打，昨天當場被廣大革命群眾揪出來了，我們當場宣布他們靠邊，所以有些單位的壞人正逐步被廣大群眾揪出來，我們覺得鬥爭形勢是很好的，所以混進我們隊伍裡的壞人，那是極少數的，但不揪也不行，包括我們南市區，據我瞭解，有個別單位，

個別工廠，還有一些壞人，我們希望我們南市區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回去認真清理一下自己的階級隊伍。這是我想簡單的講一講上海的鬥爭形勢。

昨天春橋同志指示我們，當前抓什麼？抓哪幾項工作？春橋同志講：當前仍然應該以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學大用毛澤東思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那就是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了，今天早晨二點鐘左右春橋同志說的。所以看看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我們向同志們提了一點希望，希望我們全體代表同志們和我們全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應當在當前的鬥爭中，繼續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這個為綱，以鬥私批修為綱，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還應該根據市革命委員會的指示，堅持業餘辦，群眾辦這個方針，要大家動手，許多問題可以繼續通過學習班來解決，就通過學習班進一步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全區人民和無產階級革命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我們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徹底。學習毛主席著作最根本的問題，是要解決一個「忠」字，這使我們全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能成為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我們各個單位都應該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首位，就是在我們研究工作的時候，首先是研究學習毛主席著作，檢查工作的時候，首先應該檢查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布置工作的時候，首先布置這一條，所以我們應該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位置。這個位置絕不能顛倒，不管我們工作再忙，有多少，千頭萬緒，都應該首先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首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我們運動中的一系列問題，這是一點希望。

第二點希望我們代表同志們通過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廣大革命群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腦，就應該狠抓階級鬥爭，在一切工作中都應該注意隨時隨地去抓階級鬥爭，上面我講過了，階級鬥爭如果我們不去抓，階級敵人就會不時地向我們進攻，我們抓了階級鬥爭，主動權就會掌握在我們手上，這仗我要怎麼打就怎麼打，

不是講我怎麼打的辦法，敵人一干擾掉了，那就不行了，就應該主動地向階級敵人發動進攻，打進攻戰，不要打防禦戰，當然也不是每一個戰線都是進攻戰，那也根據毛主席的偉大教導，這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根據本區的鬥爭形勢，根據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來確定我們的戰術。我們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在我們狠抓了階級鬥爭，主動向階級敵人打進攻戰的時候，階級敵人的氣焰就不那麼囂張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鬥志就高漲起來了，有的時候我們不是說造反派灰溜溜灰溜溜的，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沒有抓階級鬥爭，有些保守勢力和走資派就來壓我們造反派，我們造反派灰溜溜的麼！是不是啊！所以我們這個希望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同志以及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同志都應該注意打主動仗，對來自右的和極「左」方面的干擾，我們覺得在通常情況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理你，吃准了我就狠狠的反擊。這樣，我們就可以掌握主動權了。最近問題裡面又出現的一種極「左」的思潮，也出現了右的反動思潮，比如說最近出現了一種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接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文章，他說過去幹部都是走進了資本主義道路和已經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幹部都是壞的，他這樣講嘛，通俗一點，就走過了和走進了資本主義這個範圍了，他說黨員不如非黨員好，非幹部比幹部好，這個反動論點，目前全市革命人民正在準備進一步批判。所以像這類情況，在市里已經好幾次了，對這樣一小撮階級敵人向我們反撲，向我們進攻，我們就應該廣泛的發動群眾堅決的反擊。我們希望我們南市區的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今天到會的所有代表同志能夠在下一步的階級鬥爭中，以階級鬥爭為綱，來帶動各項工作。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嘛，你不抓就不行，所以一個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第二個就是抓階級鬥爭，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這兩條。

最後一點希望，我們希望全體代表同志們要戒驕戒躁，再接再勵，在下一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為人民立新功。我們都是來自各條戰線上的積極分子，我們在過去的鬥爭中活學活用了毛澤東思想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我們應該牢記毛主席的教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

使人落後。」還應該繼續努力地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不僅我們自己要學好，我們要廣泛的向廣大的群眾宣傳毛澤東思想。繼續把各單位的學習班堅持辦好，在辦學習班過程中，在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我們希望同志們能夠不斷地總結經驗。同志們，我們相信我們南市區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人民，在今後的鬥爭中，一定會在革命委員會的正確領導下，在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人民的努力下，把我們區辦成紅通通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插在我們南市區的每一個角落。

## 王洪文談清理階級隊伍（1968.4.11.）

對清理階級隊伍要有組織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不可放任自流。

### （一）對清理階級隊伍的意見

對階級敵人我們是要堅決地清理，我們的決心早已下了，根據主席一六三個字的指示，是主動向階級敵人進攻。我們清理階級隊伍也就是向階級敵人打主動仗。但是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防止右傾保守思想，右傾翻案風，這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危險，如長寧區有個壞傢伙公開為赤衛隊翻案，還有反革命的案件，他們的矛頭直接的指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紡織系統有一小撮壞蛋，貼反動標語，還把什麼×頭殺下來等，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我們希望查一查，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要防止「左」思潮出現，夢想把造反派搞垮，顛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如交通運輸公司×××事件，我們說有錯誤可以檢查，但不准作為敵人來搞，攻擊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還有赤衛隊翻案，向造反派臉上抹黑，說什麼造反派過去裡頭有走資派在背後策劃。我看要揪出來鬥。



## （二）右傾分裂主義

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來揪壞頭頭，抓了一點錯誤缺點無限上綱，夢想分裂我們的隊伍，右傾翻案風，右傾投降主義是我們當前的敵人，我們不能輕視這些人，還有一些人過去是赤衛隊，後來也參加了造反派，而有一部分人的立場沒有真正轉過來，在當前右傾思潮中，也動搖起來了，這本來就是投機分子。我們要提高警惕，但多數是內部矛盾，要正確對待。

## （三）清理階級隊伍

指鑽進我們隊伍裡的壞人：1.按中央規定的公安六條；2.走資派、叛徒、特務、裡通外國；3.有嚴重的重大歷史問題還沒有弄清，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幹了不少壞事，要清理的；4.犯大量的貪汙盜竊和打砸搶抓的人要清理。但是犯有男女關係和貪汙幾百元錢的人一般不清理，但要交代好的。

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與一般錯誤的人要嚴格區別開來，歷史上有重大問題的人已經交待與隱瞞的人要嚴格區別開來，一貫反黨反人民與一時說過錯話的人要嚴格區別開來，犯有嚴重貪汙盜竊行為的與有嚴重投機倒把分子，一貫流氓腐化的人與一般小偷小摸和一般男女關係的人要嚴格區分開來，把走資派和犯有錯誤的幹部區別開來把鑽進造反派組織的壞人而一貫煽動武鬥的私立公堂的與老造反派犯一般錯誤的人區別開來。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但不屬於壞頭頭而不絕任領導職務的今後要適當調整，如不能擔任領導，但不屬於壞頭頭範圍內的要很好地區別對待。

清理階級隊伍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千萬不要粗心大意，嚴禁借清理階級隊伍搞分裂活動。如果有的話，各級組織要嚴肅處理。但我們不要派工作組下去包辦代替。我們說，清理階級隊伍要靠本組織造反派處理，不能由一派來搞，這會引起派性。加強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來搞，最好有三結合的班子，革命領導幹部，軍代表，最好有上級領導部門批准。凡是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暫不清理。

凡屬於內部問題的人要辦學習班來解決，要嚴格區別兩類矛盾，對於有民憤的人，而問題不十分嚴重，一般不能批鬥，嚴禁逼供信，即使是壞人，打死了也要處理。我們一定要掌握黨的政策。

我們在處理任何問題時，要慎重瞭解、核實，切不可粗心大意。同時不要輕信口供，如上海鍋爐廠，說什麼××人是新工總司參加者，其實不是。對於需要抄家的對象，不要輕意妄動，要經過批准、手續。對壞頭頭材料上報，要有實證，否則不批准，我們還要注意一些問題，對於個人性質沒有定的，不要隨便拋材料，更不要亂扣帽子。

（六八年四月十一日）<sup>22</sup>

## 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開展對敵鬥爭大會」上的講話 （1968.6.24.）

同志們、戰友們：

今天我們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大會，剛才××二廠、染化十一廠和酒精廠同志們介紹了許多很好的經驗。希望各區、各單位要很好地學習他們，如何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好的經驗，好的方法。根據這些好的經驗、好的方法，我想提幾點意見。第一點形勢大好，五月十九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北京新華印刷廠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重要批示，給我們工交戰線和各個戰線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以強大的思想武器。八日、九日兩天市革委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到會的同志學習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了全市革命人民進一步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進一步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我們工交系統的廣

<sup>22</sup> 河南二七公社豫西分社洛陽礦山機器廠四一六總部主辦，《文革通訊》，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四期共四版。

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的革命職工，通過學習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特別是學習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貫徹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的精神以後，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在總結前一階段的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已經進一步行動起來了，狠狠地打擊了一小撮階級敵人，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會上介紹的三個單位，已經說明了這一點。由於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廣大革命群眾，發動了群眾，穩、準、狠地打擊了一小撮階級敵人，因此在各條戰線上面一小撮階級敵人一個一個地被挖了出來，在這中間，革命的大批判也正在進一步地深入開展，形勢越來越好。各條戰線的工作，包括革命和生產，和各項工作都出現了朝氣蓬勃的景象，總的來說，形勢一片大好，我們從最近有些單位的經驗來看，說明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發動起來了。比如說上海有那麼一個辦事處，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們通過學習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毛主席歷來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學習，他們就在這四百多人的單位裡面揪出了一些國民黨的特務、叛徒等和國民黨殘渣餘孽二百多名，通過進一步地發動群眾，目前在全市許多單位隱藏的比較深的、比較久的、比較狡猾的一些階級敵人，被揪了出來。比如說有一個地區他們把曾經幹了六十多年特務工作的一個老傢伙揪了出來，有的單位把那個蔣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齡的秘書也揪了出來，把工賊頭子陸京士的小妹子，張聞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來，這說明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一小撮階級敵人，雖然他們隱藏的比較深比較久，但是他們也逃脫不了廣大革命群眾的眼睛。總的來說，我們通過前階段發動群眾已經取的了很大的成績，挖出了一些階級敵人。這裡我講的第一點，運動的發展還是不平衡的，總的來說有這麼幾種情況，就是通過前一階段發動群眾的面來說，特別是深度來說還是處於中間大兩頭小的狀態，一部分單位群眾發動的比較廣泛，比較深入，比如剛才介紹的單位以及有的局，比如化工局，上海外貿局等等，由於群眾發動得廣泛深入，因此就揪出了一些隱藏得比較深的階級敵人，在這同時他們的革命大批判也開展得比較好；大部分單位群眾已經基本上動起來了，有的也揪出來了一些階級敵人，有的揪出了已經暴露了的面上的階級敵人，但

是群眾發動的面還不是那麼廣，還不是那麼深，還需要進一步地廣泛地放手發動群眾；還有小部分單位群眾基本上還沒有動，其中有的階級敵人還在幕後挑動，蒙蔽群眾，製造分裂，有的個別單位，是篡奪了領導權，由於個別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他們就壓制群眾，掩蓋了階級鬥爭蓋子，使那個地方的階級鬥爭蓋子揭不開來。就是在一個單位裡邊運動的發展也是很不平衡的，所以我們要狠抓二頭，帶動中間。對於那些群眾還被壓制的、發動不起來的那些單位，我們希望領導應該採取有力的措施，要堅決地支持那裡的廣大的群眾，在這裡邊我也要說一下，要說明一下地區裡邊有一些組織不要都隨便插手，各系統所屬單位的對敵鬥爭，如果各個地區都插手各個工礦企業裡面的階級鬥爭，就容易被敵人鑽空子。還有一些里弄裡的群眾專政的組織，也不要干預工廠裡面的階級鬥爭，什麼時候，有什麼問題，可以通過組織，相互之間取得聯繫，大家共同商量解決，這是第一個問題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前階段鬥爭的新動向，要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新的特點和新的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是不会自行消滅的。當前革命群眾充分地發動起來了，但階級敵人呢？也在蠢蠢欲動，利用各種辦法進行破壞和搗亂，由於我們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牢牢地掌握了階級鬥爭的主動權，敵人呢，他就採取了更加陰險更加隱蔽更加毒辣的手段跟我們作拼死的鬥爭，也正像列寧早就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階級敵人向我們鬥爭的新的特點，我們前一階段初步的摸了一下，也還是很不全面。我們也希望各系統各單位在下一步的鬥爭當中，進一步地把它摸一摸，我認為有這麼幾點，當前階級敵人主要用，第一點就是造謠歪曲、迷惑群眾。有一小撮階級敵人，造出謠言，他們胡說什麼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現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說什麼「前一階段是整當權派，是搞走資派，而現在就要整群眾了！」也有的說我們執行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一些謠言。比如在浦東最近就傳出了在35歲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經過審查，都要過關，也有的說，在市區裡傳出來說，45歲以上都要審查，等等謠言。製造這

些謠言來企圖擾亂我們的陣線，轉移鬥爭大方向。他們有的以極「左」面目出現，亂打亂點名，把矛頭指向了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已經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風上有一些小問題的人，一小撮階級敵人就狠狠整這一些人來企圖轉移鬥爭視線。有的還說，這一次凡是參加過護工隊的一般隊員都要開除出造反隊，參加國民黨的一般黨員也要開除出造反隊，參加三青團的一般團員也要開除出造反隊等等。以上面的這些流言蜚語製造混亂來擾亂我們的陣線。也有那麼一些別有用心的傢伙，一小撮階級敵人，甚至把一些對他們知情的人揪出來，進行批判，進行鬥爭，企圖進一步壓制群眾對他們的揭發，或者他們打擊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階級敵人保護起來，也就是我們平時說的「丟車保帥」或者說是「丟卒保車」等等。比如我舉個例子：上海光學儀器廠，自從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以後，他們就回到廠裡邊揪出一批小業主，把一批早已被群眾監督起來的，地富反壞右揪出來鬥，打一頓，他們還說是什麼「最大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呢？他們這裡邊有真正的陰謀，狡猾的階級敵人還在他們幕後操縱著這個單位的造反隊，他們就這樣造謠或者打擊一般的一些人員來轉移鬥爭的視線，當然，對地富反壞右的鬥爭是應該的。但是我們市革委會擴大會議絕對沒有要你把主要矛頭對準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們更沒有要你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這一些小業主。他們企圖以這樣來掩護自己。有一些階級敵人呢，有意製造了一些小偷小摸來轉移群眾和領導的視線，比如有一個單位有一個問題嚴重的人，當群眾發動起來時，他自己害怕了，他採取了什麼辦法呢？他把人家的飯票、菜票、線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飯票，菜票，線票也拿掉，然後馬上再去報案，他說我的東西丟了，因此就煽動群眾要他去告狀，以這種污蔑方法來轉移群眾的視線。有些單位，還有些階級敵人蒙蔽了部分群眾去鬥爭一些站錯了隊的黨員、團員和一般幹部，企圖壓住這些人對他們問題的揭發。有的呢，一揭到他們的問題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傾翻案」，戴上頂大帽子，這是第二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呢，就是搞右傾分裂，策劃武鬥，兩派沒有聯合或者聯合不鞏固的單位，敵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資產階級派性，搞幕後操

縱，製造分裂、策劃武鬥。比如最近益民食品廠，他們單位揪出了一批特務，其中有的是國民黨特務，有的是日本特務，有的是一些漢奸走狗。他們這個單位，同志們不知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武鬥，但是他們最近兩派的頭頭通過了坐下來學習，他們揪出了一批敵人，各自首先把自己這派的壞人揪出來了。從這一些例子當中就證明了敵人是千方百計地利用一些同志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派性來製造武鬥，挑動分裂，來破壞當前的運動。那麼也有一些革委會審批的時候，在「工代會」審批的時候，在「積代會」審批的時候，沒有被批准，或對革命委員會，對工總司各級組織有些意見，因此以後階級敵人就利用這部分人來拉山頭，搞分裂，有的把矛頭直接指向各級革委會和各級聯絡站。最近輕工業局，就出現了一個地下聯絡站，據我們瞭解，這個聯絡站本身裡面就有那麼一批是壞人，有的是被各級造反隊清理出去的，有的一些同志是精兵簡政回單位去的，有一些意見，而被階級敵人利用了，因此呢，就搞分裂，企圖把矛頭指向輕工業局革委會，指向工總司。另外就有一些人就是借用清理階級隊伍這樣一個機會，就是你用的人他都去反，比如，有的一個聯絡站誰一上去他就反對，製造種種藉口，加以反對、歪曲。那麼有的還利用我們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在各個單位裡邊重新拉隊伍，成立什麼所謂戰鬥組。我們今天在這裡可以明確表示：我們不同意在工總司各級組織裡邊重新拉隊伍，成立什麼所謂戰鬥組，如果有人要成立他們的戰鬥組，那麼我們就奉勸這些人，你們退出工總司，不要做工總司造反隊員。也有一些人，企圖跟外地的有那麼一些來歷不明的人勾結串通起來，企圖分裂，大規模地分裂上海的工人運動，分裂上海的學生運動，我們在這裡要警告那一小撮階級敵人，你們的陰謀永遠也不會得逞，如果要賽一場的話就請你們表演，我們會對付你們的！（熱烈鼓掌）這些講的是第三種情況。

第四種情況就是製造事故，有的是製造破壞生產事故。比如最近有一個棉紡織廠，一個清花車間一共二十九個馬達，一次在同一個時間裡邊全部燒掉，這個廠有兩個班生產的布，全部是壞布，給國家損失了幾萬元。還有一個紡織廠，為了選擇一個工長，這麼一個小事，一群壞傢

伙就趁機挑動，挑動了這個布機車間有一千多臺布機停工兩個多小時。有的也製造兇殺事件，比如上海××廠出現了這麼一件兇殺事件，把一個剛從部隊回來的，五月份曾經見過毛主席的一個復員軍人，現在是他們廠革委會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給割斷了。從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小撮階級敵人絕不會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也必然會利用各種機會去挑動群眾來轉移我們的視線，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敵人總是利用各種辦法來對付我們的，正像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那樣，我們革命黨人必須懂得他們這一套，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以便戰勝他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根據當前的階級鬥爭的動向，我們希望各系統、各單位要進一步地放手發動群眾，嚴格防止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的破壞生產等各種重大事故，也要防止階級敵人逃跑、自殺，有的搞階級報復，在這同時也應該做好各個單位的安全保衛工作，特別是我們一些要害部門的安全保衛工作，這項工作我們建議不要由少數人去管，應在各級革委會領導之下，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來做好這項工作，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就說一下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當前我們的工作的重點，我們覺得還是要進一步放手發動群眾。第一點，發動群眾的關鍵在於領導，各級領導是不是敢字當頭，是能不能放手發動群眾的關鍵。據我們瞭解，在領導上面，還有這麼三種情況，一種是敢字當頭，敢於站在群眾運動的最前面，放手發動廣大革命群眾，相信依靠廣大革命群眾，向階級敵人作堅決的鬥爭，凡是這些單位的運動就搞得比較好，搞得朝氣蓬勃。第二種情況呢，就是按部就班，群眾起來了，對領導上促一促，領導就動一動，或者有的是勉強動一動，所以有的群眾就說，這種情況就是小腳女人踢足球不得力。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後怕虎，不敢放手發動群眾，甚至群眾運動起來以後，自己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給群眾訂了好多條條框框，比如有這麼一個單位，自從這次市擴大會議以後，群眾發動起來了，但領導不但不在運動的前面帶領廣大群眾前進，反而給群眾作了許多規

定，有的群眾要看本單位群眾的材料，他就講要看材料，要經過市革會的批准，我們就感到非常奇怪，我們看檔案材料是有規定，但是我們從來也沒有規定過，看基層一些黨員或者一般幹部群眾的材料，還要經過市革委會的批准。因此，造成群眾意見很大，所以有的單位把領導踢開了，自己鬧革命。所以有一些單位的領導當中還有著一些右傾保守思想。我們覺得這些右傾保守思想主要表現有這麼幾種，一種是一怕二等三看四要。一怕什麼呢？有二種情況，老幹部比如怕打擊面寬了，怕再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怕犯右傾翻案這樣一個錯誤，怕人家說他右傾翻案。不是化工局有這麼一個幹部就說，上一次我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已經是罪該萬死了，如果我再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那就更是罪該萬死了，我永世不得翻身了。有一些新幹部呢，也有些怕字當頭，一個怕丟自己的烏紗帽，好容易自己造反造了個官，丟了怎麼辦？有的呢，也怕自己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有的就講，如果我打擊面寬了，整人家整錯了，將來揪壞頭頭有我一份，所以我不幹。所以有的就講，抓抓生產比較太平，生產能夠抓上去，還能夠受到表揚，沒有成績也是如此，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所以還是抓生產太平。那麼二等呢，等上面的布置，上面不布置，他就不動。我們這樣講，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老早就布置了，問題就是我們自己沒有做，如果上面沒有具體布置，他就怕將來出了問題自己要負責任。三看呢，是看了別的單位有了經驗以後，我再搞，如果別的單位沒有什麼經驗，我們自己搞，擔風險，將來要犯錯誤。那麼四要呢，就是要辦法，要具體政策，要派小分隊，要軍管。也有的單位就講，北京新華印刷廠好是好，但是好就好在他們有軍管會。所有這些想法都是錯誤的。我們覺得不管軍管會也好，小分隊也好，它最根本的問題，是要依靠廣大的革命群眾，要放手發動廣大革命群眾才能夠搞這場階級鬥爭。如果離開了放手發動群眾，離開了毛主席革命路線，那麼就是有小分隊也好，軍管會也好，都不能解決問題。所以關鍵呢，還是發動群眾，相信和依靠廣大群眾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怕字當頭，怕犯錯誤，怕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也就說明有一些同志，他們對毛主席的革命路



線還沒有很好地學，還沒有真正的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毛主席教導我們：「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毛主席的這一最新指示就澈底揭露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個反動本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依靠國民黨的一些殘渣餘孽來鎮壓廣大的革命群眾，來保護一小撮走資派，保護一小撮階級敵人，目的是為了撲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烈火，復辟資本主義，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他們所代表的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我們現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是依靠了廣大革命群眾，來狠狠地打擊一小撮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是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目的是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這完全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它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本質的區別，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這場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進行到底。我們現在搞對敵鬥爭的群眾運動也可能會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也可能會錯傷一些好人，但是不管如何，我們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狠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如果我們能夠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把毛主席歷來一系列的對敵鬥爭的方針、政策和策略交給廣大革命群眾，我們完全可以克服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所以有一些同志雖然在這一次運動中被錯傷了一下，我們覺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應正確地對待。當然我們也應該說，如果有那麼一小撮階級敵人，有那麼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我們清理階級隊伍為名來搞打擊造反派，搞復辟，搞右傾翻案，那麼我們是要認真對付的。各級領導一定要從兩條路線的鬥爭的高度來分清大是大非，我們要像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幹部門合同志那樣，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放好哨，站好崗，打好仗，狠鬥私字，大立公字，要生為毛主席而戰鬥，死為毛主席而獻身。我們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顆紅心，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怕的，就能夠在對敵鬥爭中敢字當頭。這是第二個問題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要團結對敵。現在還有一部分單位兩大派的聯合還不是那麼鞏固，有的還在打內戰，搞武鬥，我們說這一些單位必須團結起

來，共同對敵，在對敵鬥爭中來鞏固大聯合。現在有的單位各自用資產階級派性來對待這場嚴肅的階級鬥爭，有一些同志對於對立的一派，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也要無限上綱，而對自己的一派裡面的一些壞人，即使是敵我矛盾也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不揪不鬥，這樣就給一小撮階級敵人鑽了空子。有一些同志被資產階級派性蒙住了眼睛，因此就掩護了階級敵人，敵人也還是利用了他們的資產階級派性，製造武鬥，挑動武鬥，來保護自己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各單位的造反派頭頭的高度警惕。同時我們還要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各方首先是揪出自己隊伍中的壞人。染化十一廠和上海科大他們的經驗我覺得很好。他們就是首先通過學習毛著，落實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首先統一思想，開展對敵鬥爭。然後自己首先揪鬥自己一派裡的壞人，或者是雙方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互相交換，集中起來，共同調查。這樣他們通過共同的戰鬥，揪出了一些壞人，他們的聯合就鞏固了。上面我們說的益民廠也是這樣。還有一些單位最近還沒有聯合，還在打內戰，這些單位的頭頭們，如果你們自己不是壞人的話，請你們想一想，下一步怎麼打算。這是第二點要講的。

第三點，能不能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是取得對敵鬥爭勝利的根本。發動群眾最根本的是要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去武裝廣大革命群眾的頭腦，要把毛主席歷來關於對敵鬥爭的一系列的理論、方針、政策和策略認真地組織群眾反復學習，切實掌握。廣大群眾都掌握了毛主席關於對敵鬥爭的理論、方針、政策和策略，就能在對敵鬥爭中發揮最大的戰鬥力，就能夠有最強的辨別能力，就能去發現隱藏得比較深的敵人，把他們挖出來，把一切狡猾的階級敵人挖出來，就能夠自覺地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就能夠把鬥爭的矛頭始終對準一小撮階級敵人。如果我們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無所謂去發動群眾。因此我們希望各個單位首先還是應該通過辦學習班等各種辦法，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最近有一些單位在這方面創造了不少好的經驗。比如有些單位舉辦了幹部的學習班，黨團員的學習班，老工人的學習班，或者是退休工人的學習班，通過學習班

的學習，進一步落實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通過學習毛主席親自批發的北京新華印刷廠的經驗，他們大憶廠史，大查敵情，通過大查大憶，就挖出了一些隱藏得比較深的階級敵人。也有一些廠，原來由一些小廠合併而成的，那麼這些單位呢，就把這些小廠的一些老工人，把一些對這些小廠比較熟悉的人集中起來辦學習班，通過辦學習班大家通過憶敵情，這樣呢，效果也很好。所以我們希望各級領導能夠在當前對敵鬥爭中狠抓思想工作，還是要堅持辦學習班，還是堅持業餘辦，群眾辦這個方針。通過辦各種類型的學習班，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廣大革命群眾的頭腦，只有這樣才能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把這場階級鬥爭進行到底。在發動群眾過程中，各級領導必須加強領導，發動群眾當中，各級領導不能滿足於一般的號召。要區別各種不同的情況，根據本單位的特點，根據本單位的具體情況，抓住活思想，作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只有我們抓住了活思想，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就能夠把各種積極性都充分地調動起來。當前主要注意的，就是第一點要把廣大的革命幹部，黨員、團員充分發動起來，因為他們對這一單位的階級鬥爭比較熟悉，有一些同志他們都有對階級敵人鬥爭的經驗，可以在這場運動中充分發揮他們的骨幹作用。因為有一批同志在運動初期有的站錯了隊，有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他們有的同志有這樣那樣的想，因此我們希望各級領導、各級聯絡站、各級造反派負責人都應當幫助他們提高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我們廣大的革命幹部，我們廣大的黨團員，也要勇敢地衝殺到階級鬥爭的第一線，在這場階級鬥爭中很好地接受鍛鍊和考驗，使之把我們鍛鍊成爲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上港十區革委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們在這次清理階級隊伍中，充分發動了群眾，充分地發動了廣大的革命幹部，廣大的黨員、團員，通過這樣的發動，使這些同志在這次鬥爭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二點是要發動一些老工人，一些退休工人。這些老工人和退休工人，他們對一些廠的歷史比較瞭解，他們對一些廠的老人馬都比較熟悉，而且他們的多數同志也有鬥爭經驗，也有不少單位在這些工作當中，他們通過啟發一些老年人，回憶對比，激發他

們對一小撮階級敵人仇恨，因此他們的積極性也就調動起來了，所以我們還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能夠發揮的力量都把他發揮出來，來共同地打一場人民戰爭。第三點，我就講一講如何區別對待的問題。最近據我們瞭解，有一些人，一些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人現在搞得比較緊張，有的也怕搞到自己頭上來。我們覺得，如果自己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而自己已經交代清楚了，群眾已經知道了，那麼就不應該這麼緊張，應該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即使是有比較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但是也還不是敵人的，如果他們一貫以來表現不是那麼壞，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也沒有什麼壞的表現，我們也可以要他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給他們打消顧慮，因為這裡邊有一些人，他們也都是些知情人。比如參加過護工隊的，那麼他自己參加了護工隊，他必然會知道一些人參加過護工隊的一些情況。有的參加過國民黨的也是如此。那麼即使是對於敵人，我們也應該採取分化瓦解，利用他們的矛盾各個擊破。我們要打擊的還是那麼一小撮頑固的階級敵人，在這裡邊，我們一定要嚴格地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上面我們說過，有一些人現在企圖把這場鬥爭搞到一般思想作風，工作作風或者生活作風上，我們也沒有上他們的圈套。在這裡順便說一下，昨天我們開會的時候，有個同志提出來，就是有一些人生活作風上有一些問題，而且有的問題比較嚴重，但是夠不上敵我矛盾，能不能當各級造反派的頭頭？我們是這樣的意見，如果是基層單位的，那麼請那個單位的廣大革命群眾去討論、研究，如果是公司、聯絡站以上的頭頭，根據工總司、工代會的政治條件來決定，如果你自己認為你不够當聯絡站頭頭，自己有問題，不够，那麼你就主動的回廠抓革命、促生產，所以我們還是要根據條件辦事，那麼有的呢，特別在前一個時期，有一些同志，本來自己感到自己有問題，要求回去了，後來呢，我在革委會大禮堂，講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聽到不是敵我矛盾，他又回來了。不符合條件的還是要回去，回去以後，如果在聯絡站，在各地，在上邊沒有幹壞事，我們還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現在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已經打響了，廣大革命群眾已經基本發動

起來，問題就是我們現在還要進一步地充分發動群眾，我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敢字當頭，依靠群眾和幹部的大多數，奪權這場對敵鬥爭的全面勝利，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69

---



## 王洪文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發言（1969.4.14.）

敬愛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會主席團、全體代表同志們：

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極其深遠影響的大會，是一次朝氣蓬勃的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和勝利的大會。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會上極其重要的講話、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我們廣大的工人階級表示最熱烈地擁護，堅決地照辦。

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根據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提出了黨的戰鬥任務，是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偉大的行動綱領。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和落實。

我們決心做到以下幾點：

一、狠抓根本。要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努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各條戰線上，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迅速地掀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的新高潮。堅決做到，緊跟毛主席，永遠幹革命，海枯石爛，紅心不變。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一條真理：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就要失敗，這個拿鮮血換來的經驗，我們廣大的工人階級永遠不能忘記！

二、我們要遵照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和「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偉大教導，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鞏固工農聯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深入細緻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工廠鬥、批、改的任務，認真搞好上層建築的鬥、批、改，落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各項政策，並且「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永遠朝氣蓬勃，艱苦奮鬥，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教導，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和帶動生產，堅決完成和超額完成發



展國民經濟的計畫，促使經濟戰線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的躍進，奪取革命和生產的雙勝利。

四、我們要學習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持四個第一，大興三八作風，加強戰備，武裝好工人，隨時準備好粉碎一切敢於來犯的敵人，我們還要牢記毛主席關於不能輕易說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的教導，澈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為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努力奮鬥。

最後讓我們共同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1973

---



## 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8月28日通過）

同志們！

現在，我受黨中央的委託，就我們黨的章程的修改問題，作一個扼要的說明。

根據毛主席、黨中央關於修改黨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九大黨章的修改問題。會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黨委和中央直屬單位的黨組織，都成立了黨章修改小組，廣泛徵求了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正式向中央報來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這同時，各地黨內外群眾還直接寄來了許多修改意見。現在提請大會討論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據毛主席關於修改黨章的具體建議，在認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見的基礎上起草的。

在討論修改黨章的過程中，全黨同志一致認為，從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線指引下，深入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在國內和國際鬥爭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偉大勝利。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一些調整。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一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鬥爭經驗的內容，這也是各地送來的修改稿的共同特點。

我們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線鬥爭的勝利，

積累了戰勝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對於全黨是十分寶貴的。毛主席說：「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我們全黨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線問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加強黨的建設，保證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實現。

在這個方面，修改草案增寫了哪些內容呢？

第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黨運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粉碎了以劉少奇為頭子和以林彪為頭子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對國際國內一切反動勢力的一次沉重打擊。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這次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重大意義，並且明確寫上了：「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僅國內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國際上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要對我們進行侵略和顛覆，也必然會到我們黨內來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階級鬥爭的現實已經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揭示的這個客觀規律。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深入進行思想、政治、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還要進行多次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奪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第二，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則，最基本的是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搞馬克思主義，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大多數人謀利益，就一定要團結，要光明正大；搞

修正主義，專為少數剝削階級分子效勞，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陰謀詭計。修正主義是一種國際性的資產階級思潮。修正主義分子是資產階級和帝、修、反採用打進來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劉少奇、林彪這類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儘管表現有所不同，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搞修正主義的頭子，從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化了，爛透了！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這是千真萬確的。修改草案根據各地的建議，把「三要三不要」寫進了總綱。在黨員必須做到的第一條、基層黨組織任務的第一條中，還吸收了北京市修改黨章座談會上工農兵同志的意見和有些省、市的建議，增寫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內容。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學習馬克思主義，批判修正主義，是我們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一個長期任務。

第三，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許多同志在討論修改黨章時，聯繫黨的歷史和自己的經歷，認為這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經幾次出現過錯誤路線的統治，在民主革命後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某種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同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

當然，對錯誤潮流，不僅有個敢不敢的問題，還有個能不能識別的問題。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是極為複雜的，當一種傾向被另一種傾向掩蓋著的時候，許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陰謀詭計的人，又故意製造假象，更增加了我們識別的困難。經過討論，許多同志認為，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切客觀事物都是可知的。「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只要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

著作，積極參加鬥爭實踐，努力改造世界觀，就能夠不斷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區分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正確觀點與錯誤觀點。

在開展鬥爭的時候，要學習毛主席關於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不僅有堅定的原則性，而且實行正確的政策，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團結大多數，遵守黨的紀律。

第四，要在群眾鬥爭中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主席說：「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裡所說的要培養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千百萬。這樣的任務，只有全黨重視才能完成。在討論修改黨章過程中，許多老同志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求進一步做好培養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許多年輕同志也熱烈地表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鍛鍊的老幹部，有豐富的經驗，要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幹部都表示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草案在總綱部分加了要培養接班人的內容，條文部分加了各級領導機關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我們要根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著重從工人、貧下中農中選拔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還要注意培養婦女和少數民族幹部。

第五，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發揚黨的傳統作風。無產階級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必須領導一切，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單位關於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建議，在條文部分規定：國家機關、人民解放軍和各個革命群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黨的一元化領導，在組織上應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同級各組織的相互關係上，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級關係上，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我們黨歷來的規矩，必須堅持下去。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不能用幾個方面的「聯席會議」來代替黨委會的領導，同時也要充分發揮革命委員會和各個方面、各級組

織的作用。黨委會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加強集體領導。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頭主義。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黨的一元化領導，最根本的是正確的政治和思想路線的領導。各級黨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畫，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修正草案把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寫進了總綱。毛主席宣導的我們黨的這個優良傳統，是老一輩共產黨員熟知的，但也有一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續發揚的問題；許多新入黨的同志，更有一個學習、繼承和發揚的問題。毛主席經常拿黨在艱苦鬥爭年代的事例來教育我們，要與廣大群眾同甘苦，共命運。我們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和糖衣炮彈的襲擊，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堅決反對特殊化，認真糾正「走後門」之類的一切不正之風。

這裡，著重講一下接受群眾的批評監督的問題。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勞動群眾，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有權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實行革命的監督。這個觀念，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黨是加強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數幹部，特別是有的領導幹部，聽不得黨內外群眾的意見，甚至壓制批評，打擊報復，個別的還相當嚴重。對人民內部問題，採取「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錯誤做法，是黨的紀律絕對不允許的。修改草案在條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話：「絕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我們應當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同這類違反黨的紀律的現象進行堅決的鬥爭。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經常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武器，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

第六，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們黨的一貫原則。這次修改草案，又寫上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我們永遠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



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當前，特別要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我們務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防止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

毛主席說：「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我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我們一定要使國家富強起來，也完全能夠富強起來。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堅持「不稱霸」的原則，不做超級大國。全黨同志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一百年也不要驕傲，二十一世紀以後也不能翹尾巴。同時在國內，也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各種表現，進一步增強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團結，加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完成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同志們！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相信，全黨按照十大確定的政治路線和通過的新黨章去做，一定能夠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朝氣蓬勃。讓我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sup>23</sup>

---

<sup>23</sup> 《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八月二十八日通過）》，《人民日報》第一版，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

1974

---



## 王洪文、江青就印發北大清華彙編《林彪與孔孟之道》給毛澤東的信（1974.1.12.）

主席：

我們看了北大和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這份材料，覺得對當前的批孔有很大幫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這種簡要的材料。我們提議，可否轉發各省、市、自治區、各軍兵種、各大總部、國務院各部，作為當前批林批孔的參考。現將材料呈上，妥否，請批示。

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 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1974.1.14.）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給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觸一些情況，有些省老大難解決不了，主要是路線沒有搞對頭，有些地方嘛，除少數壞人外，多數是領導人的路線沒有搞對頭，主要是沒有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沒有正確對待群眾，沒有正確對待運動。初期的衝擊，如四川十二個廠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帶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這個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指示重溫一下。同志們正在學習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重點，學習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了。抽點時間學習討論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很有必要。

### （一）為什麼要正確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義

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

主義復辟的一件大事。

同志們都知道「九大」和「十大」的政治報告，都把文化大革命寫上了，而且寫進了黨章。黨的代表大會作了決定的事，全體黨員都應該照著全做，而且應該做到。新的一年開始了，國際國內形勢很好，對革命來說，形勢很好，一片大好，我們要發展大好形勢，把我們國內的事情辦好，把根據地建設好，要能解決一些省市的問題，首先要能解決路線問題，把路線問題搞對頭，主要是解決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從歷史上看來是有必要的，而且從實際上看也是完全必要的。捍衛文化大革命就是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每個共產黨員，特別是中級幹部，更應該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

為了充分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首先是要重新學習一下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這是我們認識文化大革命的綱，現在有些人把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忘記了，現在有少數地區還搞資產階級專政。

早在一九六五年底，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剛剛揭開，即批判《海瑞罷官》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萬曆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就明確指出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絕不是單純的學術討論。運動初期，有些人就上了這個當，以為這是學術討論，實際是在劉少奇指使下，彭真一夥跳出來扔出一個修正主義的《二月提綱》實際是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妄圖把運動引向純學術討論的資產階級軌道。毛主席毅然決然的叫彭真一夥靠了邊，同時指出舊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決小鬼」，毛主席說，「我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的，我就號召地方起來造反，向中央進攻」。這裡「幹壞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義。毛主席在杭州對許世友同志說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怎麼辦？」毛主席曾反復講過這個問題，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這個文件中毛主席做了許多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這個指示已經發表過了，這個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記了，有些人就不承認有走資派。」

廣大革命群眾回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這時劉少奇一夥慌了手腳，急忙炮製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親自鎮壓革命。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親自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了十六條，寫出「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樣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了。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很高的評價，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毛主席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鼓勵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鬥爭中鍛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這時毛主席對廣大幹部也非常關心，親切地指導「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中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親切希望我們老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保持革命晚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大好形勢。當一九六七年初來臨時，毛主席在十二月廿六日講「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就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堅決支持上海的工人運動，支持上海工人起來造資產階級的反，工人運動起來了，毛主席很高興，十六條講「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闖將，工農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當時派了中央領導同志（張春橋）去上海支持工人運動，處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組織。毛主席指示「可以先斬後奏」，這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也起來了」。在毛主席親切關懷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

在駐滬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開展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鬥爭。

這不光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國的事，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奪權的，不然這個權是奪不下來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黨委會，熱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奪權鬥爭，對《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鬥爭做了很高的評價，指出「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作用」。

一月廿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偉大號召：「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毛主席還親自總結了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毛主席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並指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組織，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革命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一月奪權，打退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時，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國務院發了賀電，指出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間，毛主席視察了三大區，對進一步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興地指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遠矚地指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

同志們再回顧一下，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多麼重要，當時是九次路線鬥爭，接著就是第十次路線鬥爭，我們學習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往往當時並不理解，沒有讀懂，而是經過一段時期才理解的。我們有必要學習毛主席的這些指示，這對我們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很重要，最近中央準備把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編成一本書印發，只有把毛主席的指

示學懂了，才能認識哪些是馬列主義的，哪些是修正主義的，有利於開展對修正主義的鬥爭。為什麼講這麼一番？因為現在黨內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在這一段。

## （二）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

從上述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決心，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現在這個革命已經取得了極其偉大的勝利。首先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最大的勝利；同時文化大革命鍛鍊了廣大幹部，鍛鍊了廣大群眾，促進了上層建築領域裡的革命和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大大解放了生產力，這個很多同志都看到了，但是少數人看不到。很快出現了普及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的群眾運動，在全國這個運動正在逐步深入。八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段指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要是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會怎麼樣呢？最近中央準備發個材料：「林彪和孔孟之道」，發給全黨，準備批判。林彪與葉群夫妻倆，加一個陳伯達，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恨。這個材料給我們那裡工作同志談了一下，大家很氣憤。對於這場文化大革命，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必然要萬般攻擊，這是毫不奇怪的。蔣介石也咒罵文化大革命，蘇修的電臺報紙也罵了七、八年了，林彪在「五七一」反革命政變綱領中，也用蘇修的語言罵我們。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證明我們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對的，我們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蔣介石、南朝鮮、南越、蘇修都罵我們批孔，這從階級觀點看是不奇怪的。問題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一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有的說，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黨章中，黨的決議中說，文化大革命以後還是要進行多次；有的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後也不要再搞了。特別是高中級幹部，說



法是各式各樣。有的說「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在我們這裡看不到」。意思是說在這裡看不到，在那裡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國看不到；那還有什麼必要呢？前邊說過，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最大的勝利。怎麼看不到呢？要說看不到，就把自己置於全黨全國人之外了。劉少奇、林彪一夥要是上臺，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中國社會將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去，就會變成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成千上萬的人頭就要落地，到那時你還說看不到？我們說文化大革命不僅對於全國來說是必要的及時的，在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單位看也是必要的及時的。毛主席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劉少奇林彪的路線在哪一個單位都有影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數地方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義路線是相當厲害的，如舊中宣部，中組部，兩個重要的部都不在我們手裡。不要說被資產階級專了多年政的文化戰線了，就拿工業戰線來說，修正主義路線影響還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後就好得多了。專家治廠，管、（卡）、壓、洋奴哲學，這一套不扔掉，工人階級怎麼成為工廠的主人呢？正是由於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我們的鋼鐵十年徘徊，有些企業形式上在我們手裡，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代理人手裡，有的甚至在資本家手裡，（上海有些廠實際上還是資本家當廠長）在這樣一些單位，如果不來這樣一場革命，怎麼行呢？怎麼能把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呢？毛主席高瞻遠矚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解決了這個問題。光這一次還不行。現在有些省市個別單位，關鍵是領導問題，不能怪群眾，不能說群眾不好。當然不是說那些都是壞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上是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一旦把問題指出來，這些同志是會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問題應當解決了。要能解決問題，首先要把原因找對頭，這樣才能對症下藥。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有一些單位的壞事歸罪於文化大革命，或者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這是錯誤的；這本來是修正主義的後遺症，怎麼能說成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這些問題恰恰說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哪些地方路線不對頭，哪些地方就不能團結；廣大的幹部和群眾把壞人挖出

來。有的是批林批孔搞不起來。最近我們解決四川十二個廠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就是沒有深入批林，關鍵在這裡。我們認為，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辦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大同坦克廠，鬧了八年，這次兩個月解決了；主要是原來的路線搞錯了。當然我們不否認個別單位有壞人搗亂，這也要發動群眾才能把壞人孤立起來。把這些問題說成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實際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搬出來，那就是越搞越亂。江西省就有人在幹部會議上傳達反革命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歸位，小兵回營」；把小兵全打下去。最近看到一個電報，現在小兵都造反了，搞兩個頭頭，弄得「不亦樂乎」。壓而不服，這是一條真理；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說過，你們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說過，但沒用，「十大」也說過，但也沒用，不過不用擔心，中央是知道這些事的。

還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這樣搞？就是說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他們不主張億萬革命群眾，不主張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無非是這麼個問題。因為否定了這些，就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次談話中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仍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方式，一種方法，公開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的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老實說，不是文化大革命，怎樣能把劉少奇這樣一個隱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來呢？對劉少奇的一些東西，特別是歷史問題，過去我們並不能完全掌握劉少奇的叛徒問題；是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到處查出來的，（當然對他公開發表過的修正主義的東西，我們是掌握的）。同時沒有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式，怎麼會出現革命委員會和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農業生產也不可能發展得這麼快。沒有文化大革命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不可能普及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當然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個發展完善的過程。毛主席指出「歷史的經驗值

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群眾都知道」。現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方，在個別人那裡卡住了，不告訴群眾，有的給群眾講時，哪些是毛主席的話，哪些是黨中央的話，哪些是他們自己的話都分不清。

有些人「稱讚」文化大革命，說文化大革命群眾不聽話，動不動就貼大字報，開會七嘴八舌；這很對嘛！其實這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一個勝利。

毛主席歷來指出「我們黨內要生動活潑，朝氣蓬勃，不要搞得那麼死死板板的」。主席對王海蓉說「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打瞌睡，看小說」；有人很不理解。我體會就是不要把學生搞得太死，號召學生敢於造修正主義的反。

部隊也有這樣的問題。叫無條件服從命令，絕對服從命令。就是服從，也是有條件的服從，不是無條件的，符合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的就服從，不符合的就造反。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執行上級的指示，是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的，要路線對頭，執行正確的路線，正確的命令，不正確的不執行。有些人對這類事情看不慣，說成是戰士難管，愛提意見，這是很自然的。現在部隊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對戰士管教粗暴，不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結果使問題成堆，矛盾激化。這裡的關鍵也是個路線的問題，如對待群眾的問題。現在形勢發展了，要研究思想工作的怎麼做，完全用過去的那一套，吃不開。

這些事在我們看來是好事，有些人不這麼看。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工農兵是各項事業的主人，這點不能忘記。「十大」一報告中指出，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包括最近報紙上登的兩個小同學，一個叫黃帥，一個是廣東的，先寫了一封信給《人民日報》，要求支持，寫的很有水準、很有感情，我們看了覺得應該支持。

毛主席最近指示：「牛為什麼要長兩支角？就是要鬥爭」；這句話在一九五五年就講過了。毛主席還指示我們：「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說話為什麼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們就是要靠頭上長角、有兩支角。敢造修正主義路線的相反的工農兵群眾。有些單位對「十大」報告要

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現在還不敢組織群眾學習，群眾起來搞「四大」反潮流，我們應該贊成，為什麼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義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馬列主義的，就應該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都不怕，為什麼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認為群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有的人對毛主席的這句話是聽不進去的，他們就喜歡壓，壓不服就抓。

有人說：「老幹部過去南征北戰，文化大革命七鬥八鬥。」這句話不對，而且也不符合老幹部的心願；應當說，老幹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他們過去南征北戰，有的受過傷，他們並不因此就認為自己可以脫離群眾，就認為自己可以擺官架子，而是積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發現自己有缺點錯誤，就作自我批評，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功。這樣的老幹部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大批。這才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真正的代表。至於說有的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衝擊較多，這是要具體分析的。毛主席在視察三大區時說：「有的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同群眾商量，不平等對人，不民主，喜歡訓人、罵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像毛主席指出的這些人，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嗎？你可以訓人家，群眾為什麼就不可以批評你一下呢？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本來大家已經熟悉的，但有些人忘記了。這裡所說弄得狼狽的老幹部，也是一分為二的，有的從積極方面接受經驗教訓，成了群眾真正信任的老幹部，這樣的好幹部不少，比如上海的馬天水同志，文化大革命後精神面貌不一樣了，更好深入群眾，路線也搞對頭了。另一種情況是從消極方面總結經驗教訓的。在群眾面前，扭扭捏捏、縮手縮腳、實際上還是脫離群眾，不過形式上不同罷了。

還有一種人，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關係到國家不變顏色的事，根本不想，對群眾的衝擊，總是耿耿於懷，解放

了、上臺了、一有機會就想整群眾，江西省的幹部就是如此。這樣整的結果，想必會整到自己的頭上；「三氣」不改總是要摔跤的，這個問題不解決，現在解放了將來還得被打倒。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鬥，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我們要向這樣的同志大喝一聲，太危險了，人民群眾欠了你什麼賬呢？毛主席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人民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群眾討賬的話，群眾就有權再把你的權奪回來。

還有一種傾向，認為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是極「左」實質；其實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是極「右」，而不是極「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有個大學有人說：「極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證明，是所謂十七年的功過，誰人評說？已經評過了，文化大革命那麼多大字報已經評過了，中央下放的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也早就評過了。就是說，教育戰線上十七年基本沒有執行毛主席的路線，被修正主義專政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說：「北大、清華是根深蒂固的盤根錯節」，現在有人說這個「紀要」不靈了，說這個「紀要」是極「左」思潮的產物，把這些話到處傳。對某些人來說，批極「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我們的結論「極右不批，是非不明」。當前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不批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要鞏固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斷然不可能的。去年有個單位寫了一篇文章，說那個單位的青年是極右份子，把青年說得一無是處，全部是壞的。如果這樣，中國革命的希望在哪裡？我們的班交給誰？中央在召開省團代會上的批示中指出：大多數青年是好的，否則我們的革命前程就沒有前途了，就不光明瞭。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散布反革命謠言。如「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歸位，小兵回營」；要害是後邊兩句，「老師歸位，小兵回營」不管什

麼叛徒、特務、走資派、統統都歸位，包括劉少奇也要請回來，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要統統打下去。這是典型的復舊，或者說是復辟，也可以說是反攻倒算。這個謠言是從部隊裡的兩個高級幹部哪裡傳出來的。傳布這些東西是很壞的。像劉少奇的反革命謠言，江西省當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幾百萬人的幹部會上傳達，這些事情也不怪，原因在於我們的一些幹部頭腦裡存在著謠言市場，謠言到手，立即販賣，因此從階級觀點來看，就不奇怪。

有些人不是壞人，但思想上早就解除武裝了，沒有辨別香花和毒草的能力了，毛主席嚴厲的批判了這個反革命謠言，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毛主席的指示，充分體現了幹部問題上的革命路線，我們應該發揮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作用，這是非常重要的；同時要大力培養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不是一兩個而是千百萬。不發揮老幹部的作用是錯誤，但講老幹部就論資排輩，不論現實階級鬥爭中的表現，也是錯誤的。過去南征北戰能打仗，這很重要；但更要看在現實階級鬥爭中的覺悟和表現。如果思想是修正主義的，能為無產階級打好仗嗎？我們相信特別是在重大關鍵時刻，考察幹部不應該光看歷史不看現實；主要的還要看路綫鬥爭中的覺悟。不管他是地方的、或是軍隊的，老的、新的幹部，都應該這樣看。

老幹部有錯誤要一看二幫，允許改正，對新幹部也要這樣。但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為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不利於黨的團結嘛！毛主席批評了好些人看不起兒童團，提出「你們那幾個十幾歲、廿歲的人就那麼高明」？現在新幹部要謙虛、謹慎、不要驕傲自滿、翹尾巴，要尊重老幹部，向老幹部學習；老幹部要傳、幫、帶，對新幹部要有個傳幫帶的問題。

培養造就幾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是偉大的戰略措施，是百年大計，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大事抓好，從上到下的培養接班人。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地方上的阻力還小些，軍隊阻力大些，我就主張找一個卅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

關於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呢？還是糟得很？這個爭論由來已久，可以貫穿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過程。彭真的《二月提綱》，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就是要扼殺文化大革命，林彪在本質也搞了一套同劉少奇一樣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夥同陳伯達在「九大」前搞了一個唯生產力論的政治報告，說什麼「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妄圖以合法的形式對文化大革命實行反攻倒算，毛主席否定了這個政治報告。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九大」路線，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九大」以後，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示下，取得了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鬥、批、改運動步步深入，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還沒有結束，二中全會以來有一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如新疆的龍書金、四川的梁陳、河南的幹部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轉移批林鬥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鬥爭的繼續，這種鬥爭今後還會有。毛主席最近說：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還要看十年」；這就是提醒我們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同志們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說秦始皇搞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的革命，被罵了兩千年，何況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罵，有準備十年幾十年以後還有人要罵，還有人出來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幾千年了，還有人崇拜，秦始皇當時還是革命的，結果被人罵了二千年。

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九大」和「十大」，不是一般問題，就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搞修正主義。我就是這樣認識的：反對文化大革命，必然搞資本主義專政。同志們不要認為現在沒有走資派了，甚至連走資派這三個字也不能提了，有的地方在討論修改憲法、黨章時，就不同意寫上走資派。真是奇談怪論。只要有階級鬥爭存在，資產階級就會到黨內找代理人，就會有走資派，如果沒有走資派，那過去的一切運動，都要否定，三反五反運動，五七年反右派，五七年反右傾，還有四清運動，這些通通否定，因此要寫在黨章上。這是個大事情，不是個小問題。關於有些人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經過說明後改了，改了好嘛，

但不能說改了就不存在走資派了。走資派不但過去有，以後還會有。少數人現在還對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甚至說造反派沒有好人！這話那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呢？「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有人罵我們是造反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造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奪取了政權，這有什麼不好？文化大革命我們造了資產階級的反，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反，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有什麼不好？過去有些人是造反派，現在還罵造反派，可見他的思想變了，忘記了過去。過去打土豪分田地難道不是造反？打蔣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是什麼呢？有些人把這些都忘了。當然，一場文化大革命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進了少數壞人，這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最初組織紅軍時，就那麼純嗎？不可能！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怎能罵造反派沒有好人呢？說造的派沒有好人，豈不否定了自己！他忘記了是誰帶領我們造反，忘記了造反派的老祖宗。

一個共產黨員不造走資派的反，你要幹什麼？一個共產黨員說這樣的話，意味著對共產主義的背叛。共產黨員就要造反，造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反。當然對多數人來說是作內部問題、認識問題提出來的，通過學習毛主席的指示，學習十大精神，可以改造過來，但就這些同志來說，也要在自己的世界觀上找原因。用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一番。有少數人可能改造不過來。兩種矛盾可以轉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轉化，有的向壞的方面轉化；有的共產黨員認識了，好轉一些，或者說完全變過來了，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有的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轉化為敵我矛盾。

在我們一些同志的頭腦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解放以來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而好像是晴天霹靂一樣，一個早晨爆發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大誤會，非常反動。他們有套說法：「老幹部回崗位，新幹部回單位，支左人員回部隊，文化大革命是場大誤會」；這是思想問題，這是典型的唯心史觀。他們現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場大誤會，就對當前的一切都看不慣，總是等呀等到一切恢復正常就



好了。他們把發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個封了口的圈子裡打轉轉。在工廠他們實行管、卡、壓；在學校把智育第一的一套搬出來；總是把一切都照老格式走一遍，這是一種什麼思想呢？是一種典型的庸俗化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任何事物都在不斷地向前運動和發展中；這些守舊的人，口頭上承認辯證法，實際上是反辯證法的。一提到企業管理，就主張把群眾衝掉的舊規章制度恢復起來，熱衷於搞計鐘工資，計時工資獎金等，他們說這樣可以推動積極性。他們就沒有想一想，革命幾十年靠的是什麼？是獎金？計鐘工資、計時工資嗎？不是，我們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靠的是億萬革命群眾，靠的是小米加步槍。如果說是搞物質刺激，蘇修是搞得很厲害的，但搞得工業停滯，內外交困。如果那東西是靈的話，列寧格勒的工人，為什麼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質刺激？還是靠群眾覺悟？還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線發動群眾？當然不是說不關心群眾的生活，但關心群眾的生活和物質刺激是兩回事。提高勞動生產力，應該在技術革新、機械化方面想想辦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群眾的生活水準是必要的，但搞什麼計鐘工資、獎金，不是關心群眾生活，這是對工人階級莫大的污辱。我們鐵道兵修了那麼多鐵路，靠的是計鐘工資嗎？這些戰士一個月八元錢，沒有獎金，這完全靠的是毛主席思想。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搞，中央有兩個部，就是搞這個，到上海去搞試點，被工人趕出來了。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在這裡吹一吹，希望讀書班的同志回去觀察這些問題，要敢於鬥爭；起碼向中央反映這些情況。有的地方提出來，能不能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規章制度？在計畫工作會議上，有個工人回答的很乾脆，說不能。他說了三種情況，第一，管、卡、壓的那套我們不要；第二，月金全付夠的我們反對；第三，在過去正確的，現在生產發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動地搬來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樣。這個工人很懂得辯證法，他說得很對，事物發展了，我們領導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適應新形勢。我們要堅決反對倒退，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不前的論點，悲觀失望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

的」。我們要把批林整風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批孔結合起來，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全面鼓吹唯心主義的思想家，一切守舊的傢伙吹捧孔子。林彪是當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也必須結合起來，要打倒我們頭腦裡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國由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社會大變動時期，他仇恨社會制度的變革，拼命維護奴隸制度，反對封建制度，妄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孔子在魯國當宰相上臺七天，就殺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學生冉有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動另一部分學生鳴鼓而攻之。毛主席說「孔子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由於他倒行逆施，上臺三個月就下臺了；他雖然下了台，但復辟的心不死，他到處遊說，看到大好形勢就叫喊「禮壞樂崩」，認為更壞事。昨天《人民日報》轉變了哲軍的文章，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這篇文章寫的很好。（按：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載哲軍所撰《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對社會變革的哲學》文章）

有些人對馬列主義沒有感情，對修正主義留戀顧盼、脈脈含情；對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看不慣，對舊的東西非常留戀。

毛主席說「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制度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朝不保夕』，唯獨共產主義的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個以共產主義為鬥爭目標的共產黨員，為什麼對舊事物那樣留戀呢？這是我們在座的同志應該很好研究的問題。

我們主要是提醒同志們好好學習一下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記住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的三項原則。毛主席最近還說「中國要出修正主義，同志們要注意呀」，批評政治局不論政，軍委不論軍也不論政。毛主席這些指示，適用於政、軍、學。東南西北各個地方，就是告訴我們要抓大事，值得同志們議論。今後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建築領域。

毛主席最近指示，並親自要我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就是要我們牢記步調一致才能得到勝利。我們對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確的認識

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貫徹「十大」精神，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 江青、王洪文在「內蒙乒乓球隊兩位革命小將反對 領導弄虛作假遭打擊報復」的材料上的批示 (1974.2.21.)

### 【國家體委關於印發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批示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體委、各體育學院、國家體委各直屬單位：

現將中央領導同志在「內蒙乒乓球隊兩位革命小將反對領導弄虛作假搞錦標主義竟遭嚴重打擊報復以至毒打」的材料摘編上的重要批示印發給你們。

江青同志批示：

「應該責成王猛同志負責妥善處理。賠禮道歉，醫治毆傷。揭開體育系統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

王洪文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見。請轉王猛同志即辦。」

我們認為，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極為重要。這不僅是對內蒙兩位革命小將反對錦標主義遭到嚴重打擊報復事件的批示，更重要的是對我們體育系統批林批孔運動的極大關懷和有利的推動。希望你們迅速向全體同志傳達，認真組織學習，堅決貫徹，放手發動群眾，揭開體育系統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揭發批判體育系統修正主義體育路線的回潮，使批林批孔運動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深入發展。

應該指出，內蒙兩位革命小將揭發錦標主義遭到打擊報復的事件是體育系統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突出反映。我們國家體委對待這一嚴重事件，態度不嚴肅，處理不得力，沒有滿腔熱情地對革命小將的反潮流精神給以有力的支援，暴露了我們還嚴重地存在著單純技術觀點，錦標主義和官僚主義。希望體育系統的廣大革命群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聯繫實際，對國家體委在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澈底地揭發和批判。並望將揭發出來的材料及時寄給我們。

附件：（略）

應該責成王猛同志負責妥善處理。賠禮道歉。醫治毆傷。揭開體育系統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

江青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見。請轉王猛同志即辦。

洪文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王猛同志：

遵領導同志囑，現將中央首長的批示和劉以珍、張鏡如等同志的信複抄於你，請收。

此致

敬禮

王洪文同志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sup>24</sup>

<sup>24</sup> 四川省第三屆運動會政治處印，《學習資料》，一九七四年五月。

##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首都文藝工作者的講話（1974.5.23.）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晚十點四十五分】

王洪文：我沒有準備講話。今天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二周年，希望同志們很好地學習主席這一篇光輝著作，把文藝革命堅持下去，進行到底。

張春橋：我沒有準備講話。因為《講話》發表三十二周年，時間還是很短的，中國的封建社會搞了兩千多年，資本主義社會在全世界搞了二、三百年，但是他們的文學藝術究竟留下了多少？很可憐！不是說在那樣一個時代他們沒有過成績，曾經有過成績，也起過進步作用，但是很快歷史的發展就把它甩掉了。我們搞革命的文藝，從唱《國際歌》算起，時間也不長嘛！我們才三十幾年，真正花功夫，成績大的還是這十年。

（江青插話：從準備看是六三年、六四年算起）十多年吧！看成績大小，我覺得要從整個歷史發展來看。經過批林批孔，這一股潮流現在是少了，但話還是有的。我們也不是很自滿，但是應該說清楚，從整個歷史來看，不論資本主義幾百年，封建社會幾千年，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樣一比就很清楚了。所以，毛主席說我們的方向是對的。我們的方向代表著中國工農兵的方向，也代表全世界工農兵方向。所以，我們的前途是無限的，要在過去十多年努力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我相信，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一定能超過人類歷史任何一個時期。

就說這點願望。

姚文元：每一年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們都要總結一年來的工作，提出今後的任務，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從文化大革命以來，這成為一個好的傳統。每一年到這個時候，大家都會想一

想，在毛主席路線指引下，我們做了哪些工作，有些什麼成績，有些什麼經驗，還有哪些要改進的地方，提出繼續革命的任務。

今天看了兩個小戲，江青同志說基本上是樹起來了。當然還要再磨。《沂蒙頌》後面還有一些層次還可以再改一下。總的說來，剛才看了兩個小戲，我們看了很高興，因為這兩個戲改了很多次，一直改，一直磨。（江青插話：人家破壞了！）人家破壞了，我們一直堅持，才獲得這樣的成績。說明只要堅持毛主席的路線，總結經驗，與破壞作鬥爭，我們的事業一定可以成功的。

問同志們好，祝同志們在新的一年裡（到明年紀念《講話》的時候）政治思想上取得更大進步，創作上取得新的成就。

同志們，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的隊伍，經過這麼多年，是站起來了。希望同志們在批林批孔運動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團結、壯大。

王洪文：還是這兩句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江青：不要怕挨罵，像會泳同志，挨了多少罵，有許多事，我給你們頂住了。他們罵我們，同志們，你們怕不怕挨罵？（大家回答：不怕！）反革命不罵，我們還算什麼共產黨員、革命者?!越罵精神越抖擻，要有這麼一股子勁。

## 王洪文「長沙告狀」前寫給毛澤東的信（1974.10.8.）

主席：最近在籌備召開第四屆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內部有爭論，未公開化，但在別的問題上已經表現出來，矛盾已經表面化，如十七日晚會政治局上關於交通部問題引起了爭論，我們幾個同志分析，表面是交通部，實質是與籌備人大有關，跟交通部兩條路線上的鬥爭是有直接關係的，相當複雜。我們幾個商量，是否能當面向主席彙報聽取指示……因為不當面一

時說不清楚，來時由我一人來，以免驚動別人。

王洪文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上午七時<sup>25</sup>

---

<sup>25</sup> 美國圖書館收藏。

1975

---





王洪文、江青對文化部電影局有關人員的講話  
(1975.4.4.) (存目)



1976

---



## 王洪文在平谷縣的講話節錄（1976.10.3.）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打倒！別人搞修正主義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義，你們也來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義，但這只是個人願望，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建國以來，中國就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後還可能出什麼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不只是鄧小平搞修正主義，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們要和貧下中農劃等號，你們也要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劃等號，你們要在農村多待一段時間，要把眼睛睜的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包括我。我這個人又聽人家的，又不聽人家的。

##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976.10.18；中發〔1976〕16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現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通知你們。

（一）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行反黨篡權的陰謀活動，罪行極為嚴重。

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肆意篡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國際一系列問題上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搞修正主義。

他們結成「四人幫」，進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宗派活動。一九七



四年十月，「四人幫」背著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見毛主席，告周恩來總理的狀，妄圖利用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組織他們的「內閣」，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在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的同一天，張春橋親筆寫了一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瘋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議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代總理。他們對毛主席親自提議任命華國鋒同志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極端不滿，妄圖取而代之。

他們大搞陰謀詭計，私立祕密聯絡點，私整中央負責同志的黑「材料」，到處插手，煽風點火，企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他們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歪曲事實，顛倒是非，製造謠言，欺騙群眾。在宣傳報導中，突出地宣揚他們自己，為他們篡黨奪權大造輿論。

他們崇洋媚外，裡通外國，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在同某外國作家進行的幾十小時的談話中，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

他們動不動就訓人，給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另搞一套，在黨內自成體系，為所欲為，稱王稱霸，把自己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

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王、張、江、姚以為時機已到，無所顧忌，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四人幫」加緊祕密串連，陰謀策劃。他們四處遊說，標榜自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自封為「無產階級鋼鐵公司」，提出蠱惑人心的口號，公然煽動反對黨中央。他們有計劃有預謀地偽造了一個「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在九月十六日的兩報一刊社論中發表，並連篇累牘地加以宣揚。十月二日，華國鋒同志在一個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親筆寫的指示是「照過去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錯了三個，戳穿了他們的偽造。十月四日，他們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用「梁效」名義寫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肆意攻擊黨中央。」文章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為了粉碎這個將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反革命復辟陰謀，中央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十月六日，中央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

（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行了多次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們就是不肯改悔。

一九七四年一月，他們背著毛主席，也不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批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答覆江青的信中說：「不見還好



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兩次講：「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準備召開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期間，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轉達她的意見，要王洪文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毛主席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批評他們說：「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指示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但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卻違背毛主席關於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的教導，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經驗主義作為當前的主要危險，大做文章。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大講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並且要把它「當作綱，聯繫我們軍隊存在的這些問題來學習」。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批判了他們的錯誤，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數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

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他們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毛主席說：「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學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了，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國的好，不要看低教條主義。」毛主席強調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陰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在反復講了「三要三不要」之後，毛主席說：「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對待毛主席、黨中央的批評教育，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採取陽奉陰違的反革命兩面派態度。當著毛主席的面，他們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辦」，背著毛主席，他們仍然抱成一團，繼續搞他們的「四人幫。」他們不僅不作自我批評，毫無悔過之意，反而變本加厲，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終於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墮落成爲陰謀家、野心家的反黨集團。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他們中一些人的歷史，也是極爲可疑的。

有關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中央將陸續印發。

（三）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

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代表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採取果斷措施，解決了這個重大問題，消除了黨內一大禍害。這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對於我黨今後堅持毛主席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對於反修防修，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都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證明我們黨不愧為毛主席親自締造、鍛鍊和培育的黨，不愧為政治上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不愧為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人心喪盡，極為孤立，極為虛弱。他們妄圖分裂我們黨，只不過是癡心妄想。

中共中央號召，在這場關係到我黨變不變修，國家變不變色的偉大鬥爭中，全黨同志要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進行堅決的鬥爭，在鬥爭中提高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覺悟，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四）在揭發和批判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中，要注意政策。要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要切實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對犯錯誤的人，要區別對待。它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受於「四人幫」的影響，說了錯話，做了錯事；又有極少數人是跟著「四人幫」幹壞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糾纏歷史的舊賬，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熱烈希望，跟隨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犯了錯誤。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儘快覺悟過來，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劃清界限，揭發他們的罪行，轉變

自己的立場，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在鬥爭中，要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要堅持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保護符合毛主席關於接班人五項條件的新生力量和社會主義大新生事物。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要注意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對那些態度不端正的同志，要進行教育。

（五）反對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一律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要提高革命警惕，嚴防國內外階級敵人造謠惑眾，破壞搗亂。對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政治謠言，反動標語等，要堅決追查，打擊製造者。對反革命，對打砸搶者，要實行鎮壓。要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採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資產階級派性。不准串連。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戰鬥隊。

（六）我們一定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掀起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以階級鬥爭為綱，反修防修，「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關心群眾生活，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努力把各個方面的工作做好，進一步發展大好形勢，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此件發至縣團級，傳達到全體黨員。有關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應妥送中央。傳達後有何反映，望及時報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批轉中聯部等單位《關於對涉及「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影片、電視片、戲劇、畫片和書刊等問題的處理意見》1976.10.23；中發〔1976〕18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現將中聯部、文化部、新華社、國家出版局《關於對涉及「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影片、電視片、戲劇、畫片和書刊等問題的處理意見》轉發給你們，請參照執行。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此件發至縣、團級）

附：

中聯部、文化部、新華社、國家出版局關於對涉及「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影片、電視片、戲劇、畫片和書刊等問題的處理意見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根據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六號文件的精神，對涉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影片、電視片、照片、畫片和中外文書刊等，提出如下的處理意見：

（一）凡帶有王、張、江、姚「四人幫」形象的影片、電視片、照片、畫片、中文書刊、畫冊和連環畫，一律停止放映、展出和出售，也停止對外供應。

如外國人要放映、展出、陳列此類影片、電視片、照片、畫片和書

刊時，分別不同情況，勸阻或置之不理。

（二）凡「四人幫」的著作、文章、講話稿一律停止印行和陳列。其他人的著作引用了他們四人的修正主義言論和有宣揚他們內容的，可分別情況，或者經過處理後印行，或者停止印行。

（三）歷史性紀錄電影、照片、畫冊中，有他們四人形象的，經過處理（刪去他們四人形象），可繼續發行、陳列，也可向外提供。

（四）對歷史性文件，如《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檔彙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檔》等，不再發行、展出和陳列，但可應索供應。以後印行十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四屆人大《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的單行本時，將報告人王，張的名字去掉。

（五）凡同「四人幫」關係密切、民憤極大者所編導、創作和參加演出的電影、戲劇、音樂，由文化部逐個審查，上述這些人的文學藝術評論和創作，由國家出版局逐個審查，提出處理意見。凡經毛主席審定的，如八個樣板戲等，照常放映、演出、播送、出版。

（根據中央文件原件列印）

## 馬天水的揭發交待（1976.11.5.）

【馬天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

同志們：

我有錯誤，我有罪。「四人幫」搞陰謀、搞分裂、篡黨奪權，犯了反革命滔天罪行，幹盡了壞事。我過去把他們當作中央，有事不向中央辦公廳請示，向他們請示，幫他們做了很多壞事。我痛恨「四人幫」這一夥壞蛋，痛恨我自己幫他們作了很多壞事，痛恨我自己彎子轉得太慢。

幾年來，我錯誤地把「四人幫」當作左派，當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者，名義上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線來劃線，實際上是以「四人幫」劃線，誰支持「四人幫」，就認為他是左派，我們就支援誰，誰反對「四人幫」，我們就認為他是右的勢力，我們就反對誰。「四人幫」身邊來的，或者觀點相同的人，不論是秘書、演員、部長，我們是熱情招待、請客吃飯。目的是打聽消息，摸點氣候。對國務院經濟部門來的，多數同志因為觀點不同，我們就很冷淡，很少有負責同志去看他們。有時也招待一下，目的為了做爭取工作。這搞的就是親不親，以「四人幫」的線上分。

我說的右的勢力大，就是反對「四人幫」的勢力大，我們看問題、分析問題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因此，就陷得深、跟得緊了。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毛主席。如果「四人幫」不打倒，我們還會進一步陷進去，罪行還要更嚴重。現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解了全國人民之恨，也挽救了我們，這是很慶幸的。

下面我揭發、交代幾個問題：

關於整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省、有關部的材料問題。上海的廣大幹部和人民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有成績的。但「四人幫」利用批鄧，搞陰謀、搞分裂、搞修正主義，妄圖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幹部，我積極參加了這個陰謀、分裂活動。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的時候，我和張春橋打電話，張春橋首先問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展的怎麼樣，要大力開展。我說，我們正在開展，只感到材料不多。他說，材料不少嘛。我說，有些材料，比如某某省委負責同志傳達鄧小平對十二個省的講話能印發麼？張春橋說，只要不以市委名義，下邊印發是可以的。在張春橋的授意下，我們立即印發了某某省負責同志的傳達材料，裡面有參加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的名字。還印發了科技彙報會有中央領導同志和幾位副總理的插話材料。還印發了其他很多會議上的講話和材料。有的印發到基層，有的作為區縣局幹部會議的文件。當時下面有反映，有抵制，我們就壓制。不以市委名義

印發，不具名的印發或下邊發，本身就是一個大陰謀。這樣廣泛的拋出攻擊中央國務院和某些省和部領導同志的黑材料，就是打擊了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和兄弟省市的領導同志，這就凌駕於兄弟省市之上，凌駕於黨中央、國務院之上，破壞了毛主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略部署，實際上矛頭指向黨中央、毛主席。我想起來非常痛恨「四人幫」這夥壞蛋，又痛恨我自己當時為什麼這麼積極、這麼起勁？這說明我陷得很深，跟得很緊，變成他們的得力幫兇。張春橋這個壞蛋，批鄧開始時，他要上海不要搞亂自己，但他要把兄弟省搞亂，要把黨中央搞亂，要把國務院搞亂，要把有關部搞亂，打倒人家，這不是篡黨奪權的大陰謀麼？

我還轉送過告狀材料，收集中央和國務院及有關部的、以及有些省的領導同志的講話材料，有的摘要，有的手抄，送給搞陰謀的「四人幫」當炮彈。實際上，我們已成為「四人幫」與其他省市的聯絡點。我還插手外地的運動，如河南有一位同志來上海，反映在那裡受壓，我不加分析地答應黃金海同她談話，並整理了中央某負責同志的材料，向「四人幫」送。她說沒有錢，我們就對她的吃飯、治療不收費。我們的黑手一插，就干擾和破壞了人家的大好形勢。直至今年七月份，「四人幫」的頭目王洪文，還批了一個黑指示，要外貿系統給外貿部送大字報。王洪文在計畫會上批了外貿的一個文件，我們轉發了。當然對外貿部有意見正常提是可以的。但王洪文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搞亂外貿部、打倒某某人。我也緊跟王洪文、張春橋的黑指示，支援貼外貿部大字報，說某某可以點名，點名不用財貿組的名義。我積極參加了「四人幫」的陰謀、分裂活動。

「四人幫」口頭上大喊大叫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他們的鬥爭對像是革命的領導同志。他們眼睛老盯著中央的革命領導同志，國務院的革命領導同志，有些省的革命領導同志，有些部的革命領導同志，甚至反對周總理，這是十分氣憤的。

回想起來，張春橋反黨、反周總理、搞分裂要搞臭一些革命領導同志，不是現在才開始的，而是早就散布攻擊言論、搞陰謀詭計了。比如



六八年，也許是六九年，張春橋和我在談話中露出了總理要見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他說他阻止了總理在這一時期不要接觸這些人。這實際上是控制總理的行動。

六七年，我剛解放，要我揭幾位同志的材料，說他們拉我反文革，也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我寫了。當時，總理也曾苦口婆心的幫助我轉變思想，但對我當時反對文革沒作正面批評。張春橋的臭老婆，要我揭總理，說總理態度不鮮明。我沒寫。開十大時，張春橋抬高自己、反對總理。說政治報告是他寫的，不過只是把毛主席的語錄彙編了一下，他也沒有完全理解。我在傳達十大時也講了，十大政治報告是張春橋執筆的，起了吹捧張春橋、貶低總理的壞作用。我有罪。

總理逝世後，群眾要求設靈堂、送花圈、鳴汽笛，我兩次問過王洪文，他第一次回答，嚴格按照治喪委員會規定辦。第二次回答說，你不要再問了，毛主席已圈閱，一定要嚴格遵守。我當時對他的話信以為真，就按他的意見辦，對鳴汽笛的還去追查。我們上海廣大群眾幹部對總理是懷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的。「四人幫」王洪文反對周總理，我執行了他的黑指示，這裡反映了我對周總理的的感情有問題。

張春橋反對和攻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領導同志就更多了。回想起來，張春橋罵中央政治局某某同志，要我們對這些老同志做到心中有數。「四人幫」利用「十條王法」大做文章，說是國務院某某、某某領導同志搞的，等等。還攻擊中央政治局某某同志，說他的思想未超過斯大林時代。張春橋還攻擊某某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只抓具體路線，不抓基本路線。八屆十二中全會後，說陳毅在上海影響很大，要狠批陳毅，肅清他在上海的流毒。這是在北京說的，回來以後張春橋就對陳毅同志狠批一通。這是一個陰謀。此外，他對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都有議論、攻擊。

另一方面，「四人幫」自吹自擂，說什麼無產階級司令部到姚文元為止。他們自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正確路線的代表者。在我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個反動觀點，就是「四人幫」是左派，把有些中央、國務院、有些部和有些省的領導同志看成是右的勢力，把毛主席信任的、

堅持主席革命路線的華國鋒同志，我錯誤地看成是中間派，公布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覺得也合適也擺得平。這個觀點是極其錯誤的，是極其反動的。有了這個反動觀點，我的方向路線就錯了，我犯錯誤的根源就在這裡。這樣一來就形成了誰反對「四人幫」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清君側」。我就積極地反動地壓制批判，追查對「四人幫」有議論、有抵制的人，有的甚至當作謠言進行追查。不僅對地方上搞得很厲害，對軍隊裡搞得更厲害，因為軍隊裡傳「四人幫」的所謂謠言，對鞏固「四人幫」的地位更不利。所以我們抓得更凶。這是陰謀分裂軍隊的組成部分。我們幾個人經常從「四人幫」身邊來的人瞭解小道。瞭解的是中央的一些鬥爭情況，但都以「四人幫」劃線的情況。背後經常議論中央、國務院很多部以及兄弟省運動的情況，議論過中央、軍隊、國務院負責同志的情況，總認為人家搞得不好。「四人幫」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言論，有的我也和少數人散布過，這也是極端錯誤的，反動的。

我回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開始對張春橋等人有些話也感到不能接受。我當時認為我剛解放，可能有些思想沒有完全轉過來。後來我就逐步接受了「四人幫」的觀點，七二年底，主持工作以後，對「四人幫」跟得更緊了，陷得更深了。主要是許多基本觀點越來越一致，把錯誤路線當成正確路線來積極執行；實際上他們長期以來篡改、修正毛主席革命路線，篡改、修正毛澤東思想，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是極右。七四年以來，毛主席對「四人幫」作了一系列的批評，他們這些人根本沒有向我們講過，這充分暴露他們是陰謀家、兩面派、偽君子。

「四人幫」在九月下旬，派來了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向我們帶來了口信。這個口信的原始材料已轉送黨中央。這個口信的原話是黨內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還胡說什麼就是北京炸平，相信各地會出領袖；有這麼好的群眾一定會出領袖。還說什麼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沒有搞成，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的考驗。當時我們聽了只感到階級鬥爭很尖銳，我們要提高警惕，謹慎小心一點。現在認識到，張春橋的中心意思很明顯，是要反對華國鋒同志，想陰謀篡奪最高領導權。要我們有思想準備。這是要我們配合反黨集團搞陰謀的信號彈。

我從北京開會回來後，還瞭解到肖木和寫作組講過，社會上的階級敵人不可怕，群眾會起來把他們打倒，在上層、在中央出修正主義最可怕。還講，主席逝世後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列寧逝世後，托洛斯基威信高，但斯大林當領袖。這樣一說，他們的陰謀就更清楚了。

還有一件事，今年夏天，也能說明「四人幫」是有陰謀的。就是警衛處要求調換槍枝彈藥，因為我們這裡不生產這種手槍和子彈，當時想請求有關部門、要求南京解決。因為警衛處的重要問題一直是王洪文過問的，我要廖祖康提個意見，他說：這樣會驚動人家的。為什麼會驚動人家呢，無非是怕暴露了他們的陰謀。

「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由來已久，早在十大中委、候補中委人選上就搞鬼了。我們上海新當選十大中委、候補中委的同志，本身是沒有責任的。十大提中委、候補中委時，我們上海開始準備的數字不多，他們要大批增加，認為代表中選不出這麼多中委。王洪文就多次嚴厲批評我選代表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連夜打電話在家裡選人，我也幫他出點子一起選人，這種做法是個大陰謀，我積極參加了這個陰謀活動。

四屆人大時，要我們送部長、副部長大批人選，陰謀妄圖改組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竟提出要我們準備三十人。王洪文幾次講過要改組國務院有關部，還說三十人少了不行。王洪文還說你（馬天水）現在離不開上海，如能離開，你到國家計委去工作很合適。當時點出有關部名字的有：六機部要準備一名部長，郵電部、建委、一機部、教育部、輕工部和中央組織部等部準備副職，六機部正部長名單我們已選好了，送出了後來又說這樣不好還是選副職吧。後來還有工、青、婦。公安部等已去了不少人。我積極參與了這個陰謀活動，配合「四人幫」搞篡黨奪權陰謀。

關於武裝叛亂問題，是一件性質極為嚴重的事件。這是「四人幫」搞陰謀詭計，搞修正主義極右路線的必然惡果。是「四人幫」搞陰謀、搞分裂、搞修正主義的大暴露。

上海民兵是毛主席指示下建立起來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廣大民兵和民兵幹部是好的，除備戰外，搞社會上的階級鬥爭，捍衛毛主席的革

命路線也是對的。但「四人幫」標榜自己是正確路線代表者，他們利用民兵武裝為他們「四人幫」服務。為他們篡黨奪權服務。他們為了篡黨奪權自知力量薄弱，需要有軍隊的力量，在中央抓不到軍權，他們就在地方抓軍權。張、王對上海警備區黨委採取又打又拉又壓的分裂主義政策，妄圖拉住地方部隊為他們的罪惡目的服務。借批林批孔的機會，張、王直接指使我們大整警備區的領導。我們也積極跟著幹了。七二年兩委會整得周司令心臟病發了。直到今年，王洪文還說過，周司令靠不住。李寶奇同志到警備區以後，王洪文一再問李寶奇政委怎麼樣，我說現在還看不出，不怎麼樣。在批林批孔中，還指使我們向南京軍區送大字報，干擾南京軍區的批林批孔。因為南京軍區和警備區領導對他們有所警惕，他們拉不到解放軍，這樣「四人幫」就更要控制民兵，他們將民兵自立系統，還企圖吃掉武裝部。我在這方面作了他們的幫兇。對這一點，去年王洪文來上海時，在一次黑會上說：「現在軍委要把民兵置於武裝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過了二十年之後，我還是要把這支民兵隊伍拉起來的。」他拉民兵幹什麼？不是妄圖利用這支隊伍為「四人幫」陰謀服務嗎？「四人幫」，特別是王洪文對民兵武器的製造和裝配，極為關心，經常過問和督促，這是有他的罪惡陰謀的。我在這方面也很起勁，積極當了「四人幫」的幫兇。這次武裝叛亂根子在「四人幫」。廣大民兵和民兵幹部一旦真相大白，就起來堅定地站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邊。這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造「四人幫」的反，起來揭發批判搞武裝叛亂的陰謀。這說明廣大民兵是要革命的，是很好的。我是執行了他們積極分裂軍隊、控制民兵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我是負有很大責任的。我幫他們作了不少壞事的。關於武裝叛亂問題，我也有責任。有人揭發、檢查時我再補充。

「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不僅插手兄弟省市，對上海更是搞法西斯控制。因「四人幫」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一夥，內部不可能團結一致。因此對上海前市委也要搞分裂，搞陰謀詭計。他們在上海搞分裂，「四人幫」各有自己的線控制市委。張春橋有上海的張辦。張辦秘書都參加常委活動，連電話記錄都要向他送，有重要情況我必須向他彙報。張、

姚和寫作組直通一條線。王洪文直接控制總工會。他當了中央副主席後，上海總工會主任的位置還把住不放，以致總工會的權力很大，工團主義嚴重。半年多以來王洪文還直通黃濤一條線。

他們搞陰謀、搞分裂、搞修正主義政治路線，就要有一條為他們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上海的組織路線是王洪文控制的、張春橋插手的。

張春橋在開始時，說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還說有些人問題不大，工作也作不好，也不好處理，文化大革命把這些人搞下去，是個好機會。這完全是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完全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唱對臺戲。後來他說過多次：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幹部，要怎樣怎樣的。這是把毛主席和黨培養的幹部看成他搞宗派的政治資本。後來竟然提出了「領導熟悉，群眾擁護，上上下下」的反動方針。這樣他的組織路線、幹部標準，就篡改、破壞了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在這種反動方針的指導下，「四人幫」對有些幹部犯了錯誤，不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是無情打擊，處分過重。有的就因為犯了走資派錯誤，檢討了還處分，有的該解放的遲遲不解放。毛主席對處理陳丕顯的指示，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張春橋要黃濤口頭帶信，說什麼性質是敵我矛盾。

在幹部處理上，一是以「四人幫」劃線，排斥異己，結黨營私。搞小兄弟，對這些人當中有嚴重問題的還加以包庇重用。我還參與包庇了張春橋的老婆，他的老婆是叛徒，可能還是特務，主要包庇的是張春橋。六七年，當時少庸同志主持工作，把這些情況給我看了。後來張春橋的老婆把情況寫信給江青，江青如何回答的我不清楚。張春橋規定他老婆不要工作，但長期來在政治上、生活上享受著高幹待遇。因為我有私心雜念，沒有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告，我犯了喪失立場的嚴重錯誤。

在幹部路線上我執行了「四人幫」的錯誤路線，特別是這幾年我要負領導責任。

王洪文去年在招待所生活腐化透頂、吃喝玩樂，每天看黃色反動電影。一九六八年，在十二中全會期間，要辦公室寄二百元給他，上海寄

出了，結果會後一段時間，要結帳時，他竟說錢沒有收到，反問我是否收到。我當時就是一個謎。

後來，他要的補助越來越多，我們雖有抵制，但抵制很不力。開始沒有限制，後來限制七十、一百，後來一百五六，不斷增加。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勸王洪文回北京去抓工作，他說硬要把我往火坑裡送。他還說，我有什麼權，鄧小平的權是毛主席給的。我們要王洪文去看看周總理的病情，他說什麼有得拖了。去年王洪文的情緒，完全是反對周總理，反對毛主席。

張春橋口頭上講抓革命，促生產，但一促生產，他就用教條主義嚇唬人。比如，江南造船廠革命、生產搞得很出色，報紙提出了「江南上去了，我們怎麼辦」的口號。為了這個口號，姚文元開大會澄清思想，開小會批評我，說這是抓生產的口號。我們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對生產方面抓了一下，「四人幫」就用教條主義來嚇唬人。一抓企業管理，就是管卡壓。這幾年生產增長不快，增產不增收，同張春橋的反動方針的干擾、破壞是有直接關係的。去年，貫徹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我犯有嚴重錯誤，主要受了「四人幫」的影響，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抵制派工作組和整風，另搞一套，自成體系。

這次打招呼會議精神，沒有一口氣傳達，原因是中毒深。第一天，聽了華主席、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講話，當時感到很突然，好像打了一悶棍，一時想不通。思想鬥爭了一天。第二天，稍有進步，認為江青、王洪文的問題嚴重，但感到張春橋、姚文元有所不同，所以表態還是含糊錯誤的，建議中央是否可根據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處理。後來經中央領導同志和純麟同志的再三親切教育，十月十一、十二日明確表了態。擁護以華國鋒同志為首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回上海後，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數思想不通的人身上，低估了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群眾的覺悟。對少數思想不通的人做工作，觀點也是模糊的，右傾遷就，只要求他們絕對不能鬧事，一時想不通可以的。

從這次傳達中說明，因我陷得太深，立場沒從根本上轉過來，低估了群眾的覺悟。現在我非常痛恨「四人幫」這些壞蛋，非常痛恨我彎子

轉得太慢。我自己在這方面犯了嚴重錯誤，使各級領導被動，一切責任在我，不怪下面。請同志們對我揭發批判，我熱忱歡迎。現在我一定澈底轉變立場，堅決擁護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和「四人幫」鬥爭到底，在市委領導下在群眾監督下將功贖罪，將功補過。以上是我的初步揭發交代。<sup>26</sup>

## 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待（1976.11.5.）

【徐景賢：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

我堅決擁護敬愛的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堅決擁護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採取英明果斷的措施，一舉粉碎了他們篡黨奪權的罪惡陰謀。我衷心擁護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位領導同志到上海主持工作。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上海一千萬軍民對華主席的無限信賴，對「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無比仇恨，包括對我所犯罪行的無產階級義憤，使我深深地受到教育。我是一個跟著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幹了大量壞事，犯了嚴重罪行的人。中央把我和王秀珍召到北京，十月十二日晚華主席和政治局的領導同志又當面對我們進行了諄諄教育，華主席嚴肅地指示我們「要轉變立場，揭發批判」。但是因為我長期以來跟著「四人幫」陷得很深很深，回上海後在轉變立場的過程中又不斷犯錯誤，在傳達中央精神時我繼續放毒，在幾次聲討、揭發、批判大會上我的態度極為惡劣，甚至聲稱自己是熱愛毛主席、熱愛周總理的，拋出《文匯報》的兩個編輯，污蔑他們不熱愛毛主席和周總理，這是繼續犯罪的嚴重行

<sup>26</sup> 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印發。

為。我辜負了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期望，感到十分痛心。

最近，我反復學習了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打招呼會上的指示，學習了中央十六號文件、吳德同志講話和中央報刊社論，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又對我進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廣大革命群眾也對「四人幫」以及我的罪行進行了大量揭發和批判。我決心和「四人幫」劃清界限，澈底揭發他們的反革命罪行，也清算自己的罪行。少說空話，拿出實際行動來。

### （一）揭發王洪文反對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間，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樓上，一邊喝酒一邊咒罵：「什麼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裡跳！」「現在我有什麼權？黨中央和國務院是他（鄧小平）的，軍隊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黨校的工農兵讀書班！這是毛主席定的呀！」

我和當時在場的馬天水、王秀珍聽了非常吃驚。王洪文有一度在中央主持工作，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確定的，他居然攻擊說是讓他「往火坑裡跳」，真是惡毒透頂。現在知道，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嚴厲批評了「四人幫」，王洪文酒後吐真言，發洩對毛主席的仇恨。而且，他叫嚷「現在我有什麼權！」他要把黨政軍大權都拿到手，充分暴露了他的個人野心。

關於王洪文在上海的反動思想和墮落生活，我曾經想借參加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文化部召開的故事片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彙報。十一月初，我在康平路三樓辦公室對面用保密機給張春橋直接通了電話，要求去北京，他問有什麼事，我說：「王（洪文）在上海說了很多很壞的話，電話裡不能說。」張春橋說：「你現在不能來，你來了情況就複雜了。」堅持不同意我去。過了不久，姚文元老婆來上海，我到招待所去看她，詳談了王洪文的情況，要她轉告姚文元、張春橋。

對這樣的嚴重問題，我沒有向毛主席報告。我總認為王洪文是張春橋等向毛主席推薦的，王洪文出了問題，張春橋等一定要受到牽累。我希望張春橋、姚文元能夠主動處理，對王洪文有所制約。我一心對張、



姚效忠，完全喪失了黨的原則。這說明我澈底站在「四人幫」的反動立場上，而不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黨性立場上。我只考慮「四人幫」的利益，而不考慮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對毛主席犯了大罪。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我經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批准，去北京參加衛生部的一個重要會議後到王洪文處，王洪文大罵外交部某某某同志，他說：「某某某不是好東西，最壞！我去上海以後，有一天某某某來到釣魚臺，對旁邊的人說：某號樓（指王洪文住的那個樓）那個霸王走了沒有？媽的，我是『霸王』，她是什麼？」接著王洪文又說：「外交部某某某也不是好東西，我後悔住在上海東湖路時還專門給他送了螃蟹。」我聽了大為奇怪，因為過去他一直是罵前面一個捧後面一個的。我回上海後，對馬天水、王秀珍、馮國柱等說過：「王洪文講外交部某某某和某某某都不是好東西。」

當時王洪文還說：「主席逝世守靈時，外賓來弔唁，外交部的幾個人在我身後邊介紹，我一句話也沒有睬她們。」

最近到北京參加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打招呼會議，華國鋒主席傳達毛主席指示時，指出「四人幫」要某某某整王、唐，主席講這是「借刀殺人」。李先念同志也指出：「為什麼對外交部兩個青年幹部這麼恨，因為她們兩個瞭解『四人幫』的很多事情。」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就大罵她們兩個青年，他顯然是攻擊毛主席關於「借刀殺人」的指示。他罵某某某是假，罵她們兩個青年是真，而且他罵的絕不僅僅是這兩個青年幹部，他罵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對毛主席關於「借刀殺人」的指示極端不滿。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王洪文還要當著我的面「殺」這兩個青年幹部，瘋狂反對毛主席，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猙獰面目，令人萬分氣憤！打倒王洪文！

## （二）揭發張春橋反對毛主席、反對華主席的罪行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在衛生部開會結束後去過張春橋處。當我說到上海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毛主席逝世十分哀痛，因為我們失去了偉大

的領袖和導師的時候，張春橋說：「今後的工作會遇到困難，主要依靠集體了。」他隻字不提毛主席生前已經安排好了放心的接班人、我們黨的領袖華國鋒同志，什麼「依靠集體」，其實就是要把華國鋒等同志搞掉，「依靠」他們「四人幫」掌權。

接著張春橋又說：「我這幾年參加了康老、總理、主席的三個醫療小組，結果一個也沒有救活。今後我再也不會參加任何人的醫療小組了。」當時我聽了有些納悶。後來看到了他的反動罪證《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懂得了他這句話包藏著篡黨奪權的狼子野心。張春橋當時只是個政治局常委，在他之上還有黨的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同志和葉劍英副主席，張春橋當時只是個副總理，在他之上還有華總理。如果別人生了病，他怎麼辦？他對我說得很肯定：「我再也不會參加任何人的醫療小組了。」這就是說，他根本反對毛主席的生前安排，他要打倒華國鋒等同志，一心想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今後只有人家參加他的醫療小組，他當然不會參加「任何人」的醫療小組了。

那天，在談到上海的工作時，我說在主席逝世以後，聽說市委機關裡對誰誰今後可能擔任什麼職務有些議論，王秀珍已要機關黨委轉告各方面不要議論了。這時，張春橋說：「要謹慎小心，特別是你們幾個人講話要注意。」他特別關照說：「你回去再跟老馬說一說，南京路上出現過的大字報（指要張當總理的大字報）再也不能貼了，這是毛主席單獨向我作過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經給老馬打過電話了，你再說一下。」他一再強調這一點，正好表明他的心虛。此刻他的心情和寫《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時是一樣的。那時，他想當總理，誰知道南京路一張大字報洩露了他的野心；現在，他要篡奪更高的領導權了，所以他特別關照，不要再給他幫倒忙。

我回上海後，把以上的情況告訴了馬天水和王秀珍，馬天水說：「年初時張春橋確實給他打過電話，也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問：「那你為什麼沒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訴我們？」馬天水沒有回答。

那天，張春橋說到謹慎小心以後，把話題一轉，他說：「人家已經講我們是『上海幫』了」！他很惱火地緊接著說：「有一次北京的什麼

外事招待會，偏偏把我們幾個（指「四人幫」）排在一起，那個時候我就給總理提了意見。」

這次我到北京參加了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才知道批他們是「上海幫」的不是別人，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張春橋所說的「人家」講我們是「上海幫」，這個「人家」，就是直接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他的滿腔惱恨，原來都是對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而發的。

張春橋還當我的面對上海工作發「指示」，說什麼要引導群眾，要有信心，要振奮精神，團結的面要廣一些，等等。我回來後對市委常委和朱永嘉說了張的所謂「指示」。也對文教組的一位負責人說了一些，但未講是張春橋的「指示」。這些所謂「指示」，是和王洪文的秘書肖木九月二十八日給市委常委傳達張春橋的話的精神是一致的，什麼要振奮精神、團結的面要廣一些，什麼「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總之，都是在給我們作反革命的打氣和傳授反革命的策略。

張春橋當時還對我說：「要經常分析階級鬥爭的形勢」，這和肖木對常委傳話中說的「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研究」又是一致的。張所謂的階級鬥爭形勢，就是有人要「搞上海」，什麼人呢？張傳話中說：「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這是肖木口頭傳達的，在我的原始記錄本上有，已向中央專案組報告了。所謂林彪、鄧小平式的人物，就是暗指華國鋒同志和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所謂打仗，就是張、王拉起自己的武裝山頭，妄圖利用上海民兵對抗毛主席親自締造的人民解放軍，篡黨奪權。這真是癡心夢想！更瘋狂的是張春橋在天安門廣場追悼大會上，根本不承認毛主席親自安排的接班人華國鋒同志是我們黨的領袖，他反而說什麼「有這麼好的群眾，一定會出好的領袖。」這「好的領袖」是誰，張的傳話中自己供認了：「要看到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他把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說成是資產階級，而他自己就是要「掛帥」的「好的領袖」。據十月十七日王知常在市委組辦會議上交代，肖木在九月二十三或二十四

日給寫作組核心有一封密信，信中講：張春橋說現在要警惕黨內出修正主義，主要是中央，在上層。張春橋不露骨地說：托洛斯基當年是紅軍總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這進一步暴露了張春橋的野心，他以斯大林自居，而要把華國鋒同志等都打成托洛斯基分子，簡直猖狂透頂，反動之極！打倒張春橋！

### （三）揭發江青反對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在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專程來到京西賓館上海組的套間裡，把上海去開會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黃濤，還有某副政委找來，又叫把已經睡覺的南京軍區某某同志單獨找來，偏偏又不叫住在一起的江蘇省和南京軍區的某某和某某某同志（這也是江青分裂地方、分裂軍隊的陰謀）。

江青坐下就說：「你們知道吧？把我也說成是『上海幫』了！」「要集中火力揭批鄧小平，……去年他鬥了我幾個月。我是關在籠子裡的人，現在出來了能講話了，我要控訴他！」

江青還說：「什麼言論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獨立王國，法西斯！」

江青在這裡以控訴鄧小平為幌子，直接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在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曾經指著江青說：「她算上海幫，你們要注意。」毛主席批了江青是「上海幫」，江青和張春橋一樣懷恨在心，那天晚上就到京西賓館發洩來了。

從七四年到七五年，毛主席連續多次批了「四人幫」，批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個人自作主張」等等。江青根本不聽，卻說什麼「鬥了我幾個月」，「關在籠子裡」，「把我也說成是『上海幫』」等，這完全是對毛主席的惡毒攻擊！還有什麼「一言堂」、「獨立王國」、「法西斯」，都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瘋狂之極！

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又讓上海、遼寧和瀋陽軍區的一些同志到她的釣魚臺的住所去。她又進一步發洩：「我是孫猴子，去年他把我關在籠子裡關了幾個月，不能講話，把我籠起來啦，他一念咒，我就頭

痛。現在是『金猴奮起千鈞棒』了。」當時，以為她指的是鄧小平，現在讀了中央十六號文件，知道了從七四年初到七五年五月，僅僅在十六號文件上寫明的毛主席對江青等「四人幫」的嚴肅批判，就有九次之多。江青對此極端不滿，她把毛主席的多次批評罵作「緊箍咒」，什麼「他一念咒，我就頭痛」，這根本不是對著鄧小平的，而是直接對著毛主席的。她根本聽不進毛主席的批評，她抵觸，頭痛，把毛主席的批評誣衊為「念咒」，什麼「金猴奮起千鈞棒」，她就是要造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

上海市委的幾個人到江青釣魚臺住所共去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風會議期間，她到華東組開會時說：「鬼都不上我的門。」後來王洪文就帶著我們幾個去了。江青給我們拍彩色照片，拉攏我們，又請我們看電影「羅馬之戰」，她說她已經看過多遍了。這部電影是講姊妹兩個王族互相殘殺，最後妹妹把姊姊殺死了，當上了女皇。現在看來，毛主席早就指出過「江青有野心」，江青精心研究這樣的電影，絕不是搞什麼文藝，而是學會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權術和手段。所以，她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重的時候迫害毛主席，巴不得毛主席早點去世後「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打倒江青！

#### （四）揭發姚文元反對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四月和五月，毛主席連續批評「四人幫」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之後，姚文元在七月五日來到上海，躲進一個招待所，情緒非常陰暗。七月底的一天，他找我去談談市委的工作情況之後，他忽然說：「我這個人，要我擠擠公共汽車，上上五七幹校，還是可以的。」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說：「假如林彪上臺的話，我們恐怕連五七幹校都進不成呢！」他點頭稱是。後來，馬、徐、王三人在姚文元走以前到他那裡去，他又說什麼：「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

現在才懂得，姚文元在「四人幫」挨了主席的多次嚴肅批判之後，正在考慮自己今後的下場，他害怕「出事」，他準備用「擠公共汽車，上五七幹校」來對抗主席的批判。

當時是七月底，顯然他已經知道了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對影片《創業》的批示，但他根本不向我傳達。在園子裡散步的時候，他忽然問我上海對《創業》的十條意見（即「十大罪狀」）是如何傳達的，我告訴他電影系統、樣板戲劇組等已經傳達到全體群眾，他邊聽邊說：「我堅持我的一條意見，就是當時的黨中央為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影片這樣表現是錯誤的！毛主席自己不會送自己的書，劉少奇送毛主席著作嗎？我在政治局會上也說了。」姚文元走後，我聽到了毛主席關於《創業》的指示，內中講到「罪名有十條之多」，聯繫到姚文元的話，他「堅持」他的所謂一條意見，就是針對毛主席指出的「十大罪狀」而發的。現在我認識到，當時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除了劉少奇，還有周總理等領導同志，為什麼不可以向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呢？姚文元和「四人幫」一起「堅持」自己的意見，就是「堅持」對抗毛主席的批示。後來，我向文化部某某某等說過姚文元「堅持」的這條意見，我還附和同意這條意見，我夥同他們一起抵制毛主席的批示，我是有罪的。

毛主席批評四人幫「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而姚文元在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參加市委常委會講話時，隻字不提「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也不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竭力掩蓋自己的錯誤，拒絕毛主席的批評。

在單獨接見寫作組負責人和姚文元直屬的紅旗組稿小組成員朱永嘉等人的談話時（我未參加，現根據傳達記錄揭發），姚文元別有用心地提出：「研究黨史還是要研究路線鬥爭，後六次是蘇聯通過它們來分裂我們的黨，反對主席路線」。他絕口不提黨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特別不提毛主席批判「四人幫」時強調指出的搞教條主義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的這段黨史。因為主席引的這段黨史擊中了他們的要害：四人幫「統治」我們的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姚文元回避要害，反而要別人把注意力引到後六次路線鬥爭的蘇聯干涉方面去，他完全是用偷天換日、轉移視線的手法來對抗毛主席的批評。當時，他還對寫作組負責人說什麼：「蘇修的領導階層都是搞技術的，而不是搞理論

的。另外，技術方面也出了一批新資產階級分子。」他想用這種辦法把自己打扮成馬列主義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分子」，因為他和張春橋都是「搞理論」的，而不是「搞技術」的，意思就是不會成為修正主義的領導階層。同時，他是想打倒一批「搞技術」，「搞經濟」的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同志，把別人打成修正主義領導和「資產階級分子」。真是欲蓋彌彰，蘇修的領導階層中的蘇斯洛夫不是搞理論的嗎？姚文元也好，張春橋也好，他們和蘇斯洛夫都是一丘之貉。

我和姚文元的關係最深，從認識到密切有二十年左右的歷史，同時他的假像很多，過去我經常吹捧他。這種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很不容易識破。直到從北京參加打招呼會議回來以後，我還沒有和他劃清界限，甚至為他惋惜。可見我陷得太深，轉變立場太慢，當我反復學習中央十六號文件，學習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之後，我又重新翻閱了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看到他利用毛主席一九五九年的指示，把當前我們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篡改成是經驗主義，而且把矛頭直接針對周總理（這一點是馬天水和我在這次參加中央打招呼會議回上海後，找肖木談話要他去北京時，肖木自己供認的），我才對他憤恨起來，我才真正的和他決裂。正如華主席當面淳淳教導我的：「確實轉變立場後會發現一些問題。」我相信，我今後將繼續發現姚文元更多的罪行和我自己的嚴重問題。

昨天我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五年七月他來上海，因為我平時說話、寫東西經常要捅漏子，他教我一個辦法：「以後你搞什麼東西，都要寫成書面稿子，然後送別人劃圈。」我當時很感激他，以為這是要我少出漏子，是一種關懷。現在，華主席、黨中央揭露了「四人幫」的罪行，我看清了，這正是姚文元的一種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陰謀手段，他自己篡改毛主席指示，把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篡改成經驗主義，然後又把文章送毛主席圈閱，這正是最惡毒的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陰險手法。又如毛主席逝世後，姚文元夥同「四人幫」有計劃有預謀地偽造了一個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把它塞進九月十六日的兩報一刊社論，利用中央政治局同志忙於毛主席喪事的時

刻逼大家畫圈，然後連篇累牘地加以宣揚，這實際上是宣揚了「四人幫」，宣揚了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當華國鋒同志發現後，他又嫁禍於人，攻擊別人是「修正主義頭子」，攻擊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背叛馬克思主義，簡直惡毒陰險到了極點。打倒姚文元！

### （五）揭發「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勾當和我跟著他們幹的大量罪行

我緊跟「四人幫」，進行分裂黨、分裂軍隊、篡黨奪權的宗派活動，由來已久。文化大革命以來，我一直非常錯誤地把「四人幫」看作左派，看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代表，把他們攻擊的人，看成是右派。我的立場錯了，是非常顛倒了。張、姚、王在我們面前攻擊中央和軍隊的領導同志，是經常的。我們聽了以後，也是跟著攻擊。王洪文調中央以後，曾經多次來上海，包括陪外賓來滬在內，他幾乎每次都要在我們面前攻擊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和軍隊的領導同志，攻擊中共中央有關部和國務院有關部的領導同志，還攻擊各兄弟省、市、區的領導同志。這些惡毒攻擊的內容我正在繼續寫成書面材料上報。

批林批孔期間，張春橋、王洪文又鼓動我們直接插手軍隊，他們作了所謂批示，要市委常委和警備區聯合開兩委會，揭發警備區和南京軍區的問題，我是最積極的打手之一。在他們指使下，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經常單獨接見軍隊所謂一種觀點的同志，實際上就是跟市委、跟張、姚、王跟得最緊的幾個負責人；另外我們還在某些祕密的點裡接見部隊的同志，進行煽風點火。我們幾個人根本沒有軍職，卻插手軍隊，手伸得這樣長，而且還直接到警備區看大字報。一面看大字報，一面點警備區的一些領導同志的名。在警備區的群眾會上，我還說了「南京軍區的某些領導人一貫正確的神話破產了」這種話，實際上我公開的把矛頭指向軍區的負責人，完全把自己凌駕於大軍區之上。直到前不久，我還插手軍隊，以個人名義送材料，想要揪軍內走資派。這樣就進一步地分裂了毛主席親自締造和指揮的偉大的人民解放軍。

一九七五年七月底到十一月中，王洪文受了毛主席的批判後來到上



海，這一段時間他除了吃喝玩樂以外，攻擊和議論黨中央、國務院、軍隊和各地的領導同志次數更多了。而且他往往是在議論鄧小平的時候，聯繫起來議論了中央、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同志，使我們的腦子裡形成了鄧小平和這些人是一起的、是一幫子這樣的一種概念。

王洪文在上海期間，我們多次勸他是不是回北京去，他不去。十一月初，他在上海看到了清華大學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展大辯論的簡報，當時他非常關心。他告訴了我們，而且說那個地方辯論得很激烈，提到了「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勸他回北京去，他堅持還要再看幾天。這說明他在進行政治投機，他是要看一看究竟誰勝誰負有沒有分曉。又過了幾天，他告訴我們：現在毛主席對教育部也有批示了，對七機部也有批示了。他覺得形勢對他有利了，他就在十一月十五日動身回北京。當時，衛生部來電要有可靠的專人送藥去，王洪文就同意讓我的秘書帶著藥隨王洪文的專機去北京。秘書到北京後由衛生部接待，沒有到王那裡去。辦好事以後，秘書到遲群那裡去過。找遲群時因新華社記者在場，遲群沒有說什麼。但第二天從文化部某某某處瞭解到很多情況。某某某說是遲群跟他說的：清華在批劉冰、周榮鑫了，中央在開會，揭露鄧小平的問題。而且據說鄧的問題是毛遠新從新疆慰問團回來以後向毛主席彙報後揭發出來的。某某某還說什麼毛主席要鄧小平主持、要張春橋參加起草一個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某某某又說：毛主席在接見外賓後，說過：鄧小平八年沒有工作了，不懂得文化大革命，要張春橋給他講講文化大革命。某某某說這些情況都是遲群參加了中央的會議後告訴他的。

十一月十八日左右，我的秘書從北京回來，我和馬、王三人在錦江小禮堂聽了上述的情況彙報，我們心中就有了底了。

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發了毛主席審閱批准的〔75〕二十三號檔，我們認定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就是鄧小平。我們從「四人幫」反動的立場出發，認為既然是兩上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清華出現的問題不是孤立的，而且又有教育部的問題、中科院的問題、七機部的問題，主席都有批示了，我們就認為鄧小平絕不是一個人，而

是一夥子。這一夥子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要算帳，要翻案的走資派。在我的思想上，就想端出一夥來；在我的腦子裡，就是「四人幫」正確，特別是張春橋正確。

十二月《紅旗》發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文章，當時我的心裡非常興奮，認為這是大進攻的信號。在這段時間裡，「四人幫」連續對我們下達過幾個指示：第一是關於發材料的問題。馬天水電話請示張春橋後，張說「不用市委名義發，用下面名義發」。第二是張春橋親自把北大、清華的《大字報選編》批給我們閱，授意上海也要貼大字報，並且指示要上海快編出自己的大字報選。第三是張春橋看到上海有幾個縣、團級幹部對我們這樣批鄧的搞法思想不通，他在十二月中旬的一期簡報上批道：「對這幾位同志……希望他們能夠取得主動權。」第四是王洪文直接打電話給市委，要上海市委把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材料印成單份白頭的一式幾份送他。在他們指示的授意下，我連續幹了一系列分裂黨、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我做的第一件壞事，就是印發材料。我在縣團級幹部會議上聽到同濟大學有一份從國家建委科教局抄來的鄧小平和幾位副總理接見科學院的講話，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文教組拿到幾個大學去印，再讓其他單位去要。後來遲群和文化部某某也都送來了版本，內容有些不一致，經過修訂，以遲群送來的版本為準。此外，我還收到江西省委的一個常委寄來的省委負責人的講話（裡面也有好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姓名），我如獲至寶，一面下發印刷，一面送王洪文。

當時，我印材料的時候完全是搞陰謀，給了一個大學，我又告訴他們不要講是我們給的，是你們自己從什麼地方來傳得來的；給了一個中學，又講不要講是上面給的，是你們自己印的。我曾經偷偷地把張春橋送來的清華、北大大字報選撕下來，複抄後貼到一個大學裡去，一面張貼，一面又讓這個大學進行散發，我還甚至要有的同志帶著材料到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散發。

這樣，大量的不署名的材料就從上海流傳到全國，完全打亂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我做了「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忠實的工具，拋出幾

位政治局同志和副總理的材料，正如華國鋒主席所嚴肅批判的，這是開國以來所沒有過的。我的罪孽十分深重。假如這些材料上有王、張、江、姚的名字的話，我是絕不會這樣做的。這證明，我鬼迷心竅，拚命緊跟「四人幫」，打擊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同志。特別是《紅旗》二月號《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的文章發表後，我看到文章的第二部分批了「馬克思主義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論點，這很明顯地是在批判政治局的一位領導同志，我更加心領神會。我迎合了「四人幫」的旨意，一心想揪出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來，只是口頭上沒有說出來罷了。所有上面這些見不得人的動作，是我跟著「四人幫」幹的，有的我還發展了。在這個問題上，文教系統和其他系統的同志是沒有責任的，一切罪責在我，因為這些陰謀活動都是我搞的。

第二件壞事是收集材料。我曾經從鄰近各省收集材料，比如有關於各地運動的來信，各地右傾翻案風的表現，還有軍隊的情況、來信等，我甚至把外省有人議論張春橋歷史上叛變過的一封朋友的來信，直接送給了張本人。因為我過去多次聽張說：「我從來沒有坐過牢，怎麼會是叛徒！」我居然認為來信提到的問題是對張的污蔑。另外，我還把外地的有些情況，如某某省鐵路局、某某省一個縣的右傾翻案風的表現等、印發給參加縣、團級幹部會議的同志。

第三件壞事是交換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材料，除上面講的幾件以外，還有某省傳來的工業十八條等，都送給遲群、謝靜宜。我又向他們那兒要了很多我們上海沒有的材料，再轉手印發下去。如上海第一次印發的不署名的《鄧小平言論摘錄》等，就是遲群、謝靜宜送來的。

第四件壞事，是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這件事是王洪文直接來電交辦的。由市委布置有關部門收集編寫，然後印成白頭情況或言論摘編，送王洪文和張春橋、姚文元。至今在我的文件裡還找到上述的幾份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黑材料，已交專案組。

第五件壞事是整人。我對一些對上海批鄧的做法思想不通的或我們懷疑他們在外地參與右傾翻案活動的人就整，我在市委常委會上整過王一平同志，在區、縣、局會議上，用各種手段整過農業局、電影局、科

技幹校的領導同志，壓迫他們服從「四人幫」的指揮。

第六件壞事，是非法組織大串連。我根據清華的所謂「經驗」，先在上海兩年大學點火，再布置各校到這兩所大學去看大字報，然後又請市委告各工廠都可以去看大字報，我在縣、團級幹部會議上自己還到處宣講，煽風點火。

第七件壞事是刺探情報。凡是文化部、衛生部、外交部等有的人來，我們認為他們和「四人幫」聯繫密切的，一有機會就和他們吃飯、密談、刺探情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尚未在全國展開時，我就讓秘書趁出差去京的機會，到文化部、《紅旗》雜誌、清華大學去打聽情況，我還讓在京參加全國計畫會議的同志去清華找遲群打聽情況。當清華來人到上海要校辦工廠的機器、材料的時候，我又親自去招待所找他談話，將打聽得來的清華的八條經驗（後來印成中央〔1975〕二十六號檔），先在上海傳了下去。十二月下旬，馬天水生病幾天，我以彙報馬天水病情為由打電話給王洪文問打聽中央和各部運動情況，王洪文說：「路線鬥爭的頭子，改也難」，「下次你們向中央發電報，可以點部老爺的名。」我更瘋狂地想抓出一大幫子來。

我幹了這麼多壞事，當時並不知罪，還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批鄧，就要「突破封鎖」，「打破阻力」，還以為自己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真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竅。說明我跟著「四人幫」幹壞事已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

## （六）揭發、交代在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的反革命大串連

從二月十九日開始，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黃濤、某副政委五人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批鄧打招呼會議。當時，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已指定華國鋒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了。但那次會議期間，上海小組住的京西賓館的套間，變成了一個反革命串連的黑窩。來往的人有王洪文（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來了兩次），張春橋（二月二十日下午、二十三日下午來了兩次，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找馬、徐、王去一次），江青（二月二十日晚來一次，二月二十日晚找上海、遼寧等同志去一

次），姚文元（二月二十二日晚來一次），毛遠新（二月二十二日晚來一次），遲群、謝靜宜（二月二十五日晚來一次），其他來的人有金祖敏、以及文化部、公安部、國家體委、《人民日報》的某某等，還有幾個部、幾個省和軍隊的少數幾個人。總之，每一次碰面，就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一次反革命黑會。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已經作了指示，華國鋒同志已經作了講話，不搞串連，但是，我們卻公開進行反革命串連。

會上，講話猖狂之極，從來不提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同志，幾次會上任意點中央政治局同志、國務院領導同志和軍隊領導同志的名，並議論、攻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列舉如下：

二月二十日下午，張春橋在上海小組套房內攻擊華國鋒同志和紀登奎同志。

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攻擊葉劍英同志，並且指名污蔑各省和軍隊的領導同志是「還鄉團的分團長」、「鄧小平的老部下」等等。

二月二十二日晚，姚文元攻擊華國鋒同志。那天來了一個國務院經濟部門的部長，他說：「現在國務院系統沒有人管。」姚說：「你有主席指示嘛」，根本不讓他找華國鋒同志。同時，毛遠新還攻擊了王震副總理。那個部長又當著姚文元、毛遠新的面，攻擊了李先念同志和谷牧同志。

二十三日下午，江青在十二省市會議上影射攻擊周總理，同時點了大批領導同志的名，後來受到了毛主席的嚴厲批評。

二十六日下午，張春橋找馬、徐、王談話時，攻擊了紀登奎同志。同時胡說先來開會的五個省的領導都難以轉彎，對有的省的領導還指名攻擊。

二十五日晚，遲群、謝靜宜來，和我們密談，竭力把「四人幫」吹捧成批鄧的英雄，什麼「江青放炮，王洪文揭材料，姚文元有理論，最後總是張春橋作結論」等等。他們對絕大多數的政治局領導同志都作了攻擊，有的甚至加以醜化。（以上攻擊內容將另寫書面揭發材料上報）。

「四人幫」還肆意攻擊人民解放軍，如二十二日姚文元、毛遠新來後，談到中國像蘇聯一樣變修後怎麼辦，有的同志說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容易。這時毛遠新當著姚文元的面說：「那時要給你戴上一頂帽子，說你反黨、反毛主席，那時槍口就會對著你。」

在這次打招呼會上，我們還收集了各部、各省「右傾翻案」的大量情況；我和王秀珍還曾到江蘇省的領導同志面前去傳播江青對彭沖同志的攻擊，挑撥關係。

會議期間，我們到清華去聽了一次「經驗介紹」介紹人在會上公開大點某省某部的名，完全和毛主席批示同意的華國鋒同志的講話唱反調，繼續搞亂全國，不讓各地領導轉彎子。

現在看來，「四人幫」反黨集團早已自成體系，為所欲為，稱王稱霸，完全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他們實際上另立了一個中央，拿清華、北大作「視窗，指揮全國。而我們緊跟他們走。我也拿上海的兩所大學做「視窗」來對抗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回到上海，在「四人幫」的鼓動下，我的活動完全和中央的五號文件反其道而行之。（1）我派出記者，收集鄰省的情況上報，配合「四人幫」所謂「亂得不夠」的分裂活動。（2）外地來的人我們接見，議論形勢，搞串連，繼續分裂各省。（3）在各種會議上，我們把清華、北大編的未經中央審定的《鄧小平言論摘錄》（初編、續編）等大量發送。經過我同意發送的有全國電視工作會議、赤腳醫生工作會議的代表。我還向五個省熟悉的省委領導同志送了這兩本材料，並寫信暗示他們也和上海一樣印發。（4）我在各種會議上大講全國右傾翻案的情況，進行煽動。（5）繼續交換材料，遲群專門打電話來要馬天水在全市萬人大會上揭發鄧小平的材料，我給他送去了。直到毛主席逝世以後，他還和謝靜宜送馬、徐、王新編的未經中央審定的《鄧小平言論摘編》各一本。

總之，開會回來以後，我的分裂黨、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變本加厲。在這個過程中，江青還專門指示文化部組織幾個電影廠給清華、北大和上海的幾所大學和工廠拍紀錄電影，給我們幾個人的

反革命分裂活動打氣。上海市委內我們這幾個人，已經成為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公開的大聯絡點、黑基地，正如有的領導同志所批評的那樣，我們幾個人不僅是獨立王國，而且還到處伸手插手，比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還厲害。「四人幫」搞篡黨奪權，已經用不著篡奪上海的權了，上海的權早已在「四人幫」的手裡了。

上海廣大的幹部和群眾，包括文教戰線上的同志們在內，他們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而「四人幫」和我卻利用批鄧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同志。這種做法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抵制，證明他們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而我卻緊跟「四人幫」，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就是反對毛主席。我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

我在掌握輿論工具的過程中，也是按「四人幫」的意圖嚴加控制。宣傳報導，大會小會，突出地宣揚「四人幫」，長期以來一直是如此。而且我還向中央封鎖消息，有關上海的問題和陰暗面，不准報紙發一般情況，只准發增刊、白頭甚至手抄的情況，對「四人幫」不利的情況一律扣發。「四人幫」說一句話，我就照辦。在北京時，我們幾個到張春橋那兒去，張反復說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段指示，張春橋別有用心地強調凡是鬧派性的地方，主要是走資派的挑動。他根本不顧中央五號文件的規定，他還要繼續層層揪走資派，而不讓犯了錯誤的同志轉好彎子，反對「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他當時還講了讀《阿Q正傳》的體會，說什麼小D和阿Q打架，鬧派性，還不知道是走資派趙太爺的挑動。我回來就把張春橋的話告訴了寫作組，讓他們在《學習與批判》上寫出了那篇論阿Q、小D的小辮子和黨內走資派的大辮子的文章，繼續鼓吹要層層揪走資派，這是我對抗毛主席關於批鄧的戰略部署的罪證。

我在宣傳方針上，對「四人幫」唯命是從。在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以後，上海廣大群眾十分哀悼，上海的報紙和刊物除了發表中央的訃告、悼詞、報導和唁電外，都想發表本市的弔唁活動情況和群眾的悼念文

章，有的報導像《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等都已寫出，有些文藝、詩歌、短文等也排好了，但我打聽到新華社、人民日報以及各地報刊的口徑後，知道「四人幫」不讓登。當時，《朝霞》約了文藝界的幾位同志寫了悼念文章，我又要寫作組文藝組的負責人直接去問肖木可不可以登，答覆是不登。這樣，我就把上海本市的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文章統統拉下來了。我和市委的幾個同志商量，決定採取在幾個刊物內專加一個插頁的辦法，精印總理的照片和訃告，表示悼念。最近據揭發說後來姚文元通過《紅旗》編輯部提出批評。有一個《上海少年》的刊物我們沒有通知，結果登了一篇周總理來到少年宮的悼念文章，姚文元知道後又批評。「四人幫」對總理是如此刻骨仇恨，而我卻聽從他們的旨意，砍掉了很多篇上海人民悼念周總理的文章，我對敬愛的總理犯了大罪，我對全市人民犯了大罪。

我對華國鋒同志的態度，也完全是以「四人幫」的態度為轉移的，早在華國鋒同志擔任國務院業務組領導工作的時候，張春橋就說過貶低華國鋒同志的話。周總理逝世以後，我內心是想要張春橋當總理的，但我覺得他樹敵太多，資歷不夠，恐怕擺不平。當時，馬天水還想給毛主席寫一封信，建議要另一位副總理當總理，我和王秀珍反對，我們說這類大事應該聽主席的安排。等到一九七六年一號文件發來以後，我們對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大為意外，在康平路學習室議論時，我和馬天水都認為：華國鋒同志為人比較中間，左右都能接受。因此在市委向中央發電報擁護時，對一號文件是批鄧鬥爭的勝利講得很多，對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和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陳錫聯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只是表示堅決聽從主席的安排，擁護毛主席的提名和政治局的決定，沒有作什麼評價。這證明我中「四人幫」之毒太深，把他們看成「左派」而把別人都看成中間派和右派。「四人幫」又向我們封鎖毛主席親筆寫給華國鋒同志的「你辦事，我放心」的重要指示（華主席最近告訴我們，姚文元在政治局會議上親自看過這指示）。我們從「四人幫」的觀點出發，任意歪曲毛主席的安排。我聽了「四人幫」的話，就不聽毛主席的話。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以後，上海群眾的反映很強烈，而我卻幾次把報社情況



簡報上群眾對毛主席的安排感到放心的完全正確的內容，以及群眾對華國鋒同志高度評價的語句，大量刪去了，只留下較為簡單的表示擁護的內容。我的罪責是極其嚴重的。今年二月底，我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會時，遲群這個傢伙在吹捧「四人幫」後，提到華國鋒同志，竟然冷冷地說：「還可以，人還忠厚」。他們這幫子其實早就知道毛主席對華國鋒同志的高度評價了（這次粉碎「四人幫」打招呼會上，汪東興同志傳達的毛主席親自選定華國鋒同志為接班人的三條重要指示），但遲群等人卻還要如此攻擊華國鋒同志，這完全是和毛主席唱反調。王洪文的秘書肖木，有一次曾告訴我，「國鋒同志表示自己馬列水準低，毛主席說就選一個馬列水準低的當。」肖木又說：「毛主席還告訴張春橋、王洪文說，不一定有能力的人當主要領導。」不論後者這話是否當真，總之，毛主席是在警告張、王等人，毛主席早就看出了他們的野心，對他們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而今年二月張春橋在會見馬、徐、王時，我們請他回上海一次，他卻假惺惺地說什麼：「國鋒同志剛出來工作，需要支援他，我離不開。」我中了「四人幫」的毒，完全歪曲了毛主席選定華國鋒同志為接班人的偉大的和深遠的意義。我有一次到寫作組開會時，居然胡說什麼：「毛主席很會處理各種關係。去年鄧小平上臺，因為只有鄧最適宜，能把黨政軍一把抓。現在鄧垮臺了，毛主席又決定讓華國鋒同志當代總理，因為只有他最適宜，能把各方面擺平。」我還說什麼：「不一定水準最高的人當第一把手。九大時毛主席就說過，好人不一定都進中央委員會，還要處理好各種關係。」我這些話，吹捧了張春橋，同時把矛頭直指華國鋒同志，也是直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的。我貶低和反對華國鋒同志由來已久，這也為我在直接指揮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過程中，後來把矛頭直接指向和惡毒攻擊華國鋒同志，提供了反動的思想基礎。

至於「四人幫」搞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非常兇惡的。在多起事件上我都做了幫兇和打手，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張、姚來上海，在延安西路200號開會，主張工宣隊脫工裝，直接違反毛主席的指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復旦的工宣隊盧善鵬等同志提出了

正確的意見。有一天，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以及朱永嘉找了馬天水，馬天水把我找去，聯繫到另一位工宣隊員講了幾句不滿意張春橋的話，張的秘書就說是復旦第三次炮打開始了。他馬上上報材料，張、姚批下來說，這個會是總結經驗，有什麼不可以開的等等，我就對復旦黨委的負責同志施加壓力，逼著復旦黨委和工宣隊把盧善鵬同志等批了很多次。以後張春橋又充當好人，批了個意見說算了不要搞了，才停下來。這完全是政治迫害。而我則是這場政治迫害的直接指揮者，我向受害的盧善鵬同志等沉痛請罪。

### （七）專題交代我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罪行

我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要害是死保「四人幫」，以武力對抗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我不但同意調動民兵、軍隊，準備反革命輿論，而且有惡毒攻擊華主席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論。我如實交代如下：

十月七日晨，中央辦公廳通知馬天水去開會，我就感到突然。因為：（1）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北京見到張春橋、王洪文兩人時，都問過近期有什麼會議，他們說沒有。此事回來後和市委常委說過。（2）九月二十八日肖木來滬給市委常委傳張春橋的話時，我們問他，說也沒有會議安排。

接著，馬天水告訴我和王秀珍等，這次開會，中辦又直接通知了周司令，這是從未有過的。過去都只告訴一個主要負責人。這又引起了我們懷疑。

同時，王秀珍連續給王洪文在北京的秘書打電話，根本打不通。

上飛機前，我們約好要馬天水的秘書抵京後來電話和我們通個氣。結果因為他找不到王、張、姚的秘書，電話未來。

七日晚上，王秀珍找來金祖敏在上海辦事的秘書，通過京西賓館的熟人電話找到馬天水的秘書，說尚在待命，會議有上海、江蘇、山東、湖北，還有南京軍區、濟南軍區、武漢軍區等參加。

晚上十一時左右，我給文化部某某某打電話，他說原定八日帶文化代表團出國，忽然接到華總理指示不出國了。我覺得一定出了大事，因

為毛主席逝世時有些代表團還照常出國的。

半夜，我給衛生部某某某通了電話，她正在開會，她說沒有什麼事，不過《人民日報》的某某某昨晚也打電話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王秀珍把我、馮國柱、張敬標找到康平路小禮堂商量。我們又決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以及廖祖康、肖木都找來。他們分頭給北京姚文元的秘書、姚的老婆、釣魚臺王洪文的秘書、警衛員、司機、服務員等打電話，又給紫光閣的某某某打電話，廖祖康甚至給八三四一部隊值班科打電話，都不通。我又給遲群打電話，秘書給總政的一個熟人打電話，都不通。我和肖木再分別給人民日報某某打電話，他神態反常，旁若無人。我還給浙江、福建省的領導打了電話，沒有摸到情況。

最後，張敬標給馬天水秘書打通了電話（當時馬已經去參加政治局召開的第一次會議回來了，思想不通，影響了他的秘書），秘書在電話中情緒低落，說是「胃病發作」；廖祖康搶過電話，聽後也是同樣的內容。

我覺得應該親自給馬天水打一次電話，因為他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接通馬的秘書後，我說我有極其重要的事要請示馬老，一定要馬老通話，他去請示後答覆，馬老不能聽電話；我又問，馬老究竟在不在？他答：馬老身體不太好。我再問，你那裡情況究竟怎麼樣，他明顯地暗示：「我的老胃病重犯了。」放下電話後，經辦公室瞭解核實，他沒有什麼胃病。

同時，我們收到警備區作戰處的電話記錄說，軍委首長指示，部隊戰備工作轉入正常後，發現有的單位有些鬆懈，請檢查一下。戰備工作不能放鬆，仍應提高警惕，注意敵情，邊防（沿海）防止內遣外逃。我們讀了這份電話記錄以後，大家議論紛紛：一級戰備剛撤銷，為什麼又要加強戰備，而且要防止「內遣外逃」。「老胃病復發」，是不是指老帥或某些軍區的負責人動手了。加上警備區又來通知，說總政原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閱讀現場會議不開了。於是，大家判定肯定出事了。當時在場的有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四人幫」和我們的一切聯繫被割斷了。由於「四人幫」的長期毒害，我憑我的反革命政治敏感性和上述的一系列跡象判斷，覺得極可能發生了軍事政變，而且已經把「四人幫」扣起來了。

午飯前，王秀珍約金祖敏的秘書來，要他下午隨一架專機到北京去摸清情況，約定最嚴重的情況暗號為「心肌梗死」。

同時，我同意了王秀珍提出的下午要找民兵負責人，王少庸提出的要找公安局負責人來打招呼；我還主動提出，下午要找報社、電臺等新聞單位的負責人來打打招呼。

午飯後，我休息片刻，從我家中書櫥櫃子內取出一九七五年初我寫給張、姚的三封信的底稿，把它燒了。（此事已向領導報告另作專題交代）

接著，我們就和公安、民兵的負責人打了招呼。此前，王秀珍把部隊的兩個負責人也找來談了一下。我找新聞單位的負責人打招呼時，給他們灌輸了反動思想。我說了中央台通知停播的兩首歌曲《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某某突然不出國了。和人民日報的某某通電話時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領導都聯繫不上，又來了「老胃病發作」的暗示，可能出問題了。我談了軍委首長加強戰備的指示，然後從我自己的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的推想出發，我非常反動地說：蘇修侵捷時捷克國家廣播電臺只聽一個負責人員利康的指揮，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聲明，根本不聽蘇軍的。我布置新聞單位加強保衛，還說準備調民兵去保衛。我要他們發表什麼東西，都要告訴市委，實際上想把輿論都控制起來。當時。我又找來《人民日報》研究，發現七日《人民日報》第三版上還出現過「按既定方針辦」黑體字，所以最後我說，「還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下午五點多鐘，由我主持召開常委、列席常委會議，把我們的反動估計向大家打了招呼。但因為懷疑軍隊，沒有通知應該列席的武占魁同志（空軍）和康莊同志（海軍）參加。

晚上七時半左右，我在劇場裡接到文化部某某來電，說他們給釣魚臺江青那個樓打通了電話，是服務員某某接的，「說首長身體好，現

不在家。」

我馬上趕回康平路學習室，講了文化部電話，廖祖康聽了表示懷疑，他馬上打電話到釣魚臺江青那個樓核實，接電話的是放映員某某，說服務員某某今天根本沒有來過。廖判斷剛才文化部打通的電話是假的。他又告訴了王、張、姚的三個電話號碼，讓文化部再打一遍，不久他們回電說都打不通。我又告訴他們打電話找馬天水試試。

與此同時，金祖敏的秘書從北京打來電話給上海警衛處某某某報告暗號：「我娘心肌梗死」！大家都驚呆了。

接著，公安部某某某又電告，說剛才金祖敏的秘書曾經進過京西賓館，後來在他那兒打的電話。公安部某某某在電話中說了三句話：「人員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

最後，文化部某某某來電話：「馬老不接電話。我們都病了，有病情。」

這時，肖木驚叫起來，「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

於是，大家議定再也不能往外打電話了，下一步可能要對我們動手。形勢嚴重。

這時，在場有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朱永嘉突然提出，「我看這次是某、某兩個結合，其他人是搞不起來的。」他是在會上把矛頭首先直接指向華國鋒同志的第一人。

大家聽了都楞了一下。廖祖康同意朱永嘉的分析，並說：「8341」部隊是很厲害的，聽某主任的，沒有某主任指揮，一下子搞掉四個人是不容易的。」

朱永嘉又說：「他們先抓人，然後宣布一個決定，說這幾個人反黨。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樣。」

大家都不響，我當時把這些話都聽進去了，證明我的反動思想是和他們一致的。

這時，大家都急著怕被抓去，怕當天晚上被一網打盡，議論要分兩

個點，撤出康平路機關。王少庸說白天問過民兵情況，很分散。有同志去問了一下民兵數字，值班的二千五百人，分在各廠，還有三萬一千人以待命（後來瞭解實際只有一萬一千人）。王少庸又問：有沒有一個團的力量形成拳頭。這時廖祖康提議要把幾個部隊的負責人帶在身邊，我們同意了。大家催著快分散，由我執筆開了兩個名單，分兩個點：

一號點，設在一個招待所，有徐景賢、王少庸、張敬標、朱永嘉、部隊的兩個領導以及我的秘書等人。這是文的一路。二號點去民兵指揮部，有王秀珍、馮國柱、廖祖康以及部隊的兩個領導等。這是武的一路。在徵求意見時，張敬標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機關，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陝西北路經濟組找幾個人，準備輿論，我同意了。這時廖祖康又提出要把工總司的老造反頭頭集中起來，朱永嘉表示支持，說這樣可以發動工人，我也同意了。廖祖康提出黃金海、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某某等人的名單（後來他們又加了汪湘君），我一一記下交給了王秀珍。這時，大家急於分散，我又給王秀珍寫了一張紙條提醒：請民兵加強戰備，二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人待命，加強值班，並立即派民兵加強對電臺報社的保衛。分手時說定，大家作好準備，最後聽徐、王指揮。

於是大家一哄而散。一號點的幾個人在學習室等部隊的兩個人前來。不久，他們來了，我也跟他們打了招呼。這時正好半夜零點，電臺廣播中央的兩項英明決定。聽了廣播，「四人幫」過去灌輸給我的反動思想更為抬頭，我進一步懷疑這兩個決定，特別是第二個決定，我一聽是要儘快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而我九月二十一日到張春橋那裡去時，他還說過：「考慮不準備分別出五卷、六卷，準備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經主席審定過的文章先合成一冊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起爭論，同時，其他文章一時也審定不了。」我聽了中央的第二個決定，覺得和張春橋的意見不符，而且我估計一定是在沒有他參加的情況下作出的。我心想：五卷怎麼可能「儘快」出版呢？特別聽到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提法，我更進一步發展到惡毒攻擊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在坐上汽車到某招待所的路上，我對王少庸說：「發這兩個決定的做法很壞，他們撈了稻草，看來是個陰

謀！」當時，我的反革命思想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我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對我們敬愛的華國鋒同志這樣肆意惡毒攻擊，完全配合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該萬死。

到了招待所，大家都休息了，前後處理過三次電話：先是朱永嘉來電，要找我談，不同意九日上海兩報發中央兩個決定，被秘書擋了回去。其次是張敬標來電，說朱永嘉在他那兒談了很久，他很同情朱永嘉，還是要來找我，秘書用我已經休息了為理由又把他擋回了。第三個電話是凌晨兩點半左右，廖祖康從民兵指揮部來電說有要事，秘書把我叫起來聽了電話，電話中廖祖康說：秀珍、國柱同志他們意見要加強電臺和市委機關的保衛，建議請某師長通知電臺的警衛連，由電臺負責人指揮；康平路機關的警衛連由市委辦公室指揮。我記下了字條給了部隊的某師長（和我們同住在一號點）去部署，這實際上是下了調動軍隊的「手令」。同時，秘書告訴我朱永嘉準備不讓上海兩報發中央的兩個決定。我當時的反動思想是和朱永嘉一致的，但我覺得中央這兩個決定本身是廣大群眾擁護的，報紙不發的話會失去群眾。因此我覺得還是要發，所以立刻給寫作組某某某打了電話，告訴他報紙要登兩個決定，要朱永嘉穩住。

這時，二號點的活動在民兵指揮部進行。

九日早晨，馮國柱先到一號點，接著張敬標來了，王秀珍在安排張春橋、王洪文的家屬後也來到了。我和他們商量，今天如何對兩項決定表態。我們就一起返回康平路學習室，讀了中央兩項決定的清樣。我繼續從極端反動的思想出發，細看了第一項決定，覺得找不到岔子；細看了第二項決定，我覺得一沒有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沒有寫批鄧，三沒有寫以階級鬥爭為綱，四沒有寫「按既定方針辦」，我說我們的表態電報要把這四條加上，這實際上是要和中央的決定對著幹。馮國柱建議，我們可以表態擁護兩個決定，但不要提「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我同意了。我們還議論到：這第二項決定裡中央辦公廳很突出，我數了一下共有三處。我們當時的反動思想仍是攻擊華國鋒同志和汪東興同志的。張敬標就根據這些意見打電話給辦公室起草文

件的同志，要他們照辦。我們又商量還要繼續給馬天水打電話，問如何表態。

十時左右。昨晚分散的人又集中起來。這時，從電話裡得知文化部、衛生部那裡已經收到中央十五號文件，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於是，我急著給馬天水打電話。當時，馬天水已經參加了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接見回來，但他仍不肯接電話。我對馬天水的秘書說中央發了兩項決定，聽說還有一個十五號文件，如何表態。他放下電話去請示後答覆八個字：「熱烈表態，堅決擁護」。我接完電話，在場的常委同志一致不滿意，說這麼重大的事，馬天水為什麼不接電話。於是常委決定，一定要馬本人接電話。因此又推王秀珍去打電話，磨了好久，馬天水終於來接電話了，他還是要我們熱烈表態，堅決擁護。王秀珍問他見到三位領導（指王、張、姚）沒有？身體好不好？這時馬天水撒了一個謊，他說：「他們身體還好，工作比較忙，沒有時間和我個別談了。」這樣一來，大家就如釋重負，說是一場虛驚。於是趕快準備起草兩個電報，一個是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兩項英明決定，一個是熱烈歡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當天下午，我們收到了十五號文件，立即召開了常委會和組、辦擴大會議，會上我還說：「馬老和周司令到北京開會，剛才通上了電話，見到了上海在中央工作的三位領導，他們身體都還好，工作很忙。馬老要我們對中央的兩項決定和十五號文件熱烈表態，堅決擁護。」

從表面上看，我們確實寫了兩個比較熱烈的電報，而在我的心目中，根本不是真正的擁護華國鋒主席。而是錯誤地判斷了形勢，認為是「四人幫」擁護的，這樣我才擁護。說穿了，我擁護的是「四人幫」，不是華主席。在我看來，「四人幫」就是黨中央，黨中央就是「四人幫」。這就是我的反動立場，說明我早就死心塌地跟定「四人幫」了。

發了電報以後，吃過晚飯，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銷民兵的戰備集中和待命的決定，馬上恢復正常，不然要引起誤會。王秀珍當即向民兵指揮部施尚英打了電話，告訴他：「撤銷五位數（即三萬一千人，實際上只有一萬一千人），保持四位數（即二千五百人）恢復正常。」



王秀珍再次問施尚英：「你懂了嗎？」施回答：「懂了。」

接著，我和王秀珍在學習室和廖祖康談話，要他即撤銷廖祖康設在另一個招待所的那個據點，他表面答應了，在座的有馮國柱、張敬標等同志。（後來據瞭解，他們那個點根本沒有撤銷，由黃濤、廖祖康直接操縱和指揮，把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戴立清、施尚英、某某某等弄在一起，等於另立一個市委，一直搞到十三號我們回來以後。）九日晚上馬天水通知我和王秀珍去北京，並說由空軍派專機來接。十日凌晨，我獲悉新華總社趙棣生同志通知新華分社徐壽鏗同志，今後不再提「按既定方針辦」，我即請秘書告文匯、解放兩報負責人，上海報紙宣傳要以人民日報、新華總社為準。並告訴了寫作組，但忘了通知人民電臺。

十日上午，發表了兩報一刊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我和王秀珍、馮國柱、張敬標在我辦公室裡又錯誤地分析了形勢，認為社論所說：「搞垮我們黨是不容易的……是註定要失敗的，」可能是有人反對華國鋒同志，而「四人幫」是站在華國鋒同志一邊的，結果勝利了。但我們仍懷疑中央出過事，還懷疑中央辦公廳的主要領導同志。十日中午，文化部某某某等來電詢問時，我還把這個完全錯誤的形勢分析和反動的懷疑，告訴了他們。下午，專機抵上海後聽說江蘇、山東的負責同志都要回來了，而我們卻還要前去；心中就認為上海在中央的三個人，肯定有人出事了，並認為可能是王洪文，中央要徐景賢、王秀珍去，是為了回來做新幹部的工作。後來，專機到了鄭州停靠後，要將機上人員一一報名單後才准予起飛，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又使我們疑心生暗鬼，準備到了北京以後豁出去回不來了。走以前，我們還和常委約過暗號，但晚上到了北京，聽了馬天水、周司令講了中央會議的精神，聽到有毛主席關於解決「四人幫」的多次指示，我們的思想雖一時還不通，但我們商量後覺得應該立即電告上海穩住。打電話的內容經過書面請示中央辦公廳同意後，我當晚即打了電話，告知馮國柱：「我們已經平安到達，一切等我們回來以後再定。」以後，十一日、十二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馬天水打一次電話，告知上述精神；十一日還通知上海的宣傳口

徑要按照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以上精神，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他們是基本執行的，他們做到了「一切等我們回來再定」這一條。但是，黃濤、廖祖康的一個點和朱永嘉、肖木的一個點，後來繼續搞了大量的活動，一直發展到十二日晚上的進一步大鬧，布置反革命武裝暴亂和十三號的反革命吹風。這是我們在八日陰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活動的一種惡性繼續和發展，我雖不在上海，但仍要負最主要的罪責。這次在上海發生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我是直接的決策者的指揮者，我之所以能幹出這樣的事，絕非偶然。這是「四人幫」長期以來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產物。

「四人幫」妄圖把上海民兵作為他們搞陰謀、搞野心的工具，蓄謀已久。上海民兵指揮部過去一直叫「文攻武衛指揮部」，「文攻武衛」的名稱就是江青提出來的。後來，張春橋看到全國都叫民兵指揮部，上海仍叫「文攻武衛」，感到太露骨，便下令把它改掉。但他們仍然要把上海民兵指揮部作為市委、市革會的一個直屬武裝部門，不讓警備區插手。

一九七三年八月，突然以中央的名義把一九六七年張春橋寫給毛主席的一份關於在鬥爭中重建上海民兵的報告，影印後發給全國各省市，上面寫有毛主席批給幾個人閱的批示，但我記得毛主席並沒有寫「同意」等批示。當時，市委還專門召開會議進行了學習討論，並傳達到區、縣、局的幹部，造成一種印象，使人覺得上海這樣搞民兵武裝山頭是完全符合主席路線的，是合法的。我現在懷疑，這是張春橋、王洪文他們搞的一個陰謀。因為這個文件只講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建上海民兵，根本沒有講民兵脫離軍隊的具體領導之類的內容。「四人幫」想以這個報告為掩護，在上海拉出一個武裝山頭，和毛主席親自締造的人民解放軍相對抗，這是他們籌畫經營已久的要害問題。這個影印件是發至全國各省市存檔的，請華主席、黨中央重新予以審查。

去年七、八月，王洪文來上海期間，在錦江小禮堂開了一次黑會，王洪文在會上狂叫：「要警惕出修正主義，要準備上山打遊擊！」「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後我還要把這支隊伍拉出來！」這更澈底地暴露了

「四人幫」的殺氣騰騰的個人野心。

今年批鄧打招呼會時，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到京西，對我們說：「鄧小平想敲掉上海民兵的經驗，他要某某省抓出材料來，否定上海民兵的經驗。上海民兵是毛主席支持、關懷的，春橋和我兩個人搞的嘛！」這充分證明張、王妄圖把上海民兵作為他們篡黨奪權的工具由來已久。我為他們拉武裝山頭大造輿論。我跟著王洪文去打過靶，我還建議過一個單位的民兵學開飛機。我為他們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幹得非常賣力。

總之，「四人幫」長期以來，違背毛主席的「黨指揮槍」的教導，分裂黨，分裂軍隊，擅自大立上海民兵的武裝山頭。幾年來，還擅自發了大量的槍支彈藥和輕重武器。同時，張春橋經常對我們講：「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我早就準備殺頭了。」這是在灌輸「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反革命思想。王洪文經常叫嚷：「要上山打遊擊」，「進某某山（上海附近的國防工事）堅守」，「上海沒有退路，兩邊一夾擊，只能死守」等等，肖木九月二十八日來傳話，暗示林彪、鄧小平式的人物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這就等於下了反革命的動員令。長期以來，我對「四人幫」唯命是從。在我的眼裡，「四人幫」就是黨中央，張春橋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代表，是碰不得的。誰反對「四人幫」，我就要死保他們。我認為，軍隊的同志如果反對他們，我要和軍隊的同志拚；而這次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就負隅頑抗，同意調動民兵、軍隊，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妄圖以武力對抗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我的罪孽是萬分深重的。

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上海廣大民兵，在階級鬥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四人幫」和我們幾個人妄圖蒙蔽廣大民兵，進行反革命武裝暴亂，但是廣大民兵發覺了陰謀以後，奮起造了「四人幫」和我們的反，這說明上海民兵具有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最近人民廣場的十萬民兵大會，顯示了上海民兵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一切行動聽從華主席為

首的黨中央指揮的堅強決心，對「四人幫」和我也是最有力的聲討和批判。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根子在「四人幫」，但我犯下了彌天大罪，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我向敬愛的華國鋒主席請罪，向黨中央請罪，向全國人民和上海人民請罪。我請求中央給我以最嚴厲的處分。

在北京時，華主席諄諄教導我們「要轉變立場」，但我回來以後，開始總以受「四人幫」蒙蔽者自居。在中央領導同志面前，我們講過以前不知道有「四人幫」，但是，現在看來，我只是不知道「四人幫」這個名詞，而實際上我是清清楚楚知道這四個人是抱成一團的。我自己則是和「四人幫」連在一起的，我把他們的命運看作是自己的命運，他們垮臺了我就驚惶失措。回到上海以後，我還沒有認識到這場鬥爭的性質，還把自己放在無產階級一邊。經過反復的學習和思想鬥爭，經過領導的教育和群眾的批判，我才逐步認清了這場鬥爭的性質。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不鬥怎麼行呢？「四人幫」搞篡黨奪權，自成體系，我就是這個體系裡面的一名得力的幹將；「四人幫」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我就是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的。我跟著「四人幫」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就必然搞修正主義。用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則來衡量，我那裡是什麼「左」派呢？右得無可再右了，是極右。我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話，只聽「四人幫」的話。我中毒太深。在全市兩個熱烈歡呼的慶祝大會之前，當我看到致敬電初稿上寫有「敬愛的華主席」，我內心深處居然對「敬愛的」三個字感到很彆扭。我的思想是何等反動呀！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以後，華主席在我們黨和國家面臨著修正主義復辟的最危險的時刻，採取了英明果斷的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我們的黨。華主席就是值得敬愛！華主席就是我們黨的當之無愧的領袖！當我的立場逐步轉變的時候，我才真正產

生對華主席無限信賴和無比熱愛的感情。我極度憤恨「四人幫」，我也極端憤恨我自己所犯的罪行。我跟著「四人幫」走得太遠了，現在「四人幫」已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不願意和他們一起滅亡，我要改悔，我要脫胎換骨，我願意澈底揭發、澈底交代「四人幫」和我自己的罪行。上海廣大民兵幹部是沒有責任的，文教戰線和其他戰線廣大幹部是沒有責任的，主要罪責全在我。我懇切地請求大家澈底聲討、清算我的罪行，對我揭發批判，進行挽救，我決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請敬愛的華主席，請黨中央，請市委領導同志和全市軍民看我的行動吧！<sup>27</sup>

## 王秀珍的揭發交待（1976.11.6.）

【王秀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

過去，我跟「四人幫」反黨集團跟得很緊，幹了很多壞事，陷得很深。從九大時起就跟著「四人幫」，崇拜他們，迷信他們，對他們感恩戴德，跟他們幹了很多壞事，犯了嚴重罪行。經過華國鋒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耐心教育，經過同志們和廣大群眾的揭發、批判，我決心同「四人幫」反黨集團劃清界限、澈底決裂，同時澈底清算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現在，我進行揭發和交代。

### （一）首先揭發王洪文這夥人瘋狂地對抗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去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嚴厲地批評了「四人幫」，向他們發出了嚴正警告。但是王洪文根本不聽毛主席的批評，反

<sup>27</sup> 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印發。

而懷恨在心，竭力對抗。就是在毛主席批評後，王洪文在去年七月竄到上海。到上海後，他就讓秘書廖祖康對市委辦公室同志說：要給他準備一間辦公室。意思是王洪文不準備回北京了，要與毛主席對抗到底了。有一次，馬天水、徐景賢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脫口而出說：我有什麼權！黨的權、政府的權、軍隊的權，都沒有。我只有一個辦工農兵學習班的權。他還大肆發洩說：什麼要我主持工作，是他們把我往火坑裡推。他還說鄧小平能見到主席，他見不到。這些黑話，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真是罪大惡極。這些黑話，也充分暴露了王洪文的野心。我聽了這些反動的話，沒有報告毛主席，我有罪。

在毛主席那次批評「四人幫」後，姚文元也來過上海。我向他彙報工作，要他見總工會全委會的同志，他對我說：你不知道，我在那裡處境很困難呀。接著又說：我身體還可以，還能擠公共汽車，我準備到五七幹校去啦。他還說下半夜要出什麼事（我當時不懂他的意思）。這完全暴露了姚文元拒絕毛主席的批評教育，不肯改悔的頑固立場。

對鄧小平的解放問題，毛主席有過幾次指示，「四人幫」一直是抵制的，反對毛主席的（張春橋在今年二月就講過：鄧小平出來工作，江青是不滿的）。直到一九七三年，根據毛主席指示，中央發了文件，恢復鄧小平副總理的職務，轉發了他的檢查。當時，我對鄧小平的檢查是不滿的，對鄧小平的解放、任用有看法。後來，在市委對這件事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流露了這種情緒，採取了一種保留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實際上是同毛主席指示唱對戲。這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問題，就是反對毛主席。

還有對待陳丕顯同志的問題。「四人幫」一直抵制、反對解放陳丕顯。後來毛主席作了批示：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才不得不於一九七四年解放陳丕顯。但是，「四人幫」還不甘心。王洪文於七四年十月九日打電話給徐景賢同志（第二天又打電話給我）說：陳丕顯要解放啦，快叫專案辦打報告，你們快點提一批一月革命風暴的老頭頭名單出來。意思就是把陳丕顯的一些對頭人提出來。後來，根據王洪文的旨意，我同其他同志商量提出了一份一百八十一人的所謂「老頭頭」的名

單送給他，有十多個人都作了安排，其中有某某某等人。這樣搞，名為「落實政策」，實際上是同毛主席的批示對著幹。在這一件事情上，我也有罪，參與了「四人幫」對抗毛主席指示的罪惡勾當。在市委討論陳丕顯的職務安排時，原來提出安排為市委委員和市革委會副主任。後來張春橋說：先安排副主任，黨的職務以後再考慮。我們按照張春橋的意思，修改了原來的安排。今年二月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時，姚文元對我們說：對陳丕顯，我們是落實政策的，安排他當副主任，鄧的問題是要搞兜底翻。張春橋對我們說：鄧小平轉送陳的信，沒有告訴他，他大發脾氣。後來還聽了金祖敏講陳丕顯的壞話。我回上海後，傳過和說過「陳丕顯同志到北京後，住京西賓館門庭若市，一周換幾套服裝，末班車沒有軋上」等一些話，這也是錯誤的，因為陳丕顯同志到北京，是經過毛主席圈閱的。我這樣講，實際上是對待毛主席指示的態度問題。也是反毛主席的。

## （二）揭發「四人幫」反對、仇視周總理的嚴重罪行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某某某同志打電話給徐景賢同志，說周總理病情惡化。徐景賢同志和我馬上到王洪文那裡，勸他快點回北京。他卻冷酷地惡狠狠地說：「還早呢，你們不知道，這種病有得拖了。」到去年十一月月中，他才回北京。到北京後，他竟遲遲不去看周總理。後來，去看周總理時，他沒有說兩句話，周總理就示意讓他出去了。可見周總理當時已經看透了這個人，不願意同他多講話了。更令人氣憤的是，聽說，在周總理追悼大會剛剛結束，一走出人民大會堂，王洪文就要去打獵。汽車司機一聽氣壞了，耐不住說：今天是什麼日子？因為司機不肯開車，才沒有去成。但是過了兩天，又去打獵了。這幾件事情充分說明了王洪文對周總理是多麼仇視，也暴露了王洪文一夥人迫不及待地要篡黨奪權的野心。

去年三月，我去北京參加人大常委會議，見到張春橋，我向他反映了王洪文秘書廖祖康任意調房子的事情。張春橋當時對王洪文的生活作風表示不滿，但他接著就說：「這都是某某某慫恿王洪文。」「四人

幫」相互包庇，抱成一團，胡作非為，狼狽為奸，張春橋竟然倒打一耙，栽贓誣害，這完全是對周總理的污蔑和攻擊。張春橋這句話，我沒有對別人講過。但是，我沒有向毛主席報告，我有罪。

### （三）揭發「四人幫」攻擊、誣衊中央領導同志，分裂黨中央的嚴重罪行

這方面，我的罪行也是嚴重的。

早在一九六九年，參加九大時，張春橋授意王洪文，對我們上海代表說：對幾位老帥，不能給滿票，要殺殺他們的威風。這完全是踐踏黨內民主，打擊中央領導同志的陰謀活動。當時，我照著做了。那次，幾位老帥的票數是比較少。在會議過程中，在張春橋授意下，用上海代表的名義請陳毅同志參加我們的會議，實際上是批陳毅同志。我當時也是最起勁的一個。九大後，我也散布過指責、貶低、攻擊陳毅同志的話。

一九七四年初，姚文元離開上海時，在我們面前有意貶低、攻擊一位老帥。說毛主席批這位老帥了。還說下半年要出事。還講了蘇聯現在是修正主義，今後怎樣變回來？

去年三月，我在北京，張春橋當著我的面攻擊某副總理。今年二月，張春橋又在我們面前說，這位副總理的「基本思想是蘇聯的一套搬過來的」。這些話，我在市委常委中傳過，在有的同志面前也傳過。

去年十一月，王洪文從上海臨回北京時，對我和金祖敏、黃金海、葉昌明、陳阿大等說：你們不知道，中央鬥爭多麼複雜，政治局就分好幾派呀，從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了。這完全是分裂黨中央的反黨言論。這些話我都聽進去了，中了毒。

今年二月，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等都給我和馬天水、徐景賢同志講，國務院的一些部門，除了文化、衛生、公安等幾個部外，都怎麼怎麼不行，批鄧沒有批起來。謝靜宜有一次同我們交談中，講到政治局批鄧時說：最有水準的是張、江、姚、王四人，還有另外兩位還比較好，其他同志都怎麼怎麼不行。謝靜宜大肆吹捧「四人幫」，醜化、攻擊中央領導同志，這是十



分反動的。特別是毛遠新以毛主席聯絡員身分，攻擊了好幾位副總理。如說某副總理到東北後，不去瞭解大寨情況，而對挖金子倒很感興趣等等。

「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這些反動言論，對自己影響很大，中毒很深。我在市委常委會上、黨員幹部會議以及工會的部分同志中，都散布過這些言論，我做了「四人幫」反黨集團分裂和反對黨中央陰謀活動的幫兇，參與了「四人幫」分裂和反對黨中央的陰謀活動。我恨自己成為「四人幫」的幫兇。

#### **（四）揭發「四人幫」攻擊一些地方的領導同志，妄圖打倒一大批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破壞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破壞大好形勢**

這方面，我緊跟四人幫，做了他們的傳聲筒，做了他們手中的棍子，幹了不少壞事，造成嚴重後果，犯了很大的罪。

今年二月，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時，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及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還有金祖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人都到我們的住宿處來過，王、張、姚等都來過幾次。一時間，我們住宿處，簡直成了串連站，一些人川流不息地來到我們那裡，激昂慷慨、聲色俱厲地大肆散布攻擊、污蔑一些地方負責同志的言論，充分暴露了「四人幫」妄圖利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打倒一大批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罪惡用心。

在這次打招呼會議上，經過毛主席批示「同意」的華國鋒同志的講話中指出：「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方，應轉好彎子。」「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很明確，就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轉好彎子。但是，「四人幫」卻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大唱對臺戲，進行破壞。張春橋對我們說：問題多點的五個省，看來問題是難辦的，有的恐怕不行了，彎子不容易轉好。王江文、張春橋等還指名道姓地說，這個人是「還鄉

團」的分團長，那個人是「復辟派」的頭子。他們又說：福建的某某，有「創造」，辦了三萬人的封閉式學習班，有人還被關在籠裡，完全是法西斯專政；江西的某某，是「還鄉團」分團長；雲南，把一些英雄、模範人物都整下去，整得很厲害；某某是江蘇省領導的老上級，那個省的班子，是按某某的意圖安排的；等等。散布這些言論，就是不讓人家轉彎，破壞中央的部署。

我對這些言論，都很聽得進去。回到上海後，在市委常委會上，接著在黨員幹部會議上，我都原原本本地傳了這些言論，有的話，我在黨員幹部會議的幾個小組裡都講過。我賣力地加以擴散。市委在四月二、三日召開全市批鄧經驗交流大會，我原來準備了篇發言稿，把「四人幫」攻擊一些地方領導同志的主要內容都寫進去了，後來這篇發言稿送給張春橋去看時，他連忙告訴我們：有關外地的事情不要講了。張春橋怕在大會上講了，就會露餡。可見，「四人幫」搞的都是陰謀詭計，耍的是兩面派手法。這些話，在大會上我雖然沒有全部講。但是，後來去市五七幹校時，下廠時，還有參加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的一些會議時，我都帶有煽動性地散布過攻擊外地負責同志的言論。有一次，我去照相機三廠，我講了攻擊江蘇、浙江、江西、福建等兄弟省領導同志的一些言論，講了南京等地有人不給上海去的人住旅館等，挑撥了上海同兄弟省的關係。我還傳了張春橋在一份關於蔬菜問題材料上的批的話：「靠外地是靠不住的，這是大勢所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後來有人把這次講話內容傳到外地去了，我就著急起來，還要化工局有關同志進行檢查，想抵賴不認帳，這是錯上加錯。有關攻兄弟地區的言論，我擴散得最多，有的部傳到了外地，有的地方油印出來、張貼出來，起了很壞的作用，干擾了外地運動，破壞了那裡的大好形勢。

我不僅散布過這些言論，還把江蘇一位同志的所謂「告狀材料」，送給王洪文。還有河南一位同志來上海時，黃金海幫她寫了「告狀材料」，這份材料我也看過。批鄧初期，我還收集過外省的材料，還要團市委將有關這方面的材料送給我。罪責在我。遲群向我要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寄給了他。還有當兄弟省有的同志來上海時，我

們把清華、北大編印的材料，送給他們，請他們到大學裡參觀大字報。我還把有關材料寄給兩個省的同志，同遼寧交換過上海和他們的大字報彙編。這樣，「四人幫」通過我們的手，實際上把上海變成了一個最大的串連站，一個公開的聯絡點。完全違背了中央五號文件精神，破壞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部署，破壞了外地的大好形勢，破壞了上海同兄弟省市的關係。這方面，我犯的錯誤和罪行是很多、很嚴重的，根子是「四人幫」，罪責在我身上，我做了「四人幫」搞分裂主義，打擊一大批，搞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幫兇和工具。「四人幫」是個大騙子，我也是騙子，下面傳了我散布的分裂主義的言論，罪責在我，下面是沒有責任的。

其實，不僅在批鄧鬥爭中，在這之前，「四人幫」就利用上海，干擾和插手外地的運動，破壞外地的大好形勢。比如在批林批孔時，王洪文曾對我講：批林批孔一定要聯繫實際。批林批孔要清查林彪的死黨餘孽。按照王洪文的意見，市總工會打頭陣，召開萬人大會，發動揭蓋子，一把火燒了起來。各級工會層層開會，把黨委撇在一邊。請黨委負責人到會，實際上是批鬥，還靠邊了一批幹部，有的至今還未解決，整了一些同志。我還到基層去「放火」，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發動工會幹部大揭所謂「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迫害新幹部的問題。把有的基層黨組織搞癱瘓了。上海這樣一搞，對外地有影響，有的地方也這樣搞了起來，破壞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把形勢又搞亂了。

「四人幫」利用、控制上海總工會一些頭頭（實際上就是王洪文的一夥小兄弟），自成體系，搞宗派，搞行幫，自成體系，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誰不聽「四人幫」的話，就整誰，這夥小兄弟就是「四人幫」整人的打手。這方面，我積極執行了「四人幫」的意圖，參與了這些活動，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是有罪行的。王洪文每次回上海，多次召開工會幹部會議，有時還不讓工會幹部給黨委彙報，黨委不知道工會開會幹什麼，完全把工會凌駕於黨委之上。我有時召集工會幹部開會，也是這樣做的，嚴重地破壞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我有罪。

### （五）交代我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罪行

馬天水在十月七日上北京後，我們要馬天水的秘書到北京後，按慣例和上海通一次電話。馬天水的秘書到北京後，找不到「四人幫」中三人的秘書，電話沒來。我打了一天電話找，一直打不通，就心神不定。那天下午到川沙縣去了。晚上六點三十多分回來後，我就打電話給辦公室，問馬老有消息沒有？辦公室的同志告訴我說，沒有消息。九點左右，我打電話找公安部的某某某，問他王、張、姚三人情況，他說：王、張、姚前幾天還看到，可能因為地震搬家了。沒摸到什麼情況。九點三十分，我就把正在上海的金祖敏秘書找來，請他打電話找馬老在哪裡。他就通過北京的熟人，在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我與他通上了電話，在電話中我問他：會議開始了嗎？他答：還沒有消息。又問：來了哪些單位？答：有山東、江蘇、湖北和三個軍區。還問：那三個軍區？答：有武漢、濟南、南京軍區。我還問了馬老好嗎？他說：馬老有點感冒，現在正在洗澡。晚上十二點，徐景賢同志的秘書告訴我，說老徐給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電話，他說華國鋒同志已正式通知他，原來他帶隊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聽到這些情況，我心神更不定。

八日上午，我到張春橋的老婆那裡，她講她的兒子原定當天要到北京去，想同張春橋的秘書通電話，從七日晚上到八日上午，電話一直打不通。我當時就把我們同北京通電話也接不上的情況告訴了她，實際上同她通了「消息」。這也是我的嚴重罪行。

我打了好多電話，一直找不到「四人幫」中三人的下落，又聽張春橋的老婆打電話也找不到張春橋，心裡更著急。因此，在八日上午，我就把徐景賢、馮國柱、張敬標同志找來一起商量，又把張春橋的秘書、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肖木叫來，要廖祖康、肖木、某某某再打電話找。張春橋的秘書給姚文元的老婆和秘書打電話，廖祖康給釣魚臺打電話，肖木給王洪文的秘書某某某打電話，都沒打通。當時，看到了南京軍區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傳達了軍委首長的指示，又說據警備區告總政通知原在上海開的圖書現場會撤銷了；他給遲群掛電話沒打通；給人

民日報某某打電話問宣傳方針，他吞吞吐吐神態反常等情況。這時，我們更產生了疑問。

後來，張敬標同志打電話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他說「生胃病了」。徐景賢同志親自要求馬天水接電話，馬不接，聽徐景賢同志說，馬天水的秘書在電話裡暗示說：我老胃病復發了。電話就掛掉了。聽了這個話後，大家聯繫前面講的情況，進行了議論，引起了很大驚慌。就極端錯誤地認為：中央出修正主義了，已下手抓人了。

八日中午，我認為自己的分析對了。就帶著這種反動的思想情緒，把金祖敏的秘書找來，他原定八日回北京，我對他講，你到北京後，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的秘書那裡去摸摸情況，趕快打電話給我，並且交代了聯絡的暗號：如一般情況就說肚子痛，情況嚴重就說胃痛，最嚴重的情況就說心肌梗塞。下午，我和王少庸同志就分頭找人部署戰備，找了民兵和公安局同志，還有部隊兩位同志。我給民兵和部隊的兩位同志念了軍委首長指示的電話記錄，又給他們講了馬天水到北京後通不上，找到馬天水的秘書後說「老胃病復發了」等情況，說現在情況反常，可能出事了。然後就說：一級戰備撤銷後，發現有些單位戰備鬆懈，我們要提高警惕，要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空飄、海飄，防止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突然襲擊，等。要他們回去抓緊部署戰備。

下午五點，我從反革命的立場出發，同徐景賢一起開了常委會，把列席常委也找來了，但不找空軍和海軍的同志參加會議。會上，又把找不到王、張、姚的情況，以及馬天水秘書在電話中講的「老胃病復發了」，向他們「打招呼」。傍晚，我給遼寧某某某的秘書打電話，請他給毛遠新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毛遠新的情況；不久，某的秘書回電話說：毛遠新那裡情況一切正常。晚飯後，我從反革命立場出發，覺得要作最壞打算，就找了王日初和車隊隊長，還有我愛人，要他們給我整理一下放在家裡的一些材料。後來，他們整理後，把一部分列印的材料燒掉了，當時我未在場。晚上八點半，金祖敏的秘書來電說「我還好，我娘心肌梗死」。公安部的某某某又來電告訴某某某，說剛才金祖敏的秘書某某某的電話是在我處打的，現在人員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

了。這時，我的反革命情緒進一步發展。

當時，廖祖康要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王、張、姚的三個直線電話，張的電話打通了，但接電話的人說打錯了。我還打電話找過八三四一部隊的一位同志，對方說公出了。這時，新華分社告：今晚十二時可能有重要廣播，問電臺說不知道，中央台打不通電話。文化部某某某也來電話給徐景賢，說你要我找馬老，電話打進去有人接了就掛了。還說，我們這裡也都有病情。這時，肖木說：現在已對文化部下手了。當時，在場的幾個人情緒十分緊張、激動，說：接下來要輪到我們了，怎麼辦？這時，朱永嘉也來了，他說：我看這次的事是某某某同某某的結合搞的，其他人是搞不起來的。廖祖康也說：八三四一部隊是很厲害的，沒有某主任的指揮，一下子搞掉四個人不容易。接著朱永嘉就提出：我們用民兵打它一個禮拜，不行的話五天、三天，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像巴黎公社那樣。

於是，徐景賢和我等人決定陰謀策劃、緊急部署了反革命武裝暴亂。徐景賢同我及其他人研究了分工。廖祖康提出，要警備區的四位同志參加，緊急時，可要他們調動部隊。廖祖康、朱永嘉還提出，這次還要工會的同志參加，可以發動群眾，號召工人起來。於是，徐景賢就擬定一個分工名單，由他帶王少庸和警備區一個副司令、一個師長等人到一個祕密聯絡點，抓電臺、報社等輿論工具；由我同馮國柱、廖祖康、警備區一個副政委、一個副司令和工會的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某某某、某某等人到市民兵指揮部，組織反革命武裝力量。到指揮部後，我還把汪湘君找來。張敬標留守康平路，朱永嘉到陝西北路準備輿論工具。徐景賢當場寫給我一張我帶的人的名單，還寫給我一張條子：「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二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臺、報社的保衛。」我到了民兵指揮部後，先給民兵指揮部和部隊的兩個同志，講了馬天水同志到北京開會去了，沒有找到王、張、姚，肯定人家已動手了等情況，並大肆放毒，進行反革命鼓動。我煽動說：「馬天水去了沒有回來，肯定出問題了，把文化大革命出來的『中央領導』都抓起來了，

我們要同他們幹。這幾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則一網打盡了。」這以後，由馮國柱、廖祖康同部隊兩位同志和民兵指揮部的部隊同志，研究部隊的問題。我同總工會和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在另一個房間，詳細地介紹了七、八兩天所發生的全部「情況」，以及我們幾個人的分析。接著我對大家說什麼：「上海是一月風暴的發源地，我們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對著幹，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後代，讓全國知道。」當時，廖祖康也進來煽動說：周司令到上海，可能就到某地指揮抓我們，他們把馬天水關在北京。也可能他們到松江某師，叫我們去開會，然後把我們全部抓起來。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圖，他邊看邊罵：「上次就告訴你們了，一張像樣的地圖也沒有，這種地圖怎麼好打仗？」並要施尚英他們馬上研究提出具體作戰方案（作戰方案由施尚英他們具體去搞的，我未看到，只聽施尚英講，是按國慶保衛工作具體方案準備的）。他提出，如果外地軍隊來怎麼辦，外地部隊可能以加強戰備名義來怎麼對付，我們要隨時掌握動向，採取對付措施。還說，鐵路、碼頭、機場都要控制起來，要保證電訊的暢通，我也同意。後來，就由廖祖康和馮國柱分頭去部署落實。然後，我們就密謀策劃了如何組織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力量，決定由原來民兵值班二、三千人，準倍增到一萬多人，並根據打聯司的經驗，設立一線、二線（祕密指揮點），在指揮點設置電臺。當時，我對陳阿大、黃金海、葉昌明、馬振龍等人說，你們打過聯司，有經驗，那時也分一線、二線的。如打起來，你們都分到各指揮點去一起抓。還對某某某說，打聯司時，你指揮調度交通有辦法等，給他們打氣。當時，有的提出把祕密指揮點設在閔行、吳松，或者十七棉、三十一棉，大家感到這些地方太遠、太暴露，後來決定設在江南造船廠，並設置了電臺。施尚英還提出要在楊浦區也設一個祕密指揮點，我同意（後來我得知設在中紡機廠）。這時，黃金海還提出，東海漁業指揮部有電臺，也好用。施尚英說民兵自己有電臺，夠了。馬振龍還講，輕工系統下屬工廠倉庫裡有子彈，打起來可以用等。

半夜，我聽到中央兩個決定的廣播後，我仍堅持反革命立場，還說

了很反動的話。我胡說什麼：「這兩個決定是得人心的，他們抓了旗幟，安定了人心的。」把自己完全放到了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敵對的地位，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遠。

九日凌晨，我和廖祖康、馮國柱等人商量，怕老蹲在民兵指揮部遇到情況沒有退路，天亮了容易暴露自己，建議撤出民兵指揮部，當時廖祖康就提出撤到某招待所去，我就同意了。早上，我問了徐景賢同志的點和辦公室值班室有什麼情況，都說沒有什麼突出情況。於是，我就回到康平路，想把王洪文、張春橋的家屬和我們的家屬安排轉移。我提出，要把小孩子安排到工廠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裡去。還說要把革命後代，好好保存好，等等。後來，徐景賢說，兩個決議已經公布，家屬現在不要轉移。我又去通知王、張兩家暫時不動。這天上午，我總算同在北京的馬天水同志通上了電話，問他兩個決議怎麼表態，他說：要熱烈表態，堅決擁護。問他張、姚、王三人情況，他說：見到了，身體還好，他們很忙。我們一聽到三人情況正常，就鬆了一口氣，心裡定了。這說明我們完全站在「四人幫」立場上，把自己命運同他們綁在一起。下午，召開市委常委會，討論、修改了給中央的電報。下午七時，徐景賢要我給施尚英打電話說：戰備恢復正常，撤銷民兵值班的萬位數，保留千位數。我還問他「懂了沒有」，他說「懂了」。之後，徐景賢和我當面告訴廖祖康，要他把他那裡集中的一些人（工會的一些頭頭）分散，不要再聚在一起了。晚上，接到馬天水來電話，通知我和徐二人第二天去北京開會，這又引起我們懷疑。後來又打電話去問馬。馮國柱、廖祖康、肖木主張我們不要去，去一個抓一個。後來商量還是去。這時，我給葉昌明打了電話：你那裡不要動，有事要請示少庸、國柱、敬標同志，我們去開會二三天回來。廖祖康提出，只讓馮國柱、張敬標送我們上飛機，黃濤不去送。（據回來知道，第二號點根本沒有撤銷，由黃濤、廖祖康直接操縱，把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戴立清、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繼續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

十月十日，我到北京參加中央打招呼會議。但策劃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的罪魁禍首是我。十日以後，反革命武裝暴亂的組織活動的繼續發



展，十月十三日的反革命「吹風」，都是我在家時煽動、策劃的必然結果，罪責完全在我。我對黨、對人民犯了大罪，廣大民兵和民兵指揮部的同志，還有很多工會和婦聯的同志，是沒有責任的。我對他們也犯了大罪，我歡迎同志們對我的罪行進行深入揭發、批判。

這次我策劃武裝暴亂這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絕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根源的。長期以來，我對「四人幫」跟得很緊，中毒很深。我頭腦中只有「四人幫」，沒有黨中央，把這幾個人看作就是黨中央，被「四人幫」的鬼迷住了心竅，以為自己當中央委員、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都是他們的「栽培」，因此把自己的命運、前途緊緊連在他們身上。我一直極端錯誤地認為，他們是什麼「左派」、「正確路線的代表」，認為「跟著他們，就是幹革命」。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後，在電視中看到「四人幫」中有的「面容消瘦」，我還專門打電話給廖祖康、某某，要他轉告「四人幫」保重身體。可見，我對「四人幫」迷信、忠心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正因為這樣，所以把「四人幫」的垮臺，就看作是「右派政變」，就要死保，就去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以武力對抗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說明，路線錯了，立場錯了，就會把事情全部顛倒過來了。這次反革命事件的發生，是我緊跟「四人幫」，積極參與他們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罪惡活動的一個大惡果，一次總暴露。早在今年初，中央一號文件下來的時候，馬天水、徐景賢和我三個人曾經有過議論，講了「張春橋當代總理，外地通不過，華國鋒同志當代總理，各方面通得過，擺得平」等誣蔑和攻擊華國鋒同志的話，我還在總工會幾位同志和上棉三十廠黨委中擴散過。市委辦公室有一份簡報，其中有幾句讚揚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的話，我叫他們刪掉，這是對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的攻擊，矛頭是對著毛主席的，反主席的，我有罪，罪該萬死！在毛主席逝世不久，肖木在九月下旬帶來張春橋的口信，說什麼「上海還沒有真正經過嚴重考驗」，「要看到曲折，要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等等，與自己頭腦中的反動思想一拍即合。正因為我有這種反動的思想，因此，聽到「四人幫」垮臺的消息，就站到了與全黨、全國人民為敵的一邊。這次到北京參加了打招呼會議，受到

華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耐心教育和挽救，立場、觀點才開始轉變，看到了自己策劃這場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性。我決心澈底交代，澈底認罪。

### （六）揭發「四人幫」反黨亂軍，分裂軍隊的罪行。我也執行了「四人幫」的黑旨意，這方面犯有嚴重錯誤和罪行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們在北京開會時，上海和遼寧、瀋陽軍區的同志去看江青。江青對我們說：「部隊搞成這個樣子，怎麼行啊」不注意老中青三結合，老的那麼老了，怎麼打仗？等到部隊搞好了，問題解決了，我再穿上軍裝，再戴上紅星。在那次開會時，有一次王洪文也說過：現在軍隊新幹部都被排擠了，只剩下某某一個人了。「四人幫」篡軍的野心，早有流露。去年，我去北京參加十屆二中全會時，王洪文向我們說過：現在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軍隊裡沒有我們的人。「四人幫」還對我散布過攻擊一些軍隊領導同志的言論。

批林批孔時，我去北京，是在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對我說：批林批孔軍隊也開展起來了，是我批了鐵道兵的一封信，群眾就發動起來了，總政也在動了。我現在到處放火，把軍隊批林批孔搞起來。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張春橋、王洪文要我們去發動上海警備區的批林批孔運動，進行煽風點火。他們不僅要搞亂警備區，而且要我們發動一些人到南京軍區去送大字報，矛頭是對著某某領導同志和南京軍區的。「四人幫」總認為部隊亂得不夠，蓋子沒有揭開，所以到處點火亂軍。我也跟著去做了，干擾了部隊的工作，破壞了部隊和地方的團結，造成了很壞的後果。我也散布過「四人幫」攻擊部隊首長的話。

「四人幫」一面反軍亂軍，另一面就拚命抓民兵。王洪文、張春橋貪天之功，把毛主席關心和支持的上海民兵的成績，歸功於他們自己。他們竭力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破壞民兵建設，妄圖使民兵成為他們搞篡黨奪權的陰謀的工具。今年二月，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時，王洪文對我們說過：上海民兵，是春橋和我兩人搞起來的。去年，王洪文在上海三個半月，對民兵工作抓得很緊。特別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在錦江小

禮堂，同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開了一次會，我也參加了。他在會上提出了人武部和民兵指揮部合併問題，實際上是要吃掉人武部，篡奪兵權，還講了武器裝備要多要好，一旦有事就好使用。暴露了他抓民兵，是為了陰謀篡黨奪權。這次會議後，我們在兩個區、一個縣試行「兩部合併」，賣力地推行他的黑主意，破壞了民兵建設，實際上也為這次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埋下了禍根。我積極推行王、張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是很賣力的，對民兵指揮部同志也放了很多毒，破壞了軍民關係。我要澈底清算自己的罪行。

### （七）在推行「四人幫」的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搞宗派活動方面，我也有嚴重罪行

「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陰謀詭計，就要在組織上結黨營私，任人唯親，以我劃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不講毛主席提出的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卻提出了什麼「領導熟悉，群眾擁護」等選拔幹部的標準，提出了不依靠黨組織，不依靠群眾，而是通過座談、談話方式，當場「相面」，聽發言、看外表的選拔幹部的辦法。這完全背離了培養接班人的五項條件，背離了群眾路線。根據王洪文的黑指示，要辦工農兵讀書班，在讀書班裡，要有右的代表，結果在學習班裡整人。我們辦了幾期工農兵讀書班，也就是所謂選拔幹部的「苗子班」，這種讀書班辦在高樓大院裡，吃的特別伙食，享受特殊待遇，實際上是在培養養尊處優，高人一等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在培養修正主義。這項工作是我負責的，是我的一條罪狀。參加讀書班的同志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主要是路線錯了，這些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我推行「四人幫」修正主義的組織路線，分裂路線是很賣力的。召開十大時，王洪文對上海代表名單大為不滿，說我們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等。他說：這次上海中委的名額多，看來不能從代表中挑選，代表中只能選出中間人物當中委。後來他要黃濤和金祖敏兩人，急急忙忙到代表以外的對象中去挑選。「四人幫」為了挑選他們中意的人，就反復復地選，今天提這個名，明天又改提那個名，因此中委候選人名單

遲遲定不下來，是各地名單中最後提出來的一個，拖了大會的時間。這也是「四人幫」搞陰謀詭計的一個惡果。像這樣選中委、候補中委的做法，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是從來沒有的。王洪文還說，有的人歷史複雜有什麼關係，去毛主席身邊的人，有的歷史也很複雜。王洪文一方面攻擊毛主席，同時攻擊了一批同志，罪該萬死。王洪文還說：什麼階級分析，只要表現好就行了。王洪文的所謂表現好，就是對「四人幫」好，我們就是按王洪文的黑指示辦的。王洪文對有問題的造反派老頭頭，無微不至的關懷，他說：這些老頭頭不會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到時候是有用的。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中，這幾個人是起了「大」作用了。王洪文所以要這樣做，是有他的陰謀的，是懷著篡黨奪權的野心的。

在召開四屆人大時，王洪文還要金祖敏準備一大批名單，說是國務院各部都要摻沙子，都需要人。一九七四年我去北京，王洪文就要我選一點，抽上來考察，到各組辦工作。我們提出過一批名單。這樣搞，「四人幫」就是妄圖組織他們的「內閣」。四屆人大前（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搞過一批三十個人的名單（部級十八人，司局級十二人），以後（一九七五年一月）又搞了個十六個人的名單（都是部級）。我也積極幹了。罪行在我，組織部門是沒有責任的。今年二月份，張春橋對我們說，不要對各部送人了，如某某到了北京，也不起作用。按這個黑指示，中組部來要兩位副部長，我們不給，要一位計委副主任，黃濤認為去一個人也不起作用，要被人家吃掉的，也不給。

「四人幫」為了實現他們的野心，大搞宗派活動，拉了一夥小兄弟，結成一個小集團，大搞招降納叛。張春橋在一九六八年就講過，工總司的老頭頭入黨，要報市革委會（後是市委）審批。實際上為這些人的入黨大開方便之門。在王洪文的指使和支持下，有的人不符合入黨條件，如戴立清、黃金海、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等，用各種辦法把他們拉入黨內，陳阿大是先內定當九大代表，再突擊發展入黨的；有的明明有嚴重問題，也照樣提拔重用；有的違法犯罪，就加以包庇，讓他們逍遙法外；有的已被判了刑的，還給他平反。這些事，我都參與了，這完全是結黨營私，招降納叛，包庇壞人。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時，曾告

訴我：有事情要多找總工會一些老頭頭商量。因此，遇到什麼事情，或者開什麼會議，我總要在會前或會後，把幾個小兄弟找來談談，議論議論。特別是在批林批孔時，我常和這幾個人研究分析運動形勢，研究黨委班子人員，讓工會直接發號施令，不聽黨委的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就是在搞宗派，搞分裂，破壞了黨的組織原則。根子在「四人幫」，有好多壞事是我幹的，下面工會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這裡，我還要交代同張春橋的老婆的往來，這方面我也有嚴重錯誤。從一九六九年三月開始，我同她有些往來，串串門子，當時並不清楚她的問題。一九七四年，王洪文回上海，對我們說：張春橋要與她離婚，否則不好辦。這時才知道她有重大政曆問題。但是，我仍舊保持了同她的密切往來，有時也同她談些工作情況等。這說明自己沒有同她劃清界限，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所以要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討好張春橋，有時也想通過她向張春橋反映反映自己的意見。這是自己緊跟猛靠「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又一罪證。

長期來，在「四人幫」的控制、毒害和影響下，我幹了不少壞事，犯了嚴重罪行。今天揭發和交代，只是初步的。我要繼續回憶和檢查，澈底揭發「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同時澈底清算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特別是關於搞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搞宗派集團等方面的罪行，我要詳細地一件件作澈底揭發和交代。我衷心地、誠懇地歡迎同志們繼續對我的錯誤和罪行進行揭發和批判。自己決心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脫胎換骨，與「四人幫」決裂，澈底揭發「四人幫」的滔天罪行，澈底交代自己的問題，清算自己的罪行，立功贖罪，將功補過，真正轉變立場，站到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邊，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跟廣大幹部和群眾在一起，把「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義路線揭深揭透、批深批透，把這場偉大的鬥爭進行到底。<sup>28</sup>

<sup>28</sup> 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印發。

## 馬天水的補充揭發交待（1976.11.21.）

### 【我的補充揭發交待】

經過市委領導同志和同志們的揭發批判和說明，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澈底粉碎「四人幫」這個反黨陰謀集團，挽救了革命，挽救了我們的黨。和「四人幫」的鬥爭是無產階級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兩個階級的生死大搏鬥，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大事。我一定和「四人幫」劃清界限，和「四人幫」這些壞蛋鬥爭到底，並清算自己的錯誤和罪行。這些天來，聽了同志們的揭發批判，越想越感到「四人幫」這批反革命真是罪惡滔天，越想越感自己的罪行越大。我進一步回憶、補充揭發交待如下：

（一）我怎麼陷入「四人幫」而不能自拔的？「四人幫」為什麼看中我，要我主持上海工作？根據我的回想和分析，有如下原因：一是，我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比較早地得到解放，當時不是感謝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挽救，而是對張春橋感恩戴德；二是，一九六八年「四·一二」事件中，我保了張春橋，胡說張春橋沒有坐過牢。我保張春橋的根據，一是聽說江青要保張春橋，二是聽張春橋自己說我沒有坐過一天牢。我聽信張春橋自己為自己辯護的一派胡言，這是失去黨的原則的；三是，我對有極少數所謂的新幹部，實際上是王洪文的小幫派，其中有的是流氓，有的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支持他們，縱容他們，後來發展成為包庇他們；四是，「四人幫」內部常有矛盾，狗咬狗，往往在上海不同的戰線上表現出來，我根據張王的意圖，搞調和，搞折中。不使「四人幫」狗咬狗臭事暴露在黨中央和全市人民面前。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我投靠「四人幫」，我不是九大的代表，把我安排了九大的候補中委。我張給春橋寫了信，在這封信中，我向他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我說，少庸同志更為適合（當時少庸同志主持工作），最後表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作好工作。我不是寫信給毛主席，而向張

春橋表決心，這就是投靠張春橋。從此以後，我跟他們越陷越深，把「四人幫」當作中央，「四人幫」對我也越來越信任。

一九七二年的九月份，周總理在上海，找我談話，說王洪文要調中央工作，要我主持上海工作中央已定了。在這以前不久，我到北京去，張春橋也曾找我談話說，王洪文可能調中央，可能要你主持工作。我再三說我主持工作有困難。張春橋問有什麼困難？我說，我對有些小兄弟頭頭統不起來，領導不了，他們不聽我的話。張春橋一再說，你要注意作他們的工作，這個問題我可以幫助你作工作。張春橋又強調指出：你抓日常工作還可以，但要注意抓大的路線鬥爭。張春橋講的大的路線鬥爭，實際上是以「四人幫」劃線，我是心神領會的。就是要向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領導同志鬥爭，要我和「四人幫」站在一起。就是向我路線交底。

我主持工作以後，接著就準備十大，我根據「四人幫」那一套辦法，選舉了代表，突擊提名中委、候補中委的名單，這些陰謀活動，我都參加了，上次已經交代。我這裡補充一點，總理召集政治局包括各省市第一書記會議，我也參加了，周總理傳達主席提議，醞釀王洪文當黨中央副主席候選人的事。當時有的同志不大贊成。那時，我打頭陣表了態，表示支持和擁護王洪文為黨中央副主席候選人。我當時說：我同王洪文相處一段時間，覺得王洪文看問題還比較全面，不是一個衝衝殺殺的人，他在上海主持過一段時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強。總之，我吹捧了王洪文，為他講了好話。「四人幫」裡有人叫王洪文不要推辭。接著，還有其他幾位同志也表了態。我這次發了言，等到十大散會後，江青見了我，把我的手握得很緊，很親熱，和以前態度大不一樣。後來，開會時經常到上海組看我們，又送書，（去年和今年給我們三人送過《詞綜》，送過地圖，送過油莎豆，送過文冠果。）又問好。當時，王洪文作為黨中央副主席候選人是合法的。但合法的背後，可以看出「四人幫」已經勾結起來了。已在搞陰謀活動了。我表面上擁護毛主席的提議，但思想深處是擁護「四人幫」的。王洪文正式當選黨中央副主席後，我在京西賓館招待祝賀，參加的有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黃

濤。一面吃，一面談，談選舉中的鬥爭，也談今後還會有鬥爭，我們一定要鬥到底。向誰鬥呢？為什麼要鬥呢？目的是為了鞏固「四人幫」的地位而鬥爭，為「四人幫」篡權而鬥爭。我當時的反動思想是，認為在黨中央有幾個靠山了，我的後臺更硬了，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更好作了，對我的工作也更有利了，我講話的聲音也粗了。

（二）破壞批林批孔偉大戰略部署，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周總理。廣大群眾和幹部在批林批孔當中是有成績的。但「四人幫」是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反對周總理的，我也是跟著幹了，當了他們的破壞毛主席戰略部署和反對周總理的幫兇。批林批孔開始時，北京的「一·二五」會議，三箭齊發。張春橋惡毒攻擊敬愛的周總理。江青一方面攻擊一位老師，又講過是十一次路線鬥爭開始了。他們的反革命罪惡目的是，想製造混亂，想打倒一大批反對他們的革命幹部。後來毛主席批判了三箭齊發，撥正了批林批孔的航向。但「四人幫」並未死心，還要在上海製造混亂。我在組辦會上，傳達了張春橋要批判走後門的黑指示，後來市委準備開大會放錄音，因為毛主席批判了三箭齊發，所以錄音不放了，市委大會一時開不成。但是「四人幫」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反對毛主席，拒絕毛主席的批評。王洪文先要上海市總工會二月二日，在文化廣場開大會。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張春橋於二月二十七日借題給上海來信，信中說：「老實說，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一些方面，一些單位的權並沒有奪過來，在一月風暴中，有的奪過來的權又失掉了。」張春橋這封反動信的內容，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直接對抗毛主席對「四人幫」的批評。而且反革命的煽動性很大。這封信，市委常委討論過了，沒原文向下傳，但總工會的有些人向下傳達了。再加上「四人幫」掌握的輿論工具，《人民日報》發表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的文章，我在三月八日的大會上也講了張春橋一封信的精神和報紙文章精神。而且，我們還到某某廠、某某廠等等基層去煽風點火，影響很壞。這樣，一批基層單位的領導，受到了衝擊，擴大了打擊面。借要解決三個正確對待為名，批判打擊了一大批幹部。上海有不少單位搞亂了，造成了一些單位的不團結。後來中央發了十二號和十七號文件，順勢扭轉了當時亂批



亂鬥的情況，但已經造成了嚴重後遺症。

王洪文、張春橋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上海一批對「四人幫」不滿的或有抵制的幹部，把上海的運動搞亂，這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上海打頭陣，搞亂一些地方，搞亂軍隊，整一批反對他們的幹部，妄圖篡奪軍權。王洪文當時抽上海的人和工農兵學習班的人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個總部，目的就是搞軍隊的材料，揪軍隊的領導，特別是揪所謂軍隊的舊勢力，要挖所謂林彪的死黨，殘渣餘孽。當時有一個省在他們的影響下，也亂了起來，上海在這個省的一個基地來問，對當地的大字報怎麼辦，王洪文黑指示三條：一不加入，二不支持，三我們不貼。這玩的花招，完全是兩面派。

「四人幫」借批林批孔整軍隊，反軍亂軍、妄圖篡奪軍權，不僅在中央已這樣搞了，在地方也這樣搞了。拉一些人，整一些人，分裂軍隊，借機整警備區，整周司令和其他同志。就是批林批孔以後，還不放過，仍然搞分裂活動，比如，有一次，張春橋問我，李寶奇怎麼樣？我說，不怎麼樣，張接著說，我早說過，不要換人，越換越不好。張又問南京軍區新來的同志。我說，我看了他的講話，也不怎麼樣。這次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賢到北京去時，張春橋對徐說，這位政委是二方面軍的人，這樣的人不多了，不好動。我們找李寶奇同志談話，先從張宜愛、李彬山那裡瞭解一下情況，先作些研究然後再談。我們還根據「四人幫」的黑旨意，插手警備區的分工，煽動張宜愛、李彬山寫黑信，靠惡狀。用很多陰謀手段，收集警備區以及南京軍區的材料。這就是搞陰謀、分裂軍隊。這在方面，連周司令的前任秘書也不放過，拉攏他，為我們收集一些情況，這是用的「四人幫」的一套手法，他們經常用這種辦法。不是正大光明，搞陰謀詭計。想起來非常痛恨「四人幫」，痛恨自己。警備區有一位同志在報紙上寫了一句赫魯曉夫式人物就在上海。為這個問題，我們批了幾次，一方面要批這個人，更重要的要看警備區某些領導同志對「四人幫」的態度。我們不僅插手警備區，還插手上海的空軍和海軍。

緊跟「四人幫」，站在反動立場上追查《萬山紅遍》一幅年畫。這

幅畫作者因為把張春橋的一篇文章和馬列著作並列，七五年七、八月份，經南京軍區宣傳部指示，作者收回了，本來是很對的。在收回時，警備區的有一位同志對出版社的人講了張春橋的文章，某些觀點毛主席不同意。當時我們反動地認為是謠言，要追查。王洪文這時在上海，說不要追。後來留下對我和徐、王說，毛主席批評過張春橋這篇文章，王洪文還說，毛主席對政治局極少數幾個人說，張春橋文章裡批經驗主義，是錯誤的。毛主席還說只講到這裡為止，不要再往下講了。王洪文接著又說，實際上這篇文章是姚文元的，不是張春橋的。這是「四人幫」王洪文在為張春橋塗脂抹粉，張春橋的文章裡雖然沒有批經驗主義，但他在總政政工會上也大談批經驗主義，我們還把張春橋的話向下傳達了的。張、姚觀點是一致的。

今年批鄧開始後，王洪文又打電話來一定要我和周司令談一下，共同追查一下，說主要查清這話是從誰的口裡傳出來的？他還說，叫南京軍區也在查。這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文章不是張春橋寫的，但張春橋在總政政工會上也大談了一通什麼要批經驗主義為綱等反毛主席的黑話。不應再聽他的話去追查了，但是我還根據王洪文的黑旨意去追查。「四人幫」是借追查誰傳出來的為名，矛頭指向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我跟著幹。不僅查了，還根據王的意圖，把去年警備區政治部為這件事向黨委常委的彙報，複印一份，還把送去的材料複印了一份，這實際上是特務手段，其罪惡目的為了搞分裂、篡黨奪權。還有，有人送來南京軍區會議上一本鄧、葉的戰略戰術指示摘錄，我們當時看了，為什麼他們單獨印鄧、葉的指示摘錄，也複印了一份，準備上送，後來我向周司令要了一套整個會議文件，發現他們首先印的是毛主席戰略戰術語錄，感到這是正常的，才沒送。我們上報的白頭黑材料都沒給周司令發，話是我講的，意圖是王洪文的，不僅白頭黑材料，我們三人議論中央和國務院各部以及各省的情況都沒和周司令一起談過。主要是以「四人幫」劃線，搞陰謀活動。罪該萬死。

（三）在學理論時大批經驗主義，破壞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四屆人大和十屆二中全會前後，毛主席已對「四人

幫」作了很多批評。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四人幫」對毛主席的批評和新的戰略部署，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於是「四人幫」又加緊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瘋狂反對毛主席。主要表現：（1）「四人幫」妄圖改組國務院的很多部，陰謀組織「四人幫」內閣，架空周總理。上海準備三十名部長、副部長的事，上次已交代。（2）張春橋大講黑話，攻擊總理。張春橋說，我關心的是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革命。這個話的真正含意，就是要篡黨奪權。張還說鄧小平一夥人，是物質迷，人大報告一定要寫進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五年鋼、糧的主要指標。他說，經他反對，沒有寫上。人大報告是周總理做的。從這裡也可看出張春橋是反對周總理的，因為周總理在「人大」作報告不是第一次，過去多次作報告，都有生產指標的。他反對寫上，就是反對敬愛的周總理。他還說，要寫進毛主席關於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列主義和工人群眾手裡這一條，是經過鬥爭爭來的。這一條是毛主席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的指示。張春橋不僅寫進了憲法草案修改報告。還寫進了他的一株大毒草的文章。張春橋堅持要抓上層建築、抓生產關係，並堅持寫這一段，他的罪惡目的是想利用毛主席的指示，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打倒一批反對「四人幫」的領導同志，為篡黨奪權造輿論。（3）他們違背毛主席關於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的教導，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經驗主義作為當前的主要危險，大做文章。就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基本路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是「四人幫」搞的大陰謀。他們開動了他們掌握的一切宣傳機器，大批經驗主義，矛頭指向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四人幫」搞一個陰謀，我們上海市委的少數人也就配合「四人幫」搞陰謀，也配合大批經驗主義。在全市大會上介紹批經驗主義的經驗，我在講話中也講了談了經驗主義對自己危害，某局的一位負責同志在大會上發言批經驗主義是我們要他講的，他沒責任。這次大會的開法、介紹什麼經驗，會前都向張春橋報告過，他表示同意的。是「四人幫」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反對周總理的陰謀，我們也作了他們的幫兇，我們有很大罪責。某廠的十條，是因為我平時批評過某某某同志狹隘，有經驗主義，再加上大會一開，我又同意他們辦學習

班，他們才寫出來的，這個罪責在我，不在某某某同志，不在這個廠。

鄧小平去年六月十二日來上海，王洪文就在前一天打電話告訴我：鄧小平來上海後，可能要找你談話，請你注意。我就提起警惕，當他談到老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呀，某某廠生產搞得還好嘛。我就說某某廠就因為批唯生產力論，生產才上去的，其實某某廠抓黨的基本路線，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改善生產關係，當然也抓過批唯生產力論，但不只是抓批唯生產力論。我只講批唯生產力論，是不符事實的，是錯誤的。

徐景賢、王秀珍同志從新華總社那裡瞭解到毛主席對批經驗主義有批評。我們只通知下面以《紅旗》第六期李鈞的文章為準，沒作任何批評，我們如果瞭解到毛主席批評中央別的領導同志，我們就會很快傳播下去，就會大做文章。毛主席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我們限制傳達範圍，目的也是死保「四人幫」。但是，張春橋對外賓談話，發了一個文件，發到省軍級，我們看了，借批鄧搞陰謀，傳達到群眾。這就說明，我們保「四人幫」，捧「四人幫」，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和中央文件精神有很多地方不一樣，但我們把「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特別是把清華和梁效的文章等等，都看作聖經一樣，組織動員學習。有很多地方和中央文件唱對臺戲。八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發表了一篇《從思想政治路線上批判鄧小平》的消息，其中提到把《論總綱》和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對照批的問題，我要秘書把赫魯曉夫的報告借來看看。後來，寫作組印了幾十本。這是「四人幫」的陰謀，我們跟著轉，配合他們搞陰謀。

（四）在張春橋的反革命密信的煽動下，整理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行，我上次交代過，搞這一批黑材料，不只是一個電話就出籠的，是「四人幫」的黑旨意和我的反動思想合拍的結果。

去年七、八月份，我看到北京、天津處理知青工作情況，怕影響上海。當時向姚文元彙報了，姚文元煽動說，這是毛主席指示嘛，要統籌

解決嘛，可以向毛主席、黨中央發電報嘛。姚文元是因為受了毛主席的批評來上海的，這個反動文痞，對毛主席刻骨仇恨，挑動我向毛主席施加壓力，反對毛主席。後來市委發電報給中央和國務院，請求統籌解決。一時得不到解決，我很焦急。加上鐵道部、教育部的情况，連續向張春橋打過兩、三次電話。他不作答覆，反而給我來了一封反革命密信，大意說：我知道你現在有很多難處，比較煩惱，我現在處境也很困難，也無能為力，不要急，今後慢慢會好的。他還講看完要燒掉。我只給徐景賢、王秀珍看過。這封信可能燒掉了，也可能退何秀文了。這封反革命信煽動性很大，在我思想上估計是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等人要搞他。現在張春橋無權。因此，我追查所謂謠言特別積極。王洪文在上海時，我問過王洪文，江青和外國人談話出書有無此事，他謊稱談話是有，絕不是像謠傳的那樣，這是謠言。他還說，你可把上海謠言內容寫個信給我，我可以報毛主席，我寫了。後來江青在大寨會上露了面，我和徐景賢、王秀珍等同志既高興、又議論，說什麼，毛主席在抓關謠了。我們處處為「四人幫」塗脂抹粉。

張春橋的一封反革命密信，是反對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因為他們陰謀反周總理，七四年以後，毛主席多次對「四人幫」嚴厲批判，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又嚴肅地批判了「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的錯誤。為此「四人幫」對毛主席極端不滿。王洪文、姚文元相繼竄來上海。王洪文也攻擊毛主席，說他沒有權，只有抓讀書班的權，要我主持工作，我要討論這個問題，那個人不同意，我要討論那個問題，這個人不同意，我怎麼主持工作。王洪文這些極端反動的言論，我當時曾說過一句錯話，講喝醉了，酒後失言，趕快回去。後來我認為他這話是極端反動的。是反對毛主席、黨中央的。我沒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告。經過張春橋來的反革命密信的煽動，我們和「四人幫」一樣，感到受壓，有一肚子氣。因此，碰到在處理具體工作時，同一位計委負責同志有些不同看法，我就發火，罵他專門反對上海。我還說，現在還不到我講話的時候，到講話的時候，我是要講的。

黃濤弄來了鄧小平在八月十八日會上的講話，說「積重難返」，我

和徐景賢、王秀珍、黃濤學著帽子工廠的老闆的樣子，一面罵人家，一面就收材料，準備反擊。

黃濤又弄來了國務院某某負責同志在基建經濟核算會上的講話，其中我們也認為有幾句話有問題，我就反動地說這個人也變了。七五年十月底，王洪文要我統計過國務院各部召開會議的數字。他準備用這些數字去炮打國務院。

還有其他教育戰線方面的材料，逐步在收集了。到十一月十九日，萬體館開會的那一天，得知了政治局在批判劉冰等人的信，在教育戰線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我們和「四人幫」南北呼應，以為時機到了。在講話中，加上了這個會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資產階級威風等話。

今年一月初，我向張春橋彙報煤、電、油等生產情況時，張春橋說：你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形勢，要注意大事，不要老抓一些小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加上張春橋的黑指示，於是我收集材料，（所有這些黑材料，都沒有給周司令看，主要是以「四人幫」劃線）召開座談會，煽風點火非常積極。

加緊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今年一月八日晚上的一次座談會上，我就點了一位部長、一位副部長的名，並暗示後面有後臺，後臺是鄧小平。徐景賢同志還告訴參加會議的同志可到大學參觀，還授意要別的同志散發了某省領導同志的材料。散會後，大約十一點以後，得到黃濤打給辦公室一個電話，說是今晚要廣播一個沉痛消息，我們意識到可能是總理發生了不幸的事情。第二天六點鐘聽到廣播總理逝世，我們雖然也悲傷、也流淚，但沒有集中力量辦理總理追悼活動，而且還根據王洪文幾次反動電話，反動地限制追悼活動。追查鳴汽笛。一月十一、二日，「四人幫」王洪文要上海進一步收集各部的材料，我們也布置了。一月十八日，根據王洪文的黑旨意，我們強調用實際行動來悼念總理，深入反擊右傾翻案風。實際上，總理逝世以後的一個多星期，我們搞的仍然是陰謀活動。這就是配合他們加緊篡黨奪權。

而且我們幾個人議論過誰當總理，我內心是贊成張春橋當總理的，

但根據他的特點，不適合搞行政工作，搞中央工作倒合適。當時張春橋已經是中央常委了，搞中央工作合適的意思，就是由他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意思。我講某某某同志可當總理，我是論資排輩。我還說過，當總理的權可大可小，我的講話是在幾個常委和書記中講的。意思是大權要集中在中央，在「四人幫」那裡。後來公布華國鋒同志為代總理，我開始感到突然，後來我也感到合適，擺得平，我認為他是中間派，這種思想是極其反動的，是反對毛主席和華主席的，我是有很大罪行的。

（五）今年二月批招呼會議上，「四人幫」和他們的幫兇進行反革命串連，主要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反對華主席，攻擊中央領導同志。今年二月打招呼會議是毛主席批准、華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本來沒有講過開大會。張春橋一開始就妄圖破壞這個會議的。二月十九日竄來上海小組進行反革命煽動，要我在大會上發言。張春橋說，鄧小平說他不搞陰謀詭計，到你那裡講的一通不是陰謀嗎。你不要以為講過了，不講了，包括電報裡的還是可以講的。還有進口那麼多，石油出（編者注：原文如此，疑為「進」）一千一百萬噸，弄得自己停產，都可以講嘛。當時，國鋒同志識破了「四人幫」的陰謀，沒有開大會，我就根據他的黑指示，在小組會上講了話，出了簡報。但張春橋感到我們的發言調子還不高。又來對我們煽動，責問我們：你們的氣難道都出光了，看了你們的簡報，氣還沒有在家裡寫的電報大。於是，第二天我們加足氣，對鄧小平和右傾翻案風大攻了一通。張春橋在二月二十三日，來上海小組煽動，他說：某某那一套不批行，但做法要穩妥一點。還說，這些人將來怎麼辦啊？張春橋的反革命用意，就是要奪權。他還挑動說：五個省的第一書記思想沒有真解決。這一回某某某恐怕不行了，彎子不易轉好。這些言論，很明顯是同中央五號文件唱對臺戲，是反對華國鋒同志報告的精神，是破壞毛主席戰略部署。

張春橋在二月二十三日又竄到上海小組，還講了一大通黑話。他惡狠狠地說：鄧小平這批人（他講是一批人），就是買辦階級，所中國工人勞動成果送給人家，把石油壟斷起來，豬肉壟斷起來，宣傳是壟斷資產階級。還胡說比蔣介石還厲害。張春橋說，蔣介石壟斷不了全國，他

們壟斷了。這是惡毒攻擊包括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黑話。

二月二十二日毛遠新等人竄來上海小組時，惡毒攻擊經濟部門，矛頭指向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毛遠新說，大學我們自己可以搞，經濟上他們（指國務院）卡我們。毛遠新還惡毒地攻擊說，他們不僅代表資產階級，而且代表買辦階級。這時一位部長也攻擊了一些中央領導同志。我也緊緊跟上惡狠狠地說：經濟部門可用鄧小平的一句「積重難返」的話用在他們身上，是非常合適的。我還煽動這位部長要帶頭揭。原來我對這位部長是有意見的。從這個會議以後，我對他就沒有意見了。

張春橋還進行反革命煽動說，真是沒有道理，生產要你上去，財政收入要你增加，燃料都給你卡住。張春橋還攻擊某某部，說什麼對某某部還缺少材料，我總感到整個某某部是個大問題。某某某這個人資產階級思想夠噲。張春橋的這一通黑話，黑指示，我產生了上海這幾年生產增長不快，是因為某某部門卡我們的投資，投資太少，幾年來財政指標沒有完成，我嫁罪於某某部的某某某部長，搞條條專政。回來以後，我同意了朱永嘉要調查外貿的情況，目的是想從調查上海的外貿情況，給張春橋提供中央領導同志的炮彈。

就在二月二十二日這一天的這個會上，姚文元氣洶洶地還說，宣傳長征的文章，是有他們（指革命領導同志）的目的的，《紅旗》沒有登，他們（指革命領導同志）就罵，他們（指革命領導同志）是借此「反左」，要新幹部下去。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在各方面要表現出來。姚文元把宣傳工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長征、攻擊成為修正主義。可見，「四人幫」掌握的輿論工具，成為他們宣傳自己，顛倒是非，製造思想混亂，反對革命領導幹部的資產階級專政工具了。

江青在背著中央召開的十二省市會上，對某軍區某政委說：「你不要欺侮某司令員呀。挑動矛盾，製造分裂。江青還在這次會上，借風慶輪為題，大反周總理，她還念了他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的黑批語：說什麼「我們的交通部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竟然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和國務院的其他領導同志。



會議結束時張春橋找我們三人到釣魚臺談話，有兩條是最惡毒的，一是回去後毛主席十二條指示首先組織一批理論隊伍先學，妄圖把批鄧鬥爭引入「四人幫」軌道；二是講了阿Q和小D打架後面是趙太爺挑動，趙太爺就是走資派，陰謀層層揪走資派，反對毛主席制訂的批鄧戰略部署。

對上述反動言論、反動思想在我的思想上，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我反動地認為在中央、在地方，在國務院各部有一批右的勢力，在批鄧中要衝一衝，有的要批判，有的要轉彎子，有的要打倒。我講過很反動的話，我說，鄧小平的復辟勢力，在全國是少數，但在上層，他的基礎是相當大的。我也確實講過，現在不提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是從策略上考慮的。在我的思想上，早就離開了華國鋒同志的報告，離開了中央五號文件，而跟著「四人幫」轉了。

更嚴重的是以傳達這次打招呼會議精神為名，又大搞陰謀詭計。我們點了不少地方的名，妄圖把兄弟省市搞亂。

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名，搞陰謀為實，還搞了很多壞事。我向張春橋還彙報過幾件事：（1）在財貿會議上，有人想翻「十條王法」的案；（2）批鄧開始時，講《解放軍報》很少報導批鄧的消息。（3）南京事件開始時，張春橋還要我們把《文匯報》接到的有關指責他的來信都報給他。此外，我還通過各種管道瞭解中央有關部和有關省的情況。謝靜宜、遲群對徐、王講了政治局領導對批鄧的態度，他們都向我講了，瞭解中央的核心機密是極端錯誤的。遲、謝講這些問題也是極其錯誤的。

（六）插手外地，分裂兄弟省。廖祖康來上海，我總要打聽消息。他說過某省一地區鬧武鬥，軍隊還有影響等情況。某省兩派對中央某某領導同志有意見。這是帶有攻擊性的，八月份黃濤開計畫會議回來也對這位領導同志進行了惡毒攻擊，我沒有作聲。還瞭解某省、某省、某省的運動情況，某省、某省的運動情況。瞭解這些情況的目的為了插手運動，有機會就宣傳我們的觀點。比如廣播電視會議，我和徐景賢、王秀珍又是訪問，又是宣傳，又是送材料。我們還插手了外交部運動，江青在今年二月份，十二省招呼會上，大罵某某某同志。我們心領神會。大

前天在會上我說小道消息是講錯了，當時主要想的最早從文化部長那裡聽來的，對今年二月江青罵某某某同志，當時沒記起，一散會別人一說才弄清，後來瞭解到主席接見外賓時她倆不在場，我們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感到很高興。除了瞭解外交部內部鬥爭情況外，我們今年五月向某某某出鬼點子，說什麼抓住要害寫個報告，主席一批就可點名批判。主席批評「四人幫」借刀殺人，我們和「四人幫」一樣，也是殺氣騰騰，想把抵制「四人幫」的新幹部整下去。後來，「四人幫」來電話告訴我們，外交部的事，你們不要多問，雙方都是跟鄧小平的，「四人幫」反動透頂，把矛頭又一次指向毛主席。又比如，某某部某某某來上海，本來已調出上海了，與上海無關，但我們既要瞭解某某部的運動情況，又對他做工作，要他轉好彎子，和遲群不要對立。這完全是違背黨的原則的。又比如，我支持廖清純向民航總局某某某同志進行鬥爭，支持廖清純向黨中央（實際上向「四人幫」）寫信告某某某同志，支持廖清純轉發批某某某的材料，總局開會，不要廖清純去參加，我支持他去。上海召開區、縣、局幹部會議時，我到民航局同志參加的小組去直接批某某同志，站在民航總局一邊整廖清純，還勁頭十足地說：你去報告某某某好了，我不怕，一股分裂主義的勁頭很大。又比如，我們打聽某省運動的情況，在一九七四年到某地去開會時，當時曾布置同去的幾個工作人員上街去看大字報，抄大字報。目的是想插手某省的運動。批鄧開始，我和某某同志打過電話，當時我說，據我瞭解，清華大學在一月二十三日批鄧點了名，我們在一月二十八日在市委常委會上對鄧小平進行點名批判，並準備召開區、縣、局幹部會議點名批判，把這個情況告訴某某同志，實際上是插手某省的一種惡劣手法。某某事件以後，我還曾向張春橋報告過某省的情況，說他們從北京回來，下面抓了一些人，上面沒什麼動。某某某同志來上海，要上海幫助做某某某的工作。本來想請他們雙方吃飯，但吃飯之前，我和徐景賢、王秀珍找某某某同志談了一次，要某某某同志態度明朗，承認錯誤。而某某某同志說，我們常委還沒有議論。這樣，我們認為不好請吃飯，怕談崩了，於是就沒有請雙方吃飯了。

今年四月某某要出國，我們向他建議，胡說什麼當前不出國為好。向王洪文打電話，後來電話沒有打。完全是一副太上皇的架勢。

在批鄧打招呼會上，我和徐、王還聽了某某、某某省的同志對運動情況的介紹。

某某來上海，我們三人專門找他談過一次。瞭解某省的運動情況。

（七）關於「四人幫」分裂軍隊，篡奪軍權，拉民兵隊伍為他們的陰謀服務，我已作了揭發、交代。這裡交代我積極搞武裝民兵的思想。今年七、八月份發槍不是偶然的。我在「四人幫」的反動思想長期灌輸下，要武裝上海民兵，加強上海民兵是一貫的思想。發槍彈武器大部分是經過總參後勤、南京軍區同意的，凡同意的國家投資。王洪文為了實現他們的罪惡目的。對民兵武器和裝備抓的很緊，一直直接插手過問，對生產民兵武器，他一不經中央批准私自在地方引進兩條武器流水線，作為「四人幫」生產武器的自留地。二是國家計委超產計畫不經上級機關同意就撈來分配。每年由上海某某廠、某某廠兩個廠生產××支自動和半自動步槍，同時，還由某廠專門造了一艘巡邏艇，支出了××萬元（實際造價要比這大得多）。民兵使用的雷達指揮儀器，造了十台，每台××萬元。這樣武裝民兵武器的地方經費，大量增加，前年地方經費化了××萬元，去年地方經費花了××萬，今年地方經費化了××萬。這是和陰謀篡黨奪權密切相配合的。每年報告我都接著他的黑旨意批了。今年，我為什麼要這麼急著發槍？在我的思想裡就是，毛主席百年以後，準備要保衛「四人幫」陣地。這個思想是我和徐景賢、王秀珍三人經常反動地議論主席百年之後會不會打內戰、鬧亂子密切關係的，特別主席逝世前後，我們議論得更多了。這種分析就是搞陰謀。矛頭是指向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指向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詳細情況我們三人準備向黨中央交代。關於發槍問題，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賢同志見張春橋後回來說，已向他說過了。在主席病重、病危期間，就加緊發槍。這是一個大陰謀。

民兵自成系統，推廣三位一體，兩個區、一個縣試點吃掉武裝部，是王洪文在去年民兵領導幹部一次黑會上作出的黑指示。王洪文說，趕

快試點搞出材料，總結經驗，報告主席，什麼人也不好說了。我是積極執行的，而且召開了有關單位的會議，照著王洪文的黑旨意，講了一通分裂軍隊、民兵自立系統的黑話。決定試點。今年二月批鄧打招呼會上王洪文又進行反革命叫囂說，民兵是張春橋和我搞起來的，試點要總結一下，有什麼問題，可以多試點。回來以後，我派人瞭解了，因為矛盾很多，總結不出經驗來。

（八）為「四人幫」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是任人唯親的路線，是對「四人幫」唯親的路線。上次已交代了些。再補充一點包庇壞人，壓制反對、抵制他們的革命同志。

原文教組的一位負責人，因為他知道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議論過臭妖婆江青的問題，張春橋就把他關了起來，又查歷史，又查現行。因為歷史查不出問題，議論江青又是過去的，他關裡面當然不服，寫了一份思想彙報，不指名地反對大野心家張春橋。結果，張春橋對他恨之入骨，硬要把他打成反革命。

張春橋在一九六八年，抱住林賊的大腿，為林賊大建招待所，要布六千尺。有一位組辦負責同志不知道是為林賊搞招待所，對用布太多提出了不同看法。當時張春橋就把這個負責同志關了幾年。

張春橋攻擊、批判陳毅同志，是有陰謀的，專門為了打擊他在上海的影響的，我也跟著講過錯話，攻擊陳毅同志是老右傾。我在北京開計畫會議，我沒去參加追悼會是錯誤的。在五七幹校裡，有的同志因為毛主席參加了陳毅同志的追悼會，對陳毅同志的悼詞評價很高，為此，王洪文對他們批判了一通。我們也執行了。

「四人幫」對革命幹部恨之入骨，對叛徒、特務、新資產階級分子或者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只要擁護「四人幫」的就包庇。

小兄弟中有的已成新資產階級分子，有的原來就是流氓。我向王洪文匯報時，王洪文卻說，這些人有些問題，但在關鍵時刻還是有用的。其中有些人在這次武裝叛亂中就起了作用。「四人幫」包庇這些人，搞結黨營私，招降納叛，是有他們的罪惡目的，這就是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

有些小兄弟的問題我是知道的，有的問題我也向王洪文講過，但是他死保，我喪失原則，不敢向黨中央報告。因此，有時我只好搞些改良，勸說勸說，有時還講過讚揚他們工作的話。有的還講些討好話。對個別小兄弟也許過願，我是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幹部，為什麼這樣，一是我私心重、骨頭軟。保烏紗帽，要和王張及小兄弟一股勢力頂，我的烏紗帽一定保不牢。二是我有野心。張、王在不同時間，講了兩次我不能工作時誰來代表的問題。他們又是這麼急？我想可能要我到國務院抓經濟工作去。看來這樣作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一部隊。我這樣做，是出賣了靈魂，出賣了原則，向資產階級投降了，做了「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做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九）「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全國、對上海的國民經濟破壞是很大的。上次已揭發交代了一些。在上海的經濟工作上，不論工業農業，主要是自搞一套，搞獨立王國。張春橋不懂工業生產，多次講只要抓階級鬥爭，生產可以自然上去。我也講過只要路線正確，計畫完不成也可以。張春橋講農場只要抓階級鬥爭，顆粒無收也行，我也破壞農業學大寨。在重點工程上，廣大工人、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份子作了很大努力的，但「四人幫」貪天之功，竊為已有。什麼「701」、「708」，還有其他一些重點工程，他們在口頭經常講為政治服務，為路線鬥爭服務。他們用上海人民的勞動成果作為他們搞陰謀的政治資本，來壓中央，壓國務院以及有關部。張春橋在郊區多次提倡，在全國作出模範，反對學大寨，今年以來積極在郊區搞生產隊過渡的險惡用心也屬於這種性質。「四人幫」口頭上關心人民的生活，實際上是搞分裂、搞陰謀。比如，今年上半年蔬菜供應一度緊張。張春橋批了長長一段，打著自力更生的旗號說，靠外省越來越靠不住了。以此來挑動上海和外地的關係，搞分裂。

由於「四人幫」推行搞分裂、搞陰謀、搞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上海在經濟管理上，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套，什麼大組套小組，上下一般粗的組織機構固定化。在計畫上沒有綜合平衡，「四人幫」一句話就是計畫，什麼人都可以批基建項目，比如王洪文直接插

手的萬體館，計畫九百多萬，實際化了三千多萬。江青要把某苗圃改為植物園，王洪文所在的一個車間翻建，王秀珍所在的三十棉擴建，還有什麼陳阿大、馬振龍的項目。但是，國家急需的項目，可以遲遲不解決。有的可以改革改造解決，一定要搞新建的。貪大求洋，有的糟蹋人民血汗，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很多人民急需的專案，排不上隊，即使排上了隊，也被擠了下來。對科學技術研究也有很大的破壞。比如728工程就沒有堅定地執行總理的指示，拖了十來年。國務院來的文件可以拖著、壓著，置之不理。我們在經濟建設上，也是圍著「四人幫」轉的。在這方面我負有很大責任，有很大罪行。黃濤、陳阿大也幹了不少壞事。

由於「四人幫」的破壞，使得很多幹部不敢抓生產。怕一抓生產，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在生產上造成了嚴重的惡果。生產增長率逐年下降、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也逐年下降，但成本上升，單耗增加，事故增多。出了事故往往去找英雄、找烈士，不追查，不處理。

這一套錯誤路線，我是執行了的，我在這方面放了很多毒，是跟「四人幫」搞修正主義路線。我還胡說，大慶的崗位責任制值得研究。我口頭也講崗位責任制還是要的，下面一搞崗位責任制，我就批評人家搞管卡壓，搞條條框框。致使近幾年來生產增長率下降，成本上升。造成嚴重惡果。我對大慶經驗的錯誤講法，這是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的。

我對某某部進出口問題上，包括二百五十萬噸船的進口，放了很多毒。我攻擊某某部是崇洋賣國部，比慈禧太后還厲害。某某部是周總理、李先念同志直接抓的，我攻某某部，就是攻了周總理和先念同志。特別是今年借批鄧為名，在今年二月打招呼會上，張春橋進行反革命煽動說，他們（指國務院）給大慶進口一套××萬噸已烯裝置，我（指張春橋）說，大慶要進口，最好大寨的土地上盡開外國的拖拉機算了。張春橋這種反革命煽動、惡毒的攻擊，反動透頂。張春橋的矛頭是直接指向周總理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

（十）我對今年十月政治局召開的打招呼會議的反動態度。在政治局打招呼會上，七號夜裡聽了華主席和政治局同志講話以後，我開始思

想根本不通。我當時的反動思想是，聽了像打了一悶棍，怎麼把我心目中的所謂左派都隔離了呢？這個思想是很反動的。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全國一片歡騰。和我一起參加會議的人也都很高興。因為我和「四人幫」陷到一起去了，所以黨和人民的鐵拳打在「四人幫」的身上，好像也打在我的身上。十月七日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我對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很多話沒有聽進去，因此，感到材料不足，為什麼這樣突然襲擊？也懷疑過是不是宮廷政變，把代表全國人民心願，繼承毛主席遺志，對「四人幫」採取英明果斷措施，攻擊為突然襲擊和宮廷政變，這是極端反動的思想。我思想很不通。當時感到怎麼表態呢？如說不同意，可能回不去或派一位同志和我一起回去，如果作個蒙混過關的假表態，回上海講了以後，要大吵大鬧大幹，不大鬧、大幹，小鬧、小幹也一定會發生的。但我又認為現在已是大勢所趨，我們這樣鬧是要造成分裂，損失太大，我擔負不了這個責任。也想過還是請求調動工作吧，最好到遠點的地方去，新疆、西藏都可以。我還估計，如果思想老是不通回不了上海，如跟我去的秘書能回上海的話，要他告訴徐景賢、王秀珍同志，不要亂來，因為全國對砸爛「四人幫」都擁護，要進行合法鬥爭。家庭有點問題也請照顧一下。上述這些講話，我和秘書談過。我的所謂合法鬥爭，就是向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進行鬥爭。這個思想是極為反動的。

第二天（八日），我思想鬥了一天，晚上開會又聽了領導同志的講話，思想有一點進步。我認為江青大鬧政治局，致使華國鋒同志不能工作，王洪文也確有問題，但張、姚還有所區別。因此，表態時曾有一句極反動的話，建議處理時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還沒有把他們看成是一幫。因此，自己思想上還沒有通，第二天周司令說我這句話講得不好。當時我估計我回來說服不了一些人以及「四人幫」的小兄弟。所以，我和純麟同志建議請徐景賢、王秀珍去北京，要求中央幫助做他們的工作。九日上午秀珍打電話來一定要聽馬天水的聲音，我才打電話，問我見到王張姚沒有？身體如何？我說了個謊，我說他們身體好，工作很忙。

十一日中午，錫聯、振華、志福同志找我和周司令談了話，耐心教育了我，我也提了一些問題，使我認識了「四人幫」的問題是極為嚴重的。這一天，我又看到了張春橋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的「有感」。我就明確表態了。堅決和「四人幫」劃清界限。十二日，又明確了表了態。現在認識到，表一個明確的態度是比過去有了進步，但離轉變立場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回來在傳達時又犯了右傾的錯誤。在常委會上還稱過張、王為同志，站在「四人幫」反動立場上，向小兄弟做工作，只要他們不要鬧事就行。當時極端錯誤地估計廣大幹部、廣大群眾的階級覺悟，把廣大群眾、幹部和各級黨委丟在一邊，先做小兄弟的思想工作。這完全是錯誤的。而且傳達時並不是照本傳達先講如何篡黨奪權一段，然後再講主席從七四年以來如何批判「四人幫」的，從常委會到作小兄弟工作，感到這樣講還有效的。所以第一次區、縣、局會議也這樣講了。當然，當時有的文件還沒完全整理好。後來所有文件本來決定全部照傳，因會上有人講了幾句，我又動搖，只講了標準本和最後接見的講話。另兩本，後來有人提議才又印發了。

我犯了嚴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和「四人幫」在一起，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對華主席，反對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現在，我堅決澈底地和「四人幫」劃清界限，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和「四人幫」鬥爭到底，清算自己的錯誤和罪行。我請求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革命群眾能給我將功贖罪的機會。<sup>29</sup>

## 徐景賢的補充揭發交待（1976.11.21.）

最近，我反復學習了毛主席關於批判「四人幫」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學習了華主席在中央打招呼會上的重要講話和中央十六號文件，參

<sup>29</sup> 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發。



加了上海區、縣、局黨員幹部會議的大會、中會和小會，經過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的多次耐心教育和挽救，經過同志們的揭發、批判和幫助，我深深受到了觸動。「四人幫」罪惡滔天，我自己的罪行累累。對於同志們的揭發和批判，我表示誠懇的接受，並在這裡向全市人民低頭認罪。現在，我再補充揭發和交代「四人幫」和我自己的一些主要罪行。以後還將陸續交代。

### （一）揭發「四人幫」篡黨篡軍的陰謀並交代我的罪行

「四人幫」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蓄謀已久，但是，他們覺得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就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人民軍隊。他們極端仇視和害怕人民解放軍，他們大搞反軍、亂軍，目的就是妄圖篡奪軍權。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人幫」王洪文在上海時，反復對馬、徐、王造謠說：「軍隊不可靠。」他攻擊說：「政治謠言都是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傳出來的。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那些老傢伙亂講，發洩不滿，特別是某某軍區的某某和某某軍區的某某，跳得最高。」他議論和攻擊某某總部和某某總部的領導，攻擊好幾個兵種的領導，攻擊好幾個大軍區的領導。在王洪文眼裡，軍隊的領導同志大多數是不好的。他的反動言論，對我起了極大的毒害作用。

王洪文在上海時，還流露出他要篡奪軍權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新華分社報導他在上海參加八一建軍節慶祝晚會時，發出的稿子上寫了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發到總社以後，被有的同志誤加上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後來到了凌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以前才被發現，臨時作了更正，但國外的電訊已經傳出去了。王洪文知道這個情況以後，通過他的秘書廖祖康傳話給我們，說什麼：「本來毛主席提過要王洪文當軍委副主席的，後來不知道怎麼又不提名了。」可見，王洪文對毛主席嚴肅批判了「四人幫」，又不讓他竊取軍委副主席的要職，他是咬牙切齒、懷恨在心的。他不但想篡奪黨權，還野心勃勃地妄想篡奪軍權。

張春橋是「四人幫」中搖鵝毛扇的，說話特別陰險。今年二月批鄧打招呼會議時，他第一次來京西賓館，對我們談到軍隊的問題時，他惡毒地說：「部隊，我們有處理林彪問題的經驗。戰士都是工農，幹部也不願意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段大黑話，張春橋說什麼「我們有處理林彪問題的經驗」，意思是「四人幫」要在上層、在中央把軍隊的領導同志像林彪一樣地解決掉，然後妄圖蒙蔽廣大戰士和幹部跟著「四人幫」走，他的用心是十分險惡的。

張春橋當時身為總政治部主任，但卻對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廣場事件以後，王洪文的秘書肖木來到上海，在談到天安門廣場事件時，肖木對我說：「在天安門廣場最亂的那一天，春橋在人民大會堂裡面往外看，他甚至想：假如軍隊把槍口都掉過來（就是對準「四人幫」），那怎麼辦？」肖木說，這是張春橋事後告訴他的。這句話撕下了張春橋的總政治部主任的假面具，暴露了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我們的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這是保護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它當然也要保衛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只有像張春橋那樣心懷鬼胎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才會在我們人民軍隊的槍口面前感到恐懼和害怕，這是他反革命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

「四人幫」江青一貫攻擊軍隊，今年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對我們說：「部隊搞成這個樣子，怎麼行啊？」她還攻擊說：「現在軍隊的報紙、文化的領導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掌握在混進部隊的、沒有改造好的知識份子手裡。」江青恨不得把這些領導權，統統竊取到她自己的手裡。江青還狂叫：「等到部隊搞好了，問題解決了，我再穿上軍裝，再戴上紅星。」江青所叫囂的「部隊問題解決了」，就是要「四人幫」篡了黨，篡了軍，她才肯甘休。

「四人幫」姚文元，據我的瞭解是一貫亂軍的，早在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他就夥同張春橋支持一些人衝某某軍區。一九六七年，他又和張春橋一起到某某省，支持這個省的一部分人反對某某軍區。姚文元有一條基本的理論：「軍隊就是保守派的後臺」以後，他又夥同張春橋一起

在軍隊中支一派，打一派，分裂軍隊，搞亂軍隊。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本身就是「揪軍內一小撮」的罪魁禍首，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王、關、戚被打倒了，但張、姚卻在江青的包庇下滑過去了。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原來上海時，還當著馬、徐、王的面攻擊葉副主席。

正因為「四人幫」強烈地意識到軍隊是他們篡黨奪權的主要障礙，所以他們就千方百計搞亂軍隊，篡奪軍權。

王洪文自己就插手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部門，又通過他的心腹民航總局的副局長、上海民航局的局長廖清純插手民航和空軍，目的是篡奪空軍的領導權。

毛主席病重期間，「四人幫」更加加快了他們篡黨篡軍的步伐。今年六月，王洪文、張春橋跑到總政治部去開會，會上點名批判了某某部的一些領導同志以及某報的負責人，張春橋還氣勢洶洶地說什麼：「某某部不可靠，不可信，不能用。」這個會以後，「四人幫」還準備對其他軍事部門一個一個搞下去（這些情況，是今年六月底我的秘書到北京送醫療器械時，原來在上海文教組工作，現在總政保衛部的徐海濤來看他時對他說的。）「四人幫」這樣做的目的，完全是要對軍委所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一個一個開刀，妄圖把軍權全部篡奪到他們的手裡。我不但整上面的，而且整下面的，某師的一個幹事寫了一句「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在上海」，我看觸痛了我的主子張春橋，就連續批了幾次，連他回家結婚都不放過。整他的目的還是為了整警備區的領導。

在「四人幫」的指使和毒害下，我也積極地插手軍隊，搞亂軍隊，破壞人民解放軍的崇高威望。除了上次已交代的外，再補充交代幾個罪行：

（1）張春橋對上海警備區新來的領導同志，只要不聽從他的指揮的，就要狠整。十屆二中全會期間，他當著上海全體中委、候補中委的面，訓斥周司令，他胡說周司令不說真心話，把周司令整得心臟病發作。某某某政委來上海時，張春橋也借部隊裡發生的一起事故，拍桌大罵某政委，我也跟著張春橋狠批某政委，充當了打手。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張春橋對馬、徐、王說：「新來的（指某某某政委）不一定比原來的好。」在他的煽動下，我在一次談話時，狠批了某某某政委和某某

某副司令，妄圖壓服他們服從「四人幫」的指揮。在批林批孔時，我們秉承張、王的黑旨意，聯合召開市委常委和警備區常委會，我又在會上打擊了好幾位警備區領導同志，我還蠻橫地責問某某副政委等說：「你們來警備區，究竟是誰派你們來的？帶著什麼任務、什麼感情來的？」我這樣做的目的，都是以「四人幫」張、王劃線，搞拉一批、打一批，分裂軍隊。我對被我整過的這幾位領導同志是有罪的，我向他們認真請罪。

(2) 在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張春橋當著我們的面對李彬山副政委說什麼：「所謂正面教育就是不批首長，至於批鄧、批論點，當然可以批」，他還說什麼部隊「穩定不是不要搞批判」。他的用心是很險惡的，他反對毛主席、黨中央決定的部隊搞正面教育，他竭力主張搞批判，而且他說的什麼「不批首長」完全是假話，如果按張春橋的指揮讓部隊「搞批判」「批論點」，就一定要上掛下聯，打擊一大片軍隊的各級領導同志，非把部隊搞亂不可。所以我回上海以後，也是積極主張部隊「搞批判」「批論點」的，而且我還到一個連隊去煽動「揪軍內一小撮」，我胡說什麼：「討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個問題對軍隊是否適用，不是頭腦發熱，而是頭腦清醒。」我還煽動地說：「研究這個問題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對今後有長遠的歷史意義。」我的這個反動講話，就是要打倒軍隊的一批領導同志，為「四人幫」篡黨篡軍的陰謀服務。我的講話在上海部隊流毒很廣。應該澈底批判我的罪行，肅清我的流毒。

(3) 我在上海反對宣傳長征。去年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四十周年，北京和各地都有很多宣傳活動，開始時我要上海報紙轉載了劉伯承同志等的文章。後來我看到《解放軍報》登了一篇回憶錄，裡面幾次提到「阿丕」、「阿丕」（即陳丕顯同志），我就非常反感。以後，又看到鄧小平關於話劇《萬水千山》的一次講話，裡面說到張春橋自己講沒有參加過長征等等，我就認為這是鄧小平一夥用長征來壓「四人幫」。加上當時，我從文化部那裡瞭解到：對長征四十周年，中央沒有什麼具體部署。因此，當北京演出《長征組歌》以後，上海樂團的同志也想演，我居然警告文化局某某同志說要頭腦清醒些，胡說什

麼是部隊在壓文化部。在我的反對下，《長征組歌》沒能在上海演出，嚴重打擊了上海人民、廣大的解放軍戰士和革命文藝戰士對毛主席親自領導的萬里長征的深厚感情。今年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二月二十二日，姚文原來到京西賓館看我們時，他攻擊說：「宣傳長征的文章，是有他們（這裡指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軍隊領導同志）的目的的，《紅旗》沒有登，他們就罵，他們是借此『反左』，要新幹部下去。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在各方面要表現出來。」姚文元把宣傳長征，竟然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這是猖狂地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但我聽了，還認為自己不讓演《長征組歌》做得很對，這說明我在反對宣傳長征這一點上，完全是和「四人幫」一鼻孔出氣的。

（4）我秉承林彪一夥和「四人幫」的黑旨意，打擊好幾位老師。九大前後，根據張春橋的授意，上海還整理過葉劍英等同志的黑材料。九大時，王洪文和我又根據林彪一夥和「四人幫」的指揮棒，組織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團的同志少投老師的票，搞陰謀詭計。九大期間，我積極參預了狠整陳毅同志的活動。上海編了《某某同志反動言論》小冊子，發給九大代表；在九大的上海大組、小組會上根據張春橋等的黑指示幾次批陳毅同志，我都是最積極的發言人。我還跟著張春橋散布過攻擊陳毅同志的話。陳毅同志逝世以後，市直幹校的群眾來信，是我轉給張、姚、王的，以後他們批了下去，整了好幾位為陳毅同志說過幾句好話的老同志，我是負有嚴重罪責的，我在這裡向他們請罪。

我一向以文人自居，但是這次卻下了手令，調動民兵，調動軍隊，直接指揮起反革命武裝暴亂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我受著「四人幫」的毒害，認為軍隊不可靠，軍隊最危險。去年十一月，我見到江西一個人用左手寫的信，信中說：「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們，寫出了好文章、好電影，然而，一旦有變，曹操打敗了陳琳，就取消了他的發言權，好文章就成了笑料，顛倒過來的歷史又被大刀火藥顛倒過去，這種歷史教訓要引以為戒。」看了這一段，正好說出自己的心裡話，我認為「四人幫」缺少的就是「大刀火藥」，於是我把這封信加上按語要報社印成白頭情況，報給

「四人幫」，作為他們攻擊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彈。（今年二月批鄧打招呼會議時，毛遠新告訴我，此件印發政治局的時候上面引的這一段被他刪掉了，說明他做賊心虛。）特別是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前後，我更擔心有人要搞軍事政變，要打內戰，其實是擔心「四人幫」手中無兵，被人搞下臺。我的這種反動思想，完全是和「四人幫」的反動立場一拍即合的，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包括篡軍亂軍的陰謀，也一舉粉碎了我們幾個人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暴亂，真是英明及時。不然的話，「四人幫」和我們幾個人要把上海民兵拖進反革命武裝暴亂的血海，嚴重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我們幾個人搞的那裡是什麼巴黎公社，我們是巴黎公社的叛徒，我們是梯也爾，我們是要搞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和資本主義復辟。「四人幫」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就是希特勒上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這個陰謀。

敬愛的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這是一個有著偉大的歷史意義的勝利，王、張、江、姚「四人幫」篡黨篡軍的陰謀徹底破產了，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領袖華主席，毛主席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又有了自己的統帥華主席。華主席是毛主席生前親自選定的可靠接班人，是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當之無愧的領袖。從此，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又有了最可靠的保證。

我堅決擁護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堅決擁護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同時，實在感到自己的罪行嚴重，把我抓起來、關起來，都是罪有應得的。現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上海市委的領導同志和廣大幹部和群眾還這樣挽救我，我的感激和沉痛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

## （二）揭發交代「四人幫」和我反對毛主席的嚴重罪行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對影片《創業》作了光輝批示，「四人幫」千方百計進行封鎖。八月初，文化部劉慶棠打電話給我，把

毛主席的批示告訴了我，我問他如何傳達，他說要請示中央。劉還告訴我，他們原來傳達的十條（即「十大罪狀」），也是上面（指張、江、姚）定的。八月十幾號，上海市電影局在北京開會的同志聽到了這一光輝批示，也送回了記錄稿，我再次要電影局的同志請示文化部如何傳達，劉慶棠又答覆：「各地如何傳達，還是要請示中央。」這個「中央」，實際上就是「四人幫」。這樣我就以沒有中央文件為理由，拒不讓上海電影局的同志回來進行傳達。我在上海夥同「四人幫」一起封鎖毛主席的光輝批示。等到文化部開會向北京直屬單位進行傳達以後，上海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強烈要求，我才和馬天水、王秀珍匆匆商量，被迫於八月二十二日由文教組出面讓一個在北京聽過文化部會議傳達的同志在上海草草地進行了傳達。當時，我和馬、王商量的傳達口徑是：「原來關於《創業》的十條意見（即『十大罪狀』）傳達到什麼範圍的，這次毛主席的批示也傳達到什麼範圍。」實質上還是在封鎖、對抗毛主席的批示。即使這樣，張春橋對我們還不滿意。當時，上海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和工農兵作者對毛主席批示熱烈擁護，反映十分強烈。其他各條戰線的各級黨組織也希望能聽到傳達，並給市委打來了電話。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把電話記錄送給了張春橋，張春橋立即打電話給馬天水，大發雷霆地說：「誰叫你們進行傳達的？你們有什麼權利擴大傳達範圍？你要知道，這件事情關係到江青。」馬天水接到電話，也大發脾氣，打電話給文教組的一個負責人責問：「你們傳達是什麼用意？矛頭指向誰？」完全把責任推給下面。同時，在一次會議上，各單位的同志要求傳達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時，馬天水竟說什麼：「你們唯恐天下不亂！」

我一看此事觸犯了張春橋和江青，而且姚文元七月底在上海時又和我談過他對《創業》堅持的一條所謂「意見」，我覺得毛主席的批示批的就是「四人幫」，我就禁止上海的報社發文藝界討論毛主席關於《創業》的光輝批示的情況反映。我看到上海京劇團簡報上有討論毛主席關於《創業》的批示的一句話，也毫不放過，把它刪掉了。《人民日報》秉承「四人幫」的旨意，當時只發了一版不像樣的評《創業》的文章，

我因為知道了「四人幫」的意圖，就比《人民日報》走得更遠，我下達黑指示，要上海兩報把原題目「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贊彩色故事片《創業》」砍掉，改成「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勝利前進」，不加副題。我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我把讚揚《創業》的副題拿掉，又改了正題，這是我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頑固地跟著「四人幫」繼續打擊《創業》，對抗毛主席的批示，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這完全是一種表面擁護、背後反對的反革命兩面派行為和修正主義的陰謀手法。我又要報社在評論中只寫學習英雄人物周挺杉的思想和精神，不要對影片本身作評論，而且對過去有爭論的問題（即：「十大罪狀」），如《國際歌》、華程等，都要一律避開。毛主席熱情肯定了影片《創業》，我卻下達黑指示不要對影片本身作評論；毛主席尖銳批判了四人幫「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我卻下達黑指示要避開「十大罪狀」。我還要報社準備緊跟《人民日報》發表較長的對《創業》「一分為二」的所謂評論，進行反撲（後來未發）。這充分說明我完全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負隅頑抗。我為了怕得罪我的主子「四人幫」，就緊跟他們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直接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直接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到了十分瘋狂的程度。

毛主席關於《創業》的光輝批示的下達，是對「四人幫」蠻橫扼殺革命文藝的沉重打擊。當時，「四人幫」以及文化部某些人扼殺影片《海霞》的陰謀也遭到了澈底破產，這時，文化部劉慶棠和於會泳先後竄到上海，向馬、徐、王傳達江青的黑指示，什麼張天民「告了刁狀」，「謊報軍情」，「影片《創業》不向國外發行」，「再要拍一個新的《創業》」等等，他們還竭力鼓吹江青的黑指示，胡說什麼「影片無大錯，還是有錯誤。」什麼「文化部在《創業》問題上的錯誤不是路線問題，而是方法問題。」什麼「對影片不能求全責備，對影片的意見（即「十大罪狀」）也不能求全責備」等等，這些反革命言論，每一條都是反對毛主席的光輝批示的。

文化部劉慶棠來上海時，「四人幫」王洪文專門接見了他，請劉在



王洪文住的一個招待所吃螃蟹，馬、徐、王作陪。劉向王洪文匯報了「四人幫」其他人的黑指示，王洪文聽了，馬上跳出來表示呼應。王洪文在和市委常委會同志談話和審查影片時，一再叫嚷說：《創業》「影片無大錯，還是有錯誤」。「求全責備不對，不嚴格要求也不行」等等，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在「四人幫」的黑指示連續下達之後，我也公開跳出來放毒了，我在不同場合傳播過劉慶棠帶來的「四人幫」的黑話。我在審查影片《難忘的戰鬥》時說：什麼「領導不求全責備，但作為創作人員來講還要抓好政治藝術品質，要嚴格要求。」在審查影片《春苗》時我又緊跟王洪文說：「嚴格要求有好處」。我在談論其他影片時，還影射攻擊《創業》說：「把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暗藏敵人）合在一起寫，不容易寫得深刻」等等。我的這些反動言論，都是配合「四人幫」，直接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批示對著幹的。

文化部於會泳等在北京與我通電話和竄來上海時，多次叫嚷文化部處境孤立、困難，說《創業》問題和《海霞》問題發生後，北影廠有些人不聽文化部的，文化部司、局長和所屬單位的很多人也不支持部領導，什麼攻擊中央領導的政治謠言（實際上是廣大群眾對「四人幫」的批判）愈來愈多，等等。他們還傳達「四人幫」江青的黑指示說：在《海霞》問題上，「北影廠在文化部的幫助下取得了對文化部鬥爭的勝利」。這種黑話完全是直接反對毛主席的，因為毛主席關於《創業》的批示一下達，「四人幫」和文化部少數人感到處境困難，他們再要扼殺革命文藝作品辦不到了，他們再要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阻力極大，這是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勝利，是大好事。「四人幫」江青說什麼「在文化部的幫助下取得了對文化部鬥爭的勝利」，完全是發洩對毛主席的仇恨。而我當時卻對文化部的處境充滿同情，我不斷下達黑指示，要上海文化、電影、宣傳等系統的領導更多地支援文化部，實際上就是支援「四人幫」一夥，我胡說什麼「他們工作有缺點錯誤，但路線方向是正確的。」這說明我妄圖把上海文化、電影、宣傳等系統的一大批幹部和群眾拉到「四人幫」的修正主義路線上來，為「四人幫」一夥服務，跟著我去死保「四人幫」，跟著我去反對毛主席。直到今年二月

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回來，我在會上直接聽到「四人幫」江青說什麼張天民告的是「謊狀」，是「誣告」，江青還叫嚷「某省委應該再給毛主席寫信！」誣讒「張天民和鄧小平有關係」等等，我回上海參加縣、團級幹部會議小組討論時，又把江青的這些謠言和誣讒散布給到會的同志，胡說什麼是「鄧小平逼毛主席表態」，繼續放毒。文教系統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於我在影片《創業》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反動言行，是進行了抵制的，但我卻一意孤行，完全跟著「四人幫」，亦步亦趨，封鎖毛主席批示，瘋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我的罪孽深重，應該受到澈底的揭發、批判和清算。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聽說新華總社某某某同志告訴上海分社的同志，毛主席有一個重要批示，過了幾天，新華總社副社長某某某同志陪同外賓來上海，又給王秀珍傳了毛主席的同一個批示，就是：「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我知道以後，立刻敏感到這是對「四人幫」張春橋在總政的講話和對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的批判。六月份，鄧小平陪同外賓來上海，他給馬天水以及市委常委也傳達了毛主席的上述批示（我在醫院聽了其他常委的傳達）。我站在「四人幫」的反動立場上，對毛主席的這一重要指示進行封鎖，根本不往下傳達。

七月份，姚文元受了毛主席的嚴肅批判後來到上海，絕口不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這一批示。馬天水把鄧小平傳達毛主席批示的事，向姚文元報告了；我為了效忠於姚文元，也在七月底送他回北京時，在他臨上飛機以前，我一邊走一邊向他告密，我說：「聽說新華總社某某某向分社傳了關於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事。」當時因時間倉促，沒有來得及細說，但姚文元回北京後，立即進行鎮壓、追查，而且還幾次責令總社駐上海的記者檢查所謂傳小道的「錯誤」。

「四人幫」張春橋、姚文元瘋狂反對毛主席的批示，對傳了毛主席批示的同志恨之入骨，而我不但夥同張春橋、姚文元封鎖毛主席的批示，而且和姚文元勾結起來迫害革命同志，這說明我死心塌地賣身投靠「四人幫」，直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我的行為是十分卑鄙的。

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假借反對「經驗主義」大反敬愛的周總理，在我控制下的上海兩報和電臺也刮起一陣反對經驗主義的妖風。一九七五年四月，市委召開的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重要指示的經驗交流會的新聞稿，是經我和市委其他主要負責人審定的，某局某某同志關於批判經驗主義的所謂典型發言，也是我們幾個人一手炮製，並決定在報上公開發表的。當時，我在上海的新聞戰線上緊鑼密鼓地大反經驗主義，就是篡改毛主席關於修正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指示，就是配合「四人幫」大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毛主席關於《創業》和關於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重要指示，我明知是真的，但我以沒有文件為理由，拒不進行傳達。其實這根本不是理由，因為「四人幫」的指示，哪裡有什麼文件，但是我傳得特別快，特別賣力；幾位政治局同志和副總理接見科學院的講話，根本沒有文件，是從某大學裡一個人的筆記本上抄來的，我卻拋了出去，大量印發。毛主席圈閱同意的姚文元關於《詩刊》復刊的一封信，雖然有一個文件，但不是正道來的，市委並沒有收到過，是姚文元直接寄給寫作組的，我卻讓朱永嘉在去年十月的上海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用記錄速度宣讀姚文元的信，我並大肆吹捧姚文元。

這些事實說明，我對毛主席指示的態度，完全是以對「四人幫」是否有利為出發點的，有利的就傳達，不利的就封鎖。這是一種極其反動的實用主義的思想，是從根本上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

### （三）揭發交代「四人幫」和我反對周總理的嚴重罪行

在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前後，「四人幫」利用批鄧，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我在上海和馬、王也緊緊跟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份文化部於會冰、劉慶棠、浩亮等來上海，在

馬、徐、王面前透露了遲群告訴他們的政治局批鄧的情況（前已交代），還攻擊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領導同志，污蔑說這位領導同志的女兒在清華大學念書，胡說什麼劉冰攻擊遲群的信就是這位領導同志要女兒帶了口信去叫劉冰寫的。

在十二月底的縣、團級黨員幹部會上，馬天水就在講話中宣布：「不管是那位領導，有錯誤都可以批，名字只點到某某某。」我也在會上拋出幾位政治局同志和副總理的材料，並在一次文教小組會上，當有關同志宣讀這份接見科學院的講話時，我當場批了這份材料中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論點，實際上是點名批了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

「四人幫」王洪文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或一月上旬和我通電話時，拚命給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打氣，他說什麼：「上海的討論情況是好的（指十二月份我們召開的縣團級黨員幹部會議），前一陣右傾翻案風，上海的幹部還是表現好的。」這實際上是鼓動我們幾個人繼續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他又說什麼：「形勢是好的。不過主席說了：歷次路線鬥爭的頭子，改也難。」他在電話裡告訴我，他已經在揭民航總局的蓋子了，他說：「民航總局我自己在抓，叫某某他他不來，我就叫某某來。」可見，「四人幫」根本不是在批鄧，而是借批鄧為名，要打倒一大批黨政軍的領導幹部，王洪文當時以批鄧為名親自插手民航就是一個罪證。

緊接著，他又進行反革命煽動，說什麼：「下次你們向中央發電報，可以點部老爺的名，可見右傾翻案風不是孤立的。」我把王洪文的電話告訴了馬天水、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社論，發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我認為這是半公開的點鄧小平的名了，因此大為活躍，還一心想揪鄧小平以外的走資派。

一月八日下午，我跑到某大學的一個小組，就某省委負責人的一個講話進行煽動，並布置常委的負責同志晚上帶了這份材料到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散發。晚上，馬、徐召開座談會，馬天水點了有的部的領導同

志的名，我對到會同志煽動地說什麼：「你們的油印機難道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沒有空嗎？」這實際上是布置各單位大量印刷這些非法材料。

當晚會議結束以後，十一時半左右，我聽到馬天水說了周總理逝世的沉痛消息，我當即趕回辦公室，給王秀珍和部分常委打了電話。第二天，市委忙於討論哀悼總理的事，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撤銷八日晚上座談會的布置。以至有的單位回去繼續開大會傳達和印材料。我們八日晚上會議的傳達，直接打擊和損害了廣大群眾對敬愛的周總理的沉痛哀悼的心情，我犯了嚴重的罪行。

從周總理逝世到召開追悼會這短短的幾天裡，「四人幫」出於對敬愛的周總理的刻骨仇恨和他們想要篡黨奪權的迫切心情，他們加緊以批鄧為名反對周總理，打擊黨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在周總理訃告發表後的第二天（一月十日），「四人幫」就迫不及待地讓新華總社發了北大批奇談怪論的報導。過了兩天，群眾正在深切哀悼周總理時，「四人幫」突然又在十四日用頭版頭條的突出地位，發了清華大學《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長篇報導，而且用很大的字體加了編者按，通篇隻字不提對敬愛的周總理的沉痛哀悼，而拚命強調「對右傾翻案風發動了猛烈攻擊」，「四人幫」完全和全國人民處在對立的地位，他們在這個時機猖狂地反對周總理，激起了眾怒。在周總理追悼大會的報導和悼詞發表以後的第二天，一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雙頭條，一條是北大回擊右傾翻案風，一條是清華駁斥奇談怪論，並用新華社電訊發至全國。從此以後，全國各地悼念周總理的文章全部被扼殺了。我在上海也砍掉了上海群眾悼念周總理的大量的文章，我犯了大罪。

與時同時，「四人幫」王洪文還給我們下達了黑指示，周總理逝世以後，我們很想去北京一次和敬愛的周總理的遺體告別，王秀珍打電話給王洪文，這時，一貫反對周總理的王洪文回答：「你們不要來了，中央有規定。你們用批鄧的實際行動悼念總理嘛！」周總理是一月八日逝世的，過了只有兩三天，即一月十一日或十二日，王洪文立即又一次打電話給市委，要繼續收集中央領導同志和各部的黑材料給「四人幫」送去。他們反對周總理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一向跟著「四人幫」的指揮棒轉的我，這時緊密配合了他們加快篡黨奪權的步伐，配合他們瘋狂反對周總理和中央領導同志。我下達黑指示，要上海兩報盡量多登北京兩校的報導和文章，而且要求盡量把新華社發來的外地的電訊登在顯著的比較醒目的地位，而寧可把上海的報導放到後面，我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我要報紙把外地一些大學和工人大學等的新華社電訊放在顯著地位，目的是想把那些地方發動起來，實際上是妄圖讓那些省、市跟著北京兩校和上海轉，把他們那裡按毛主席部署進行的批鄧活動納入我們的完全錯誤的軌道。在廣大群眾沉痛哀悼周總理的時候，在我的策劃和指使下，召開了某中學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現場經驗交流會，我並授意在這個會上散發非法材料，壓制和打擊了廣大群眾對周總理的無比熱愛和沉痛的心情。周總理追悼會剛開過，我就從上海解放日報的送審稿中，專門選了一篇上海某大學的報導，親自修改後讓新華分社發到總社去，配合北京兩校的反革命輿論。結果，這篇報導果然被「四人幫」看中了，姚文元親自作了修改，又送張春橋審閱後發至全國。我從新華總社知道這個消息後，居然還興奮異常，親自跑到這個大學去，胡說這篇報導的標題改得好。《風雷滾滾旌旗奮》，我說旌旗就是什麼「戰旗，指揮旗」，妄圖使上海的兩校完全跟著「四人幫」的指揮棒轉。我那時跟著「四人幫」南呼北應，得意忘形，已經以指揮者自居了。這都是我的罪行，有關部門和大學、中學以及新聞單位的領導同志完全是受了我的毒害，他們是沒有責任的。

一月下旬，黃濤從北京開計畫會議回來，在某飯店和馬、徐、王密談張春橋的黑指示，張春橋說：「清華已經點鄧小平的名了，你們常委會要不要點，由你們考慮。」黃濤還說，王洪文偷偷地拿了幾份清華大學的簡報給他看，上面已經提到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總代表、總根子了，黃濤又說：「既然是後臺，總還有前臺；既然是總代表，那一定有其他代表。」這時，「四人幫」實際上已經篡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大權了，毛主席還沒有下命令點名，「四人幫」卻下命令點名了，張春橋迫不及待地想把總理的位置撈到手，已經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直接出來指揮了。張春橋一聲令下，我們就在春節期

間開常委會，公開點了鄧小平的名，在會上也點了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的名。會後，由我起草向毛主席、黨中央發了一個點名批鄧小平的電報。

開會期間，遲群打電話給我，一方面要上海印某某的書，另一方面就把清華、北大常委會點名和兩校大批判組同時點名批判的情況通給了我，並告訴我《人民日報》要發清華的報導。我和馬、王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

等到清華二月六日的報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一發表，我們決定再次召開縣、團級黨員幹部會，公開點鄧小平的名，馬天水在會上的講話等，都是事先請示「四人幫」張春橋批准的。那一段時間，我的頭腦發熱到了瘋狂的程度，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直接和廣大群眾沉痛哀悼敬愛的周總理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對著幹的。

在「四人幫」的策動下，我在悼念周總理的這個時期中，就幹了好幾件反對周總理的罪行。其中突出的罪行之一，就是我親手砍掉了上海市舞蹈學校送審的簡報中有一段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文字。我是二月初收到簡報的送審稿的，當時忙於配合「四人幫」搞篡黨奪權的輿論，沒有看，後來舞校又來催了兩次，記得我是在二月十號以後才看這份簡報的。我當時只聽「四人幫」的，認為當時一切工作都應該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中心，悼念周總理等活動早就被我拋在腦後了。在這以前，我還下過命令要上海兩報「今後可以發或不發」關於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情況簡報。所以，我在看舞校的簡報送審稿時，認為二月六日清華大學的重要文章都發表了，報紙上國外來的唁電都停發了，這份簡報中悼念周總理的文字已經過時了，所以就一刀砍掉了。我在這裡砍掉的不是一段文字，我砍掉的是舞校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敬愛的周總理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再從內心深處來檢查，因為樣板戲劇組的簡報，是直接送「四人幫」張春橋、江青的，我怕得罪他們，我怕他們看了有意見，所以把悼念周總理的這段文字砍掉了。我為了迎合「四人幫」，連一個文藝單位要把廣大群眾對周總理的敬愛之情寫上簡報我都不容許，我的思想和立場是何等反動呀！我在這裡以最沉痛的心情向舞校的全體同志請罪。

在這個時期裡，我還刪掉了報紙簡報和稿件裡關於敬愛的周總理的一些正確的提法，這都是怕得罪「四人幫」張春橋、姚文元。因為我知道他們看上海的報紙和情況反映是非常仔細的。張春橋、姚文元多次對我強調：「小報（指情況簡報）有時候比大報更重要。」這是他們的黑話，他們企圖通過情況簡報來吹捧他們自己，同時打擊其他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就在主席逝世以後，張春橋看到解放日報情況簡報中一位老工人的話，說毛主席為我們挖盡了苦根，張春橋出於對毛主席的仇恨，立即抓住「挖盡苦根」這四個字大做文章，指責說什麼「提法不妥，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等等。所以，我對報紙的情況簡報和重要文章等，往往是用「四人幫」的眼光一字一句細扣的，凡是「四人幫」控制的《紅旗》、《人民日報》等沒有用過的提法，我就把它刪去，結果在悼念周總理的簡報中，我把群眾反映中的一些完全正確的提法例如「以周總理為榜樣」、「周總理最嚴於解剖自己」等都刪掉了，而後來這些提法在《悼詞》中都出現了，證明廣大群眾最熱愛周總理，他們的提法是完全正確的，而我卻跟著「四人幫」走，越走越遠，走上了反對周總理的道路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文匯報在發表新華總社電訊稿時，刪掉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過去為雷鋒同志的題詞和其他的一些文字。當時，正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不到三個月，廣大群眾懷著對周總理的無比崇敬和熱愛的心情，對文匯報的這個刪節表示氣憤，提出疑問，這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四人幫」長期以來反對敬愛的周總理，把上海市委內馬、徐、王這幾個人作為他們反黨篡權的黑基地，嚴密控制上海的輿論工具，對這一點，廣大人民早已看在眼裡，恨在心裡了。

文匯報的革命同志，在三月十幾日收到讀者來信發現這個問題以後，心情都很沉重，他們把這一嚴重錯誤向市委作了報告和檢討，但作為分管新聞工作的市委書記的我，以刪節稿發表前我未看過為理由，不但不主動承擔這一嚴重錯誤的政治責任，反而把責任往下推，把文匯報的同志狠批了一頓。緊接著，馬天水和王秀珍也對文匯報的同志狠批狠整。三月二十幾號，我們把文匯報的檢討列印後送給「四人幫」王、張、姚，他們還沒



有來得及批復，又發生了文匯報三月二十五日事件，那知報紙上發表了某局的一篇新聞稿，提到：「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這段文字，非常容易使人發生誤解，因為當時鄧小平在公開報紙上的代名詞全稱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或「黨內那個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而現在新聞稿的這種錯誤的寫法，會使讀者把後面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新聞稿上並未寫明是單數還是複數）理解成是指鄧小平，而不是指其他的走資派，至於前面的「黨內那個走資派」，就會使讀者聯想到是暗指敬愛的周總理。加上文匯報又發生過三月五日刪節周總理題詞的事件，讀者的義憤就更大了。那幾天，對文匯報的來信、電話、電報大量湧到，大標語等也進入上海市區。

文匯報的兩次事件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後果，當時已近三月底，馬、徐、王慌了手腳，趕緊向毛主席、黨中央發電報。我在起草電報時，強調客觀理由，根本不檢討自己所分管的報紙出了這樣大的錯誤，嚴重損害了敬愛的周總理的光輝形象，嚴重損傷了廣大群眾無比熱愛周總理的深厚感情，不反映文匯報同志的沉重的心情，同時也不檢討我自己應該承擔什麼罪責。不但如此，當我們發去電報以後，馬天水又給張春橋打電話報告這件事，張春橋出於他長期以來一貫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反動本性，不但不批評我們，也不批評文匯報，反而輕描淡寫地說什麼：「不要再訓斥文匯報了，今後內部總結總結經驗教訓就可以了。」另外，他對馬天水下令：「把所有對文匯報事件的來信、來電和大標語整理成情況後約我送來。」緊接著，四月一日，王洪文又給馬天水打了電話，王洪文同樣是惡毒地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他在電話中也一再說不要再批評報紙了，編輯還是可以刪稿子的，同時他還把一個中央電話通知的內容，搶先全部通給了馬天水。

在「四人幫」的慫恿和指使下，馬、徐、王的腰杆子就硬了。四月一日，市委召開了常委會，會上馬天水講了話，向全市傳達，說什麼「現有人以文匯報三月五日、三月二十五日報紙大作文章，……我們不要受他們干擾」等。我還跑到文教系統領導幹部會上去大講什麼「要提高警惕，要追查政治謠言」等等。緊接著，我又竄到文匯報社召開會議，秉承張春

橋、王洪文的黑旨意，不但不作自我檢查，也不要文匯報作檢討，反而對夜班編輯表示慰問，胡說什麼「向你們致敬」，輕描淡寫地要文匯報在「內部」總結經驗教訓就可以了。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的秘書肖木來到上海，又竄到文匯報去傳達王洪文、姚文元的黑指示，說什麼刪掉周總理題詞是「屁大的事」，「編輯還是有權刪稿子」等等，妄圖進一步煽動反對周總理的革命情緒。「四人幫」刻骨仇恨周總理，利用他們手中控制輿論工具作了大量壞事，我緊跟「四人幫」，打擊了廣大讀者對周總理的無比熱愛和崇敬的感情，挑撥了上海和外地的關係。我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反對周總理，罪行極其嚴重，請求廣大群眾澈底批判我。

我反對周總理的罪行還很多，例如批判某某某同志的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的文章，批判周總理肯定過的某某某，把文化大革命前周總理多次看過並作了肯定的紀錄片《大慶戰歌》打入冷宮，禁映周總理親自關懷和修改的故事片《年輕一代》等等，都是我跟著「四人幫」幹的，都是把矛頭對準周總理的。這些罪行一定要一筆一筆加以清算。

#### （四）和「四人幫」澈底決裂，劃清界限，轉變立場，重新做人

我過去一直標榜自己是熱愛毛主席、熱愛周總理的，但現在領導和群眾揭發出了大量的嚴重問題，說明我長期跟著「四人幫」，立場錯了，路線錯了，不可能聽毛主席的話，不可能熱愛周總理，也不會真正擁護華主席。我終於跟著「四人幫」一起走上了反黨的道路。

我和「四人幫」特別是張春橋、姚文元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而且我的內心深處有著很多骯髒的見不得人的東西。

一九六六年底，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我起來造舊市委的反，得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十二月底，姚文元直接打電話給我，傳達了毛主席關懷和支持上海機關革命同志起來造反的指示，我對姚感激涕零。從此，我不是步步緊跟毛主席，而是步步緊跟張、姚。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姚來到上海，把我負責的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實際上當成了他們的工作機構，我感到臉上十分光彩。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事件，我認為是他們保了我，我把他們看作是救命恩人。某某某同

志來上海，應群眾要求在文化廣場繞場一周，就是我向張、姚報告的，後來張、姚狠整了這位領導同志。我對領導同志犯了罪。一九六七年底，機關造反派中有分成兩派的危險，我的處境很困難，張春橋又提名把我作為上海市黨章起草小組的負責人之一。我認為他在困難中支持了我，以後我就用死保張春橋來報答他。一九六八年四月，當時在市革委會組織組工作的某某、某某某同志，就是因為懷疑了一下張春橋和他的臭老婆的歷史，就由我發難，對他們進行審查，以後又在市直幹校整了他們達八年之久，殘酷打擊了革命同志，對此我是有嚴重的罪責的。一九六九年初，我把寫作組幾個人找來，編了《一月革命大事記》，並把張、姚在一九六七年初的講話都收集排印出來，目的是替他們樹碑立傳，並送給張、姚一份。他們看後覺得我的做法太露骨，趕緊下令不准印發。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我當上了中央委員，我認為是張、姚的提拔，對他們感恩戴德。我知道張、姚是經江青提名後到中央去工作的，因此我也緊跟和吹捧江青。一九七〇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我保張有功，同時會上發的六號簡報也是我先看到後送去的，因此到一九七一年初的上海黨代會上，他又提名我任市委書記。以後，我和王洪文發生了一些矛盾，張春橋也是明的批評我，暗中往往支持我。我內心很是感激他。一九七四年起，我無意在幾件事情上觸犯了他，一件是批林批孔初期《文匯報》根據我的一次講話發了一篇評論，另外兩件是我處理《朝霞》和《學習與批判》的問題時未向他請示，他雖然很凶地批我幾次，並要朱永嘉傳話給我，叫我「私心不要太重」，實際上是警告我要對他們俯首貼耳，不要背叛他們。我在受了批評以後，馬上向他們寫信檢討，表示效忠。長期來，我思想上總是認為，張、姚最瞭解我，最信任我，他們批評我也是愛護我。他們是我能夠站住、得以高升的大後臺、大靠山，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在我的思想中是抽象的，而張、姚卻是實在的。因此，我是完全自覺地為他們的那條修正主義路線賣命。特別是在批鄧運動中，由於我特別賣力，符合了「四人幫」要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同志的反革命願望，在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們去北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時，張對我很熱情，一句也沒有批評我。

我內心覺得這是他對我的獎勵。

張在二月二十六日找馬、徐、王談話時，提出要我們替他找兩個秘書。我回來後積極替他物色了兩個男同志，整理成兩份材料給馬天水、王秀珍看後寄給了張。到了三月份，張給我寄來了一封親收信，此信共兩頁，根據我的回憶，第一頁的大意是說，他收到某、某兩同志的材料後，覺得他們去了以後，可能沒有太多的事情，還不如在外面多幹一些事情為好。第二頁是張春橋單獨寫給徐景賢的，信的大意是：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信的末尾寫明：上一頁可以給其他同志看，這一頁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收到信後，想起一九七四年王洪文來上海時專門和馬、徐、王談了張要和他的老婆文靜離婚的事，理由是文靜有歷史問題。我覺得這是張春橋的一塊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對象是什麼條件，想有機會去北京時和他面談，因此耽擱了一段時間。後來我根據我的瞭解物色了政治上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對象，想當面徵求張的意見是否合適後再和女方談。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衛生部開會後見到張，我向他介紹了對象的情況，他當時聽了說：以後再講吧！到了十月一日，他忽然在我寫去的關於電影《反擊》問題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話：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於是我就積極把材料在十月六日寄去了。對於他這種極其醜惡、骯髒的靈魂，我不但不覺得可恥，反而認為他把我當作親信，我也努力為他效勞。

最近我進一步認識到，這不僅是張春橋的一般生活問題，而是「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整個計畫的環節之一。張的第一封信寫於三月份，正在他寫《二月三日有感》之後，他刻骨仇恨毛主席，他想取華國鋒同志而代之。因此這個野心家在信裡流露了一種極端仇恨和陰暗的心理。他聲稱「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正是這個反革命分子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華國鋒同志充滿仇恨的自供。張的第二次批語，寫於

十月一日，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日子。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大鬧，張春橋居然對華國鋒同志說：你要考慮江青的工作。九月二十九日江青又為毛遠新的事大鬧，把政治局的同志統統趕走，只留下「四人幫」和華國鋒同志。緊接著，張春橋又對華國鋒同志說：毛遠新不能回去，要他準備在三中全會上起草報告。這說明「四人幫」以為時機已到，無所顧忌，更猖狂地向黨進攻，他們已經下手了。十月一日張春橋給我的批語，是有著反革命的政治考慮的。在這個時刻他提出要我送對象的材料，說明他準備在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時，可以避免給他人抓住把柄，他裝著撇開原來和他關係一直十分密切的叛徒老婆文靜，另找一個老婆，這樣他自己就可以體面地粉墨登場了。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陰謀，也粉碎了張春橋的黃粱美夢，把這個老叛徒、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醜惡嘴臉暴露於世，遺臭萬年。

九月二十一日我見到張春橋時，還向他彙報了我所知道的軍隊的一些重要情況，以及馬、徐、王給民兵發了槍等情況，都得到了他的默許和支持，他還當面傳授了要爭取團結某某人等反革命策略。回上海以後我跟馬天水、王秀珍都說了（這些情況我在十月二十九日向華主席和黨中央寫了專題揭發交代）。因此，這一次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完全是在張春橋的支持和慫恿之下搞起來的，而我，在這次把矛頭指向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反革命武裝暴亂中打頭陣，完全是為「四人幫」賣命，也是長期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勾結在一起的必然惡果。

我把「四人幫」張、姚等看作是我的恩人，我口頭上也感謝毛主席，但內心深處卻是感謝「四人幫」，感謝他們把我從一個普通的支部書記提拔到這麼重要的崗位上來。我完全辜負了毛主席和黨中央長期來對我進行的教育，我完全辜負了勞動人民對我的哺育和期望，我感到痛心萬分！很久以來，我用「四人幫」的立場來分析形勢，用「四人幫」的眼光來觀察問題，其實質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攻，站在修正主義路線上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最後淪為與人民為敵的極右派。我痛恨「四人幫」，我痛恨我所幹的一切壞事。經過這

次粉碎「四人幫」的偉大的群眾運動的教育，經過這一時期以來黨中央和市委領導同志的親切教育和挽救，經過大會、中會、小會上同志們充滿無產階級義憤的揭發和批判，我才真正的開始清醒起來。我決心「竹筒倒豆子」，把我和「四人幫」的黑關係以及自己內心深處的見不得人的東西統統倒出來。我一定要割斷和「四人幫」長期來盤根錯節的一切聯繫，和他們澈底決裂，劃清界限，轉變立場，痛改前非。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英明果斷地解決了「四人幫」這一大禍害，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也挽救了像我這樣犯有嚴重罪行的人。現在我對「四人幫」罪行的揭發還是初步的，我一定還要繼續揭發；我對自己所犯罪行的交代也是初步的，我願意繼續交代。我積極推行「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文教戰線以及其他戰線，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我一定到群眾中去，接受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我揭發和批判。

我決心要在敬愛的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重新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爭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以上是我的補充揭發、交代，請同志們審查、批判。<sup>30</sup>

##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1976.12.10；中發〔1976〕24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sup>30</sup> 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發。



現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發給你們。請你們立即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傳達，並組織閱讀和討論，務必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罪證材料，以大量的事實和確鑿的證據，證明「四人幫」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千方百計地反黨亂軍，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證明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背叛黨的九大、十大路線，推行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妄圖在國內篡改我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在國際拋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投降帝國主義；證明他們是名副其實的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以他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洞察力，早已看透了「四人幫」的野心，預見到身後他們會鬧事。毛主席對「四人幫」不斷地進行了批評、教育和鬥爭，做到了仁至義盡。但是，「四人幫」毫不悔改，變本加厲地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毛主席採取有力的措施一個一個地打破了他們的陰謀，特別是極其英明地親自選定了華國鋒同志為接班人，有效地預防了「四人幫」的反革命復辟。

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揭露和批判「四人幫」這場政治大革命，將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王張江姚專案組正在編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材料之三，以後將陸續印發給你們。《材料之一》，你們可以翻印，但應注意保密，不許丟失，不許外泄。《材料之一》的蒙、藏、維、哈、朝少數民族文字的翻譯工作，由民族出版機構負責。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

王張江姚專案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目錄】

#### 第一部分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前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罪證

一、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1.在「四人幫」策劃下，遲群、謝靜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反黨講話



2.王洪文、江青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

3.劉真、劉玉庭同志的揭發

4.王洪文親筆寫的承認「一·二四」、「一·二五」大會是背著毛主席召開的檢討提綱

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繼續進行篡黨篡軍的陰謀活動

1.江青、姚文元授意寫文章攻擊周恩來總理

2.張春橋、江青等陰謀整軍隊，「放火」，奪權

三、「四人幫」反黨亂軍，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私自處理黨政軍重大問題

四、在中央準備召開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期間，「四人幫」瘋狂地進行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1.«四人幫»背著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2.王洪文親筆寫的一個沒有送出的檢討稿

3.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寫信給毛主席，公然伸手要官要權，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4.江青再一次向毛主席伸手要官，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

5.江青的反動詩

五、「四人幫」對待毛主席的批評採取反革命兩面派態度

1.王洪文給江青的親筆信

2.張春橋親筆寫的自我表白

3.江青欺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親筆信節錄

六、「四人幫」的合影

**第二部分「四人幫」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黨的九大、十大路線，大肆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罪證**

一、張春橋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二、江青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三、姚文元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四、「四人幫」利用報刊大肆宣揚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惡毒攻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五、「四人幫」扣壓、對抗毛主席的批示

**第三部分「四人幫」瘋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議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總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圖取而代之，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罪證**

一、王洪文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為上臺主持中央工作私自準備的報告稿

二、張春橋親筆寫的陰謀篡黨奪權的自供狀《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感》

三、「四人幫」授意上海市委批判中央領導同志

四、「四人幫」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在批鄧問題上另搞一套

五、「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六、遲群、謝靜宜的反黨講話

七、張鐵生的反黨講話

八、「四人幫」策動上海黃濤、遼寧楊春甫在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上發難，向黨中央猖狂進攻

1.黃濤、楊春甫在會議上的反黨講話

2.「四人幫」幕後操縱會議、向黨進攻的罪證選印

3.上海市工交組李家驩、范崇星同志的揭發

九、「四人幫」私自搜集和整理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1.王洪文擅自調閱的國務院、中央軍委、國防工辦等單位的檔案材料

2.「四人幫」私整的誣陷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黑「材料」

3.「四人幫」利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搜集的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十、「四人幫」利用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為他們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

十一、「四人幫」擬定的全面奪取中央和地方黨政軍大權的狂妄計畫

#### 第四部分 毛主席重病期間和逝世以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罪證

##### 一、「四人幫」對毛主席毫無感情，喪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 1.在毛主席病危時江青外出遊山玩水，恣意取樂
- 2.毛主席剛逝世江青外出遊說放毒，吃喝玩樂
- 3.周金銘同志的揭發
- 4.在毛主席病重期間王洪文釣魚、打鳥取樂
- 5.醫務人員對江青、張春橋迫害毛主席的揭發
- 6.在毛主席病中，江青向毛主席伸手要錢
- 7.在毛主席逝世前五個多小時江青竄到新華印刷廠搞陰謀

##### 二、毛主席剛逝世，「四人幫」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中央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權

##### 三、江青盜騙毛主席的文件

##### 四、江青為實現她當黨中央主席的野心大造輿論

- 1.江青冒充毛主席、黨中央的代表，招搖撞騙，撈取政治資本
- 2.「四人幫」布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新華社等給江青寫「效忠信」
- 3.要江青當黨中央主席的反動信

##### 五、王洪文私拍的準備上臺的「標準像」

##### 六、「四人幫」製造謠言，刮陰風，燒陰火，煽動反對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 1.王洪文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在平谷縣的反黨講話節錄
- 2.江青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在清華大學的反黨講話節錄
- 3.遲群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清華大學的反黨講話節錄
- 4.張鐵生的反黨講話節錄

##### 七、「四人幫」陰謀鎮壓和殺害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

##### 八、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偽造「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為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大造輿論

- 1.王洪文、江青親筆記錄的毛主席指示
- 2.姚文元將他們偽造的「按既定方針辦」塞進九月十六日兩報一刊

## 社論

3. 「四人幫」利用輿論工具大力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4. 光明日報刊登的反黨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九、「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小撮餘黨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對抗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1. 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是「四人幫」長期苦心經營，早就預謀策劃的產物
2. 徐景賢的兩個反革命武裝暴亂手令
3. 「四人幫」突擊發放武器彈藥、調集物資
4. 準備武裝暴亂使用的電臺、通報暗語、呼頻表
5. 反革命武裝暴亂兵力部署圖
6. 朱永嘉關於反革命武裝暴亂的交代

## 第一部分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前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罪證

黨的十大以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加緊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妄圖打倒周恩來總理和一批中央領導同志，實現全面奪取黨政軍領導權、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他們背著毛主席、黨中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又夾進一個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他們背著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去見毛主席，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妄圖利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組織自己的「內閣」，都是為了實現他們的這個野心。

毛主席看穿了「四人幫」的野心，多次嚴肅地批評了他們，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打破了他們的陰謀。

### 一、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打著批林批孔的旗號，進行篡黨篡軍的罪惡活動。他們背著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

日召開了在京軍隊單位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一月二十五日召開了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兩次大會，實質上是「四人幫」為篡黨奪權造輿論的大會。經過「四人幫」的陰謀策劃，王洪文、江青儼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領導人的身分出場，遲群、謝靜宜氣焰囂張地作了煽動性的長篇講話，把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他們提出批走後門，是一個陰謀。參軍、入學走後門這種不正之風，是應當反對的。但是，他們在批林批孔的動員大會上，夾進批走後門這樣一個牽涉幾百萬人的問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其目的就是要轉移批林批孔鬥爭的大方向，借這個題目，整一批同他們有不同意見的黨政軍負責同志。

### 1. 在「四人幫」策劃下，遲群、謝靜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反黨講話

【遲群、謝靜宜在「一·二五」大會上講話錄音記錄稿（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遲群：還有那個走後門問題，批林批孔不要聯繫嗎？那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對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謝靜宜：走後門這與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與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這也是堅持不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這一基本原則的一個重大問題，走後門實際上就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江青、姚文元、遲群、謝靜宜  
在「一·二五」大會上講話的錄音記錄稿和錄音帶

### 2. 王洪文、江青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

王洪文、江青背著毛主席、黨中央，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目的是樹自己，整別人，為他們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毛主席批評他們說：「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注：這是王洪文、江青以個人名義給外交部、中共中央聯絡部、軍委空

軍、國防科委、中國科學院、二零八一部隊防化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等單位寫信、送材料的信件的影印件。

### 3. 劉真、劉玉庭同志的揭發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一個報告上的批示中批評了「一·二五」大會王、張、江、姚搞的那一套，指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毛主席又扣發了「四人幫」精心炮製的準備發到全國去播放的「一·二五」大會的錄音帶。江青等人對毛主席的批評極為不滿。

【下面是江青原來的秘書劉真、劉玉庭同志寫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江青卻夥同王、張、姚借批林批孔，大搞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妄圖整垮周總理和黨政軍一大批老幹部，篡黨奪權。她無恥地說：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線衝鋒陷陣，指揮戰鬥的。她背著毛主席、黨中央，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抓點，煽風點火。她同遲群、謝靜宜精心策劃了「一·二五」大會，江青向遲群、謝靜宜口授了講話內容，江還要姚文元在會上多講一些話。大會前，江青得意忘形地說：「哈哈，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有辦法了！」大會錄音，江和姚連續進行了幾天的修改，迫不及待地要發到全國，後因受到毛主席的尖銳批評被制止，並且扣發了錄音帶，所以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政治局討論毛主席的批示的會議後，江一回到家，就大發雷霆，發洩對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不滿。

劉真 劉玉庭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

### 4. 王洪文親筆寫的承認「一·二四」、「一·二五」大會是背著毛主席召開的檢討提綱

在毛主席多次批評「四人幫」以後，王洪文迫於形勢，不得不作幾

句檢討。這個檢討證明，「一·二四」、「一·二五」大會是在未經政治局討論，未報告毛主席的情況下召開的。這兩次大會本身，就是「四人幫」奪了毛主席的權，對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搞的一次突然襲擊。

【下面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的檢討提綱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我的錯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初期我對批林批孔同貫徹十大的精神對立起來，因此我對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別是關於廣州召開十萬人大會的問題，當時查清楚是對的，但由於我自己不理解，也說過一些錯話，在政治局也進行過爭論。

當主席批示了北大、清華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後，特別是七四年一月廿四、廿五兩次大會。雖然我對於兩次大會的召開未經政治局討論，未報告過主席，關於反對走後門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兩類矛盾的提法，擴大了打擊面等，也同個別同志交換過意見，（我也是贊成反對走後門的）但我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這是我原則性不強，組織觀念不強的表現。

注：此件是從王洪文的住地查出的。

## 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繼續進行篡黨篡軍的陰謀活動

### 1. 江青、姚文元授意寫文章攻擊周恩來總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姚文元召集遲群等人開會，授意他寫文章攻擊周恩來總理。

【下面是遲群親筆記的談話記錄原件（節錄）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七四年六月十四日

江青同志：最近看了一些內部材料，看深入了，因此產生了問題，很少提到現代的儒。我希望告訴我，提到現在的儒。

我們寫的文章，現在的儒應寫文章。推薦給我。除蔣介石有他的總的代表。

落寫老的儒有問題不然只是劉、林？

實

注：此件是從遲群家裡查出的。

## 2.張春橋、江青等陰謀整軍隊，「放火」，奪權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張春橋、江青召集於會泳、陳亞丁等人開會。在會上，江青點名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說什麼「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你們。」陳亞丁回去立即傳達布置，煽風點火。「打倒大軍閥」的標語在北京和全國風行一時，造成軍隊和地方很大的混亂。

【下面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親筆記的

談話記錄原件（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三月五日十時半（東大廳）至四時半

江（即江青）：你們有人來信，批林批孔不怎麼樣，拍戲的勁頭也不大。

今天我鬥膽，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陳××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

江：聽聽八一的吧，八一造孽了，軍伐（閥）管你們。

春橋同志，看來要奪權，軍隊的文化工作還是讓亞丁去管起來，你在軍委提一下。

今天把你找來，把他們兩位找來，準備他們罵娘，他們罵，我也可以罵，動員起群眾來，同他們作鬥爭，說這個那個是林的黑手，其實是他們自己。

江：放火燒荒，你們去三個人，去放火嘛。

江：亞丁的問題，軍委備個案，

張（即張春橋）：那沒問題。

## 三、「四人幫」反黨亂軍，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私自處理黨政軍重大問題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宗派，反黨亂軍，篡奪黨政軍大權。他們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私自處理大量黨政軍重大問題。一九七



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他們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但是，他們並不改悔。

【下面是「四人幫」私自處理黨政軍重大問題的一部分罪證選印】

這封來信是寫給葉劍英同志和江青的，江青不送給主管軍隊工作的葉劍英同志，而批給了王洪文。他們密謀到總後去「點火」，如何做法要待「四人幫」議後定。江青批的原文是：「洪文同志：後勤問題看來得點火，如何做法待議後再定。」

江青  
23/2/1974

這封信是要江青轉給毛主席的，江青不送毛主席、黨中央，也不送主管中央軍委工作的領導同志，而批給王洪文。江青批的原文是：「洪文同志：海軍問題得研究一下，空軍也冷下來了，捂蓋子、反案，不解決不行了。江青23/2/1974」

這封反映總參問題的來信，江青也是不送毛主席、黨中央，不送主管中央軍委工作的領導同志，而批給王洪文、張春橋。他們密謀要「放火」燒總參。江青批的原文是：「洪文、春橋同志：總參是有一些死官僚？還是林彪餘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時是三分之一的時間看群眾來信。如果真像來信者所說那樣，總參問題就太大了，要放火燒荒才好。我看了這封信很氣憤！意見可能偏激。不過只供參考。江青25/2/1974信存洪文同志處。又及」。張春橋批的原文是：「兩種都有。是要燒一燒。春橋」。

這封反映新華社問題的信，姚文元不送毛主席、黨中央。他們密謀在新華社問題上做文章。他們的批語原文如下：「轉送春橋、江青同志一閱，如何處理，待議一下。如有意見請批上。姚文元19/4」。「請春橋同志先閱。並請提意見。同意議一下。江青19/4/1974」。「新華社的問題較複雜，只看這封信，有些問題還看不清楚。我需要想一想。春橋四月二十日」。

毛主席、黨中央從來沒有委託王洪文、江青管體委，他們卻要插手體委的工作。江青在這封信上批：「洪文同志：建議將此信轉莊則棟同志處理。先把物證抓在手上，然後考慮下一步工作。千萬不要打草驚蛇，要沉著、慎重對待。以上意見如同意，請把此信面交他看。原批件存你處。江青19/3/1974如果你太忙，可批回來，我接見小莊也可。由你決定。又及」。王洪文批：「同意江青同志意見。我來落實。洪文19/3」。

這封來信惡毒攻擊三位中央領導同志，王洪文、江青既不報告毛主席、黨中央，又不作妥善處理，而是別有用心地在他們一夥中私傳。王洪文批語的原文是：「請江青同志閱。我意見這封信不印發了，也不傳閱了。是否妥當請江青同志閱示。洪文5/4/1974」。江青批語的原文是：「建議傳春橋、文元同志。妥否？請酌。江青5/4/1974、」。王洪文又批：「同意江青同志意見，請春橋、文元同志閱。」張春橋、姚文元閱後劃了圈。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給張春橋的信，懇求不要停映《年輕的一代》。信中說：如果停映，「必然有人借此機會大攻文化部，大攻上海，甚至攻擊中央領導同志（注：指「四人幫」）」，「對此我們甚為顧慮，我們覺得，這一做法可能會亂了我們自己。」所謂「亂了我們自己」，就是亂了「四人幫」。張春橋趕忙出來壓住陣腳。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張春橋批：「江青同志：因為這幾天，南京一部分人正在攻上海，《年輕一代》的問題，似應緩幾天處理較為合適。妥否，請批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江青批：「尊重春橋同志的意見和上海市委的申述。請春橋同志告文元同志注意。也應告小謝、遲群同志多做群眾工作，左派批可以，不要見報。要以大局為重！」

這個談話記錄密報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同志對「四人幫」的不滿，使他們大為緊張，密謀對策。張春橋批：「存洪文同志處，先不要對任何人講，要研究一下。」姚文元批：「看來相當複雜。」

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南海諸島之一——西沙群島攝影展覽》的報告的批語中，「四人幫」對我們的海軍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我國海

軍的服裝是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毛主席批准的。但是，「四人幫」竟擅自扣發帶著大沿帽的海軍指戰員的照片，並肆意加以誣衊。江青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報告上批：「擬同意發廿五張。第十三、第廿五兩張攝影藝術甚佳，可是士兵頭上戴著國民黨、北洋軍閥、沙俄蘇修的大蓋帽，有失我軍的革命傳統，似不宜登載。妥否？請洪文、春橋、文元同志批示。」王洪文批：「同意江青同志意見」。十月二十日，張春橋批：「這兩張抽掉以後，就沒有海軍艦艇了，可能使海軍同志不高興。是否還是登載為好。或者找兩張沒有大蓋帽的海軍照片，請江青同志酌定。」姚文元批：「同意江青、春橋同志意見。可否換一至二張沒有大蓋帽的。」江青又批：「照春橋、文元同志的意見辦。」

七機部是「四人幫」積極插手的一個單位。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江青在關於七機部的一個材料上批：「請洪文同志酌處。看來需要重型、威力的炮彈才能轟開。然後一個堡壘一個堡壘的攻克。」王洪文批：「暫存這裡。」他們挖空心思要奪七機部的權。

【下面是「四人幫」背著毛主席、黨中央  
私批文件的一部分原件的影印件】

注：以上材料是從「四人幫」住地查出的。

#### 四、在中央準備召開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期間，「四人幫」瘋狂地進行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 1. 四人幫」背著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幫」背著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到湖南長沙去見毛主席，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妄圖利用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組織他們的「內閣」，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下面是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同志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四人幫」早在四屆人大前就陰謀篡黨奪權。四屆人大前夕他們感到形勢不妙，很孤立，便企圖先發制人，把周總理、葉劍英同志等搞

掉，把權奪到手。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駐地，向毛主席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王洪文把周總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險來的。」王別有用心的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家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地（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

張玉鳳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 2. 王洪文親筆寫的一個沒有送出的檢討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王洪文再次到長沙見毛主席，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王洪文為了欺騙毛主席，在長沙寫了這個很不像樣子的檢討稿。但是，就是這樣的檢討，他也還是沒有送給毛主席。

【下面是王洪文在長沙寫的檢討稿（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主席：

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彙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肯（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准在這裡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

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是只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經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志來找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十月十七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因為當時在提名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見，這本來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數同志正確的解決問題，而是只聽了少數同志的意見，錯誤的把提總參謀長人選問題和江青同志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志爭吵聯繫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而就得出結論說可能有別的什麼問題。因此我就提意（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干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

注：此件是從王洪文住地查出的。

### 3. 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寫信給毛主席，公然伸手要官要權，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一九六九年一月，在召開黨的九大的前夕，有人給中央來信，要求選江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兼任中央組織部長。毛主席在這封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在「四人幫」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狀以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親筆批示，告誡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聽毛主席的告誡。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她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作了幾句騙人的檢討，接著就挑撥關係，分裂中央。她在信中公然伸手向毛主席要官要權，說什麼「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

前更甚」。毛主席再一次批評了她，指出：「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下面是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給毛主席的親筆信（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的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的一分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觸目驚心，使我悚然驚悟。

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 4. 江青再一次向毛主席伸手要官，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評後，野心不死，她變換手法，托唐聞生、王海容同志給她帶口信，要王洪文當人大副委員長。毛主席看穿了她的野心，再一次嚴厲批評了她。

【下面是唐聞生、王海容同志寫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廿三日之前），中央醞釀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間，江青把我們兩人叫到釣魚臺十樓，要我們去長沙時向主席轉達她的意見，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後。我們向主席報告後，主席對我們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一九七五年初，四屆人大之後，江青又把我們找去，情緒十分激動地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我們把他的意見報告毛主席。我們報告毛主席說，江青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意見。毛主席聽了以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們

又問：你呢？主席說：「不在她眼裡。」主席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唐聞生 王海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

## 5、江青的反動詩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評，野心沒有得逞。她心懷怨恨，準備把它寫的首反動詩，配上他照的廬山漢陽峰的照片一起，用「琅牙台」的筆名在《中國攝影》上發表。詩中污蔑毛主席是「煙霧」，野心勃勃地自比為江上「奇峰」，企望有朝一日「露崢嶸」，實現她篡黨奪權的狂妄野心。

【下面是江青親筆寫的反動詩和所配的照片的影印件】

江上有奇峰，鎖在煙霧中，  
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  
琅牙台

## 五、「四人幫」對待毛主席的批評採取反革命兩面派態度

毛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批評「四人幫」以後，王張江姚毫不悔改。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反復告誡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四人幫」對待毛主席的批評，採取反革命兩面派態度。表面上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認有一個「四人幫」，實際上勾結得更加緊密，活動得更加隱蔽。下面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親筆寫的承認他們搞「四人幫」的有關材料。

### 1.王洪文給江青的親筆信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

這份材料我已批了個意見，但我想了一下，這種材料發的範圍這樣

廣傳出去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另外這份材料又僅是我們四個人的意見，主席已經多次教育我們了，「不要搞上海幫」並且批評我「不要搞四人幫」我想我們還是謹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覺得發好，也可以。請參考。

洪文

20/2

注：此件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寫的，是從江青的住地查出的。

## 2. 張春橋親筆寫的自我表白

影印件原文

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堅決照辦，並盡可能地作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注：此件是從張春橋住地查出的。

## 3. 江青欺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親筆信節錄

影印件原文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廿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的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

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份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江青

28/6/1975



## 六、「四人幫」的合影



右起：姚文元、江青、張春橋



右起：張春橋、于會泳、劉慶棠、江青、浩亮、姚文元

## 第二部分「四人幫」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黨的九大、十大路線，大肆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罪證

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以後又多次強調要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一九六五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的一次談話中指出：「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項基本原則。十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都重申了這三項基本原則。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又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但是，「四人幫」卻公然反對毛主席關於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的教導，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黨的九大、十大路線，大肆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他們這樣搞的政治目的，是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

下面是「四人幫」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 一、張春橋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張春橋在一九七五年三月親筆寫的一個檔稿中，公然鼓吹「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

【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寫的文件稿（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這些年來，我們學習馬列的狀況，有所進步，但是，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點並沒有根本改變。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發表了講話。在他上臺當總政治部主任後第一次向全軍發表的這個講話中，他就採取狡猾的修正主義手法，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經驗主義作為當前的主要危險，並且提出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

【下面是張春橋講話記錄（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主任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

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你說學習了，但沒有用，主要是領導幹部不是抓得很緊。現在，我們要以主席的指示當作綱，聯繫我們部隊存在的這些問題來學習。這些問題擺在面前，要解決。這些問題解決得好，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但能夠糾正一些錯誤，而且還會有新的前進和進步。如果不好好學習，再往前進，阻力會相當大。

## 二、江青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下面是遲群傳達的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  
給新華印刷廠的電話「指示」記錄稿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我講了春橋同志關於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文章的重點。我還要補充另一個重點，就是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這個問題進城以後就屢次提出過，在全黨沒有提起應有的警惕。現在我們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性，擦亮眼睛，要認識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如不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識別經驗主義的鑒別力，否則就會變修。

【下面是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講話記錄（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5/4/75晨

江青同志：

春橋同志的文章還有一個重點，全國的反映都沒講這個問題，黨的現在的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注：這是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王世敏的記錄，是從兩校「大批判組」查出的。

### 三、姚文元鼓吹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罪證

姚文元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蓄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謠說毛主席十幾年來多次重複了「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個意見。

【下面是有關段落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五九年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毛主席曾經指出，「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因此要認真讀書，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這個意見。

【下面是新華社根據姚文元的要求寫的《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有關反對經驗主義部分）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

### 四、「四人幫」利用報刊大肆宣揚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惡毒攻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下面是一些報刊宣揚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文章、報導和惡毒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文章摘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於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而不肯聽取別人的意見。恰

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

注：這是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發表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文的節錄。

## 五、「四人幫」扣壓、對抗毛主席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批判了「四人幫」的錯誤，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同志提出要傳達毛主席的批示，被王洪文、姚文元扣壓，不准向下傳達。此後，「四人幫」繼續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堅持自己的錯誤，把經驗主義當作當前的主要危險。在一九七六年三月的打招呼會議上，江青公然為他們的錯誤翻案。

【下面是王洪文、姚文元扣壓毛主席批示的罪證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洪文同志：

主席最近對我社關於宣傳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請示報告的批示，對今後宣傳報導關係十分重要，我們準備向正在召開的分社會議（即將結束）和總社有關同志傳達，可考慮只傳達前半部分。是否有當，請予批示。

朱穆之  
五月七日

王洪文五月八日批：「我意見暫不傳達。請文元同志閱示。」

姚文元批：「同意暫不傳達。精神可以在新華社工作中貫徹執行。」

### 第三部分「四人幫」瘋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議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總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圖取而代之，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罪證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後親自提議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代總理。四月七日，毛主席親自提議，任命華國鋒同志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對於毛主席的這一英明決策，「四人幫」極為不滿，瘋狂反對。他們大搞陰謀詭計，在批鄧問題上另搞一套，千方百計地要把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同志搞下臺，要把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黨政軍負責同志搞下臺。

#### 一、王洪文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為上臺主持中央工作私自準備的報告稿

一九七六年一月，中央確定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議。王洪文認為時機已到，他要上臺主持中央工作了。他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下旬，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私自準備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分在打招呼會議上作長篇報告。這個報告，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後印過三稿。毛主席的英明決策，粉碎了王洪文的陰謀。二月三日中央發出任命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代總理的一號文件之後，王洪文不得不偷偷地把他的私貨收藏起來。

【下面是王洪文私自準備上臺主持中央工作的報告稿影印件】

注：這個報告稿是從王洪文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王洪文處的工作人員肖木的揭發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今年年初，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省市書記打招呼會議。野心家、陰謀家王洪文以為篡黨奪權的時機來到，千方百計準備到會上去表演。一天，王把我找去，說要給他搞一個講話稿，到會上去講一講文化大革命，講一講反擊右傾翻案風。並擺出一副

要出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勢得意忘形地說：「我應當有一個講話。」接著口授了一個提綱，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又是右傾翻案風在各方面的表現，口氣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綱先寫個草稿出來。我拖了幾天，王還迫不及待地來催問。後來我搞了個草稿，印了個大樣送給他，他說：春節期間你改一下，再送給我看。就在這時候，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一切，非常及時地做出了由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的英明決策，中央據此發了一號文件，王洪文的野心未能得逞，他那篇講話稿也只好收藏起來。

肖木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 二、張春橋親筆寫的陰謀篡黨奪權的自供狀《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央發出（1976）一號文件，公布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議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對毛主席這個英明決策，「四人幫」恨之入骨，瘋狂反對。在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的同一天，張春橋寫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鐵證。

【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寫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原件的影印件原文。下頁是原件的影印件。】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

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寫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原件的影印件】

注：此件是從張春橋住地查出的。

### 三、「四人幫」授意上海市委批判中央領導同志

「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授意上海市委收集和印發多數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先在上海市委內進行批判，以後又把這些講話印發到基層單位進行批判。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向張春橋寫了一個報告，張春橋作了批示。這是「四人幫」分裂中央的又一鐵證。

【下面是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給張春橋的報告和張春橋批示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春橋同志：

您好！

送上材料九件。這些材料是市委發給市委常委同志在常委會上學習批判右傾翻案風用的。據說這類材料還有幾件，將陸續印發，待後再送。

另告：市委已決定在常委內部學習中，對翻案風總頭子已點名批判。

此致

敬禮

何秀文

1976.2.2

張春橋批：「請告天水同志：學習有點結果，可以發一個比學23號文件更深刻些的電報，名字也可以點，只是要按人民內部矛盾講。」



注：此件是從張春橋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上海市委印發供批判用的中央領導同志的  
講話記錄的一部分原件的影印件】

注：這是從張春橋、姚文元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揭發交代的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紅旗》發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文章，當時我的心裡非常興奮，認為這是大進攻的信號。在這段時間裡，「四人幫」連續對我們下達過幾個指示：第一是關於發材料的問題。馬天水電話請示張春橋後，張說：「不用市委名義發，用下面名義發」。第二是張春橋親自把北大、清華的《大字報選編》批給我們閱，授意上海也要貼大字報，並且指示要上海快編出自己的大字報選。第三是張春橋看到上海有幾個縣、團級幹部對這樣批鄧的搞法思想不通，他在十二月中旬的一期簡報上批道：「對這幾位同志……希望他們能夠取得主動權。」第四是王洪文直接打電話給馬天水，要上海市委把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材料印成單份白頭的一式幾份送他。在他們指示的授意下，我連續幹了一系列分裂黨、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我在縣團級幹部會議上聽到一個大學有一份抄來的鄧小平和幾位副總理接見科學院的講話，就迫不及待地要文教組拿到幾個大學去印，再讓其他單位去要。後來於會泳、遲群也都送來了版本。江西省委塗烈寄來一份江西省委負責同志關於十二省書記會議講話的傳達稿，我如獲至寶，一面下發印刷，一面送王洪文。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材料，都送給遲群、謝靜宜，又向他們要了很多上海沒有的材料，經我和馬天水、王秀珍商量後，再轉手印發下去。我在印發材料的時候完全是搞陰謀，要印發單位不要講是我們給的。我曾經偷偷摸摸地把張春橋送來的清華、北大大字報選撕下來，貼到一個大學裡面去，一方面張貼，一方面又讓這個大學進行散發。這樣，大量的不署名的材料就從上海流傳到全國，完全打亂了毛主席的戰

略部署。我做了「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忠實工具，罪孽十分深重。

徐景賢

一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 四、「四人幫」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在批鄧問題上另搞一套

一九七六年二月上旬到三月上旬，中央召開了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同志在會議上的講話，是政治局通過，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江青卻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私自分別召集參加打招呼會議的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和十二個省、自治區同志開會，另講一套。毛主席發現後，親筆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單獨召集十二省講話。」並要人轉告華國鋒同志，江青的講話是不對的。江青要求把她講話的部分內容印發全國，華國鋒同志請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

【下面是江青在她私自召集的十二省、  
自治區會議上講話記錄（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四月底一直鬥我到六月。

連《創業》也是他授意的，信確確實實是鄧小平轉的。主席的批示無比的英明偉大，主席並沒有看這個電影。《創業》這個題材是我推薦的，拍的粗糙一點，當然也有一些問題。

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對雙方都批了，內容暫時在這兒不說。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講主席批他們的，把對我們的誇大了，特別是對我。

我們的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都說了三七開嘛，我上一次講了，就不重複了。我多想三，受過衝擊的同志，你們多想那個七。三也要一分為二，主席說了。至於那個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錯誤。

全面內戰我根本沒份。

搞突然襲擊，鬥了我四個月。這是怎麼搞的呢？

文元的文章寫了要批判經驗主義，文章寫得很好。

這是個重要事情，我不過是在偶爾的一個場合，而且是在沒有睡覺的情況下，說了批經驗主義，所有的都弄到我的頭上來，……而且把新華社的人也弄上去鬥爭我，我一看那個形勢不對頭，我想我都承擔吧，我還替新華社記者都承擔了。

我說他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叫他漢奸，正確不正確？我們的主席還在保著他啊，我說話是我個人的意見。

（對張平化同志）你對《園丁之歌》那樣積極，造了許多謠，那個信說是你支持的，搞的？（張答：是。）你能夠造主席那麼多謠，而且你安排了給主席看，是不妥當的。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我沒有聽主席說過。

「三十三條」都學了吧？政治局沒學完，就鬥起我來了，抓住一個枝節問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 五、「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面，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污蔑周恩來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和堅持同「四人幫」鬥爭的同志是什麼「大、小艦隊」，瘋狂叫囂：「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江青所謂的「更大的勝仗」，就是要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領導同志統統打下去，「四人幫」篡權復辟。

【下面是江青看了章含之的告密信後  
寫的一段話的原件（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此類事逐漸會揭發出來，我看他們是否高超過林彪？據說，他們的

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過之而無不及。

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

【下面是喬冠華、章含之合謀炮製的告密信原件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志來找我說有件事要瞭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鄧小平帶話給他們說康老想見她們，後來康老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繫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後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瞭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志是叛徒，後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話。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瞭解情況的年輕同志傳這種話。我當時說尤其關於江青同志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志不會把江青同志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後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

意安排吳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 六、遲群、謝靜宜的反黨講話

一九七六年五月，在「四人幫」的策動下，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發表反黨講話，惡毒地影射攻擊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煽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下面是遲群、謝靜宜一九七六年五月  
反黨講話原記錄稿（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歷史上有許多事情有驚人地相似之處，但形式卻變化多端，敵人不會愚蠢到至今還講那個「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也不會說布哈林那樣的話或是林彪的那個最最最，連鄧小平的話如今也不會講了，因為這些都被人們批判過了，聲名狼籍（藉）了。他們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覺的形式出現，讓你上當受騙。他們越是失敗，就越是要瘋狂的反抗，不然，路線鬥爭豈不是到了鄧小平這裡就停止了?!不會的！仍然要有鬥爭，還會有別的機會主義頭子，別的掛帥人物跳出來。

資產階級司令部問題，文章講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那不是一個人，是一個黑班子。

有些人，總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別看他們現在好像挺「左」的，領導這個，領導那個，不交待不檢查總是過不了關的。

【下面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榮泳霖的揭發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今年三月中旬，在一次接待外單位來清華瞭解運動情況的同志時，遲群說過：「跟鄧小平性質一樣的人有一層人，只是職務不同，區別就在這一點上。」

三月二十二日，在一次黨委召開的會議上，遲群正式提出：「跟鄧小平一樣的人有一層人，區別就在於職務不同，他是黨中央副主席。」

六月二十四日，遲群找部分記者談「七·一」報導清華大學的文章問題，遲群提出如下反黨理論：

「每次來了運動，總是先整領導人，當權派，看一看是革命派還是走資派，主要是為了發現走資派，整走資派。一級盯一級，最後盯到中央、政治局，這並不是什麼壞事。」

這些都是「四人幫」反黨集團和反黨分子遲群、謝靜宜為了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矛頭指向黨中央，指向華國鋒同志的反黨輿論。

榮泳霖

76.11.15

## 七、張鐵生的反黨講話

張鐵生是毛遠新一手扶植起來的一個黑「標兵」，是「四人幫」依靠的所謂「先進分子」。在「四人幫」的策劃下，張鐵生在北京、山西等地到處發表反黨講話，肆意醜化我們黨，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輿論。

【下面是張鐵生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在太原  
反黨講話記錄（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我們黨以至我們中國共產黨組織路線上仍然嚴重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必須把黨的組織路線上的資產階級法權，批判的威風掃地，正是因為在我們黨的組織路線上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法權，而且還遠遠沒有受到批判，好多單位甚至都沒有接觸，理論上沒有搞明白，實際上沒有批判，所以，導致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上不清，黨的班子隊伍建設不純。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走資派，就是這些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派的一個變種，也可以說這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又是在我們國內，在我們黨內出修正主義的一個大禍根。

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領導幹部，開了一個打招呼（招呼，下同）會，我活了二十幾年，這個打招呼會還很少聽到，什麼叫打招呼會呢？現在據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這個打招呼會就是給那些還在走的走資派打招呼。給那些還在繼續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幹共產主義的這樣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給他們下場毛毛雨，打個予（預）防針，應當清醒清醒嘛，不要錯誤地估計形勢，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沒皮沒臉。

【下面是江青支援張鐵生的講話記錄（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在一次會上，我支持了張鐵生。我當時不知道是遠新他們抓的。

他帶了四十個人去學大寨學習，路過北京，要到清華看大字報，北京市不安排。他找了謝靜宜、遲群同志，她們就安排了。他到了太原，請他講話，他點了火，他才是真正的又紅又專。

注：這是江青在一九七六年二月打招呼會議四川小組會議上的講話記錄，修改處是江青的親筆。

### 八、「四人幫」策動上海黃濤、遼寧楊春甫在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上發難，向黨中央猖狂進攻

一九七六年七月，中央召開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四人幫」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這次會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在會前準備了攻擊黨中央的材料，作了部署。他們在會議期間策動上海市委常委黃濤、遼寧省委書記楊春甫在會上發難，向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猖狂進攻。他們親自出馬，祕密串聯，為黃、楊向黨進攻出謀劃策。他們明明知道鄧小平沒有參加一九七五年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卻蓄意轉移目標，指使黃、楊二人污蔑這次務虛會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是資本主義氾濫」，妄圖打倒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自己上臺。

## 1. 黃濤、楊春甫在會議上的反黨講話

【下面是黃濤在會議上的反黨講話簡報原件（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當前，廣大幹部和群眾認真學，深入批，同鄧小平對著幹。但是，他們擔心上邊有些人「批歸批，幹歸幹，還是照老樣子幹」。

去年的經濟工作「務虛會」，在鄧小平的指揮棒下，究竟務的是什麼「虛」？務的是哪個階級的「虛」？搞的是那個階級的政治？名曰規劃國民經濟，實為策劃右傾翻案。有的同志，同鄧小平那一套貨色，豈止是共鳴？分明是合唱了！經濟領域裡右傾翻案風的風源，蓋出於此吧？！

【下面是楊春甫在會議上的反黨講話簡報原件（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國家機關的領導權，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啊？我看不是。

務虛會是資本主義氾濫，計畫會議是掩護鄧小平退卻。

國務院的務虛會，務了什麼虛？在鄧小平路線下，能務出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虛嗎？我認為，是資本主義氾濫。這麼大的一件事情，總得對大家有個交代吧！

楊春甫同志還提出一個質問：為什麼讓鄧小平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念悼詞？我們不能不懷疑，是不是受鄧小平影響的人搞的？

## 2. 「四人幫」幕後操縱會議、向黨進攻的罪證選印

【下面是黃濤給張春橋的信的原件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春橋同志：

二十五日晚，谷牧同志傳達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現將傳達稿送上，請閱。

會議約在月底月初結束，在回上海前，很希望能見到您！

順此祝



好！

黃濤

七月二十七日

注：此件是從張春橋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黃濤給王洪文的信的原件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洪文同志：

二十五日晚，谷牧同志傳達了中央領導指示，現將傳達稿送上，請閱。

關於我們簡報中提到的「務虛會」問題，是乾脆刪去不講了，還是在提法上（如風源）作修改？望示。

另將有關外貿的兩件材料一併送上，事實又作了核對。

致

革命敬禮！

黃濤

七月二十七日

注：此件是從王洪文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黃濤給姚文元的信的原件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文元同志：

二十五號晚，谷牧同志傳達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現將傳達稿送上，請閱。

我們的簡報，準備作些修改後送交大會秘書處印發。

有何指示，請告。

特此祝  
好！

黃濤  
七月二十七日

注：此件是從姚文元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楊春甫給毛遠新的信（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遠新同志：

今天下午兩點十五分到三點十五分，洪文同志來賓館將我找到上海市黃濤同志的房間，瞭解會議的情況。在我們彙報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話，現整理報告如下，供參閱。

洪文同志說：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鬥，不鬥就不能勝利，在這可以鬥，回去還可以鬥。實踐證明，不鬥不行。不鬥，修正主義老爺就拆你的台。

上邊出了問題，不同於一個工廠、一個基層單位，一出問題就是全國性的。

楊春甫  
七月廿日晚

【下面是黃濤的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今年七月去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的前一天晚上，馬天水找我去，問我：「都準備好了吧？」我說：「做了一些準備。」

在會議期間，王洪文來京西賓館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說了開會的

情況，我說：「谷牧同志的開場講話，自我批評輕描淡寫，是一篇官樣文章，幾個部的發言也很不像樣。」王說：「好不了，一批鄧，就批到他們頭上去了。」還說：「洋奴哲學，崇洋迷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說：「大批判再鬧它兩三天，就要轉入討論下半年生產計畫調整。」王說：「可以考慮多搞幾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這個會開好。」王洪文第三次來時，把上海小組和遼寧小組的人找在一起，王說：「遼寧小組的發言看到了，批得很好，問題提的很尖銳，批判就要直插，不要不痛不癢的，怕什麼！」又說：「國務院務虛會的問題很值得研究，看務的什麼虛，『二十條』、『十八條』，同一個時間各部門都搞這種東西，搞『管、卡、壓』。這些問題你們可以同楊春圃（甫）再研究一下。」我說：「刮右傾翻案風同國務院務虛會有很大關係，批條條專政這個問題要點出來。」王洪文說：「你們要點就點，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楊春圃（甫）等人串連在一起，追「風源」，批「鄧小平為頭子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把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王洪文第四次來時，我對他說：「當我正發言時，谷牧同志也進來參加聽了，是面對面的，我在會上發言的簡報看到了嗎？」王說：「已經送上來了。」我問他：「怎麼樣，有什麼意見？」王笑笑說：「我不發表意見。」王的這個態度我是心領神會的意識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讚賞我的那個反黨的發言的。

在政治局聽取會議情況彙報後的第二天，王洪文親自打電話來說：「那個發言要印發，但是有兩處要修改。」後來我打電話問他：「怎麼改法？」王說：「一處是關於「風源」問題，我同張春橋商量過了，那樣提法也不大確切，關於務虛會那一段還是都拉掉，這個問題還是讓別人去講，讓遼寧他們去講。關於『以鄧小平為頭子的少數人』的提法也要改，這樣打擊面太大歐，不利。」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會議後急忙對我的那個發言打的兩個補漏洞的補釘。但是，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還是說：「有意見讓人家講嘛，要允許人家講話嘛！」王洪文在會議結束時，中央領導人接見會議代表時也說：「有的同志在這次會上開了一炮，開的好！」他們的講話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個發

言的。

黃濤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 3. 上海市工交組李家驩、范崇星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黃濤在今年七月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上，在「四人邦（幫）」的指揮下，猖狂進行反黨分裂活動。在計畫工作座談會召開前夕，黃濤與王洪文通了電話。通話內容，黃濤透露了幾點：（1）王洪文告訴他，主席關於社教批示下來後，那些大官們這幾天是惶惶然。（2）王洪文告訴他，政治局最近開會時，談到外貿問題，要黃濤搜集這方面的材料。

（3）黃濤還製造謠言，對王洪文說：「現在有些新動向，值得注意，最近國家計委通知我們，根據谷牧的意見，為了抓大事，生產業務以後少管，調度室撤銷，煤炭調運的事他們都不管了。」王洪文回答黃說：「你搞個材料來，我來批。」

在準備會議材料的過程中，公然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他要工交組各組搞材料，準備進攻的炮彈，同時指示召集一部分局、公司的同志開了幾個會，搜集國家計委和各部的材料，最後形成了二十份材料，涉及國家計委、建委、外貿部、交通部等十二個部委。

黃濤還暴露了他們的反革命策略，說：根據馬天水的意見，「這次放炮，不能萬炮齊發，還要做工作。」「有些部的政治傾向還可以，要爭取他們，矛頭主要對國家計委，還有外貿部、交通部等。」黃濤在去京開會臨走前，又專門到馬天水那裡去商量策劃過一次。黃濤在七月十三日下午登臺表演，他明明知道鄧小平並未參加去年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但他在發言中，編造了一個所謂右傾翻案風的『風源』是出自國務院「務虛會」的大謊言，惡毒攻擊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同志。

會議期間，黃濤和遼寧楊春甫等人多次聯繫，南北呼應，密謀策劃進攻。他到處串聯，煽風點火，策動別人向黨進攻。

黃濤的惡毒發言，被國鋒同志等中央領導同志識破了，黃濤內心驚恐，馬上找王洪文、張春橋。王洪文打電話給黃濤，說簡報還是要出的，「風源」等兩段要「全部去掉」，並說：「這個意見是我和春橋商定過的。」可見黃濤在計畫工作座談會上的進攻和退卻都是和「四人幫（幫）」共同策劃的，是秉承「四人幫（幫）」旨意幹的。

會後，黃濤還攻擊這次計畫工作座談會是「走資派還在走的會議」。還對整理國鋒同志重要講話記錄的同志說：「整理記錄幹什麼，這裡面有文章。」明目張膽地把矛頭直指敬愛的華國鋒同志。

上海市工交組李家驩範崇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

## 九、「四人幫」私自搜集和整理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四人幫」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私立材料組，並利用新華社、人民日報、上海市委寫作組、兩校「大批判組」等管道，私自搜集和整理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大量黑「材料」。王洪文擅自調閱國務院、中央軍委、國防工辦等單位從一九七五年六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部分文件和會議簡報，目的不是為了批鄧，而是為了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 1. 王洪文擅自調閱的國務院、中央軍委、國防工辦等單位的檔案材料

【下面是這批檔案材料原件的影印件】

注：這是從王洪文住地查出的。

### 2. 「四人幫」私整的誣陷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黑「材料」

【下面是「四人幫」私整的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的一部分原件的影印件】

【下面是「四人幫」私整的誣陷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黑「材料」的一部分原件的影印件】

注：這是從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住地以及遲群、謝靜宜處查出的。

【下面是清華大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吳敏生的揭發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從批鄧以來，清華收到全國各省市幾千封來信。遲群幾次說：「凡是各地送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信件，不要急於轉中辦。我已經和中央首長（指「四人幫」）打了招呼，他們也同意。你們摘錄後，連同原件一起送我，原信由我和謝靜宜轉。」遲群還說：「要注意收集『大傢伙』的材料。」先後收集過中央政治局兩位領導同志以及雲南、福建、河南、河北、山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政委等一大批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直送「四人幫」。

六月中旬，遲群下令出《群眾來信來訪摘報》。九月中旬，遲群又下令「精選」出綜合材料，比較系統地整了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黑材料」。遲群還把新華社編的「國內動態清樣」交給人摘錄補充，並於十月三日深夜催促要「加快整理」。十月四日，遲群急急忙忙地要走這份材料。

吳敏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3. 「四人幫」利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搜集的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四人幫」利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肆無忌憚地搜集誣陷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進行反黨反中央的特務情報活動，為他們篡黨奪權服務。

【下面是新華社某些人搜集的攻擊周總理  
和華總理的黑「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新華社長沙六月十二日訊）（內參）

最近記者去湘潭江南機器廠採訪，這個廠的工人歐陽凱主動向記者談對運動的看法。他說了以下幾點（主要的）：

（一）我不怕坐牢，我聲明，我是個反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外單位搞調查時，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反中央領導同志的傳單，上面就是沒有提周恩來，這不是說明他有問題嗎。毛主席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就是反的他。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反的他。鄧小平上臺只有幾個月嘛。

（二）湖南的問題，光揪張平化有什麼意思，張是個第二書記，湖南還有第一書記。可以斷定，華國鋒是周恩來的人。

（三）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場運動，還只是才開始，以後的事情多得很，早著哩。現在中央的領導權算解決了，中央各部門的問題，文化部、衛生部解決了，你們新華社解決了，人民日報只解決了一半，其他還沒有解決，還有各省的問題。

歐陽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廠裡的「湘江風雷」派頭頭。他在同記者談話前兩天，（約在五月十六日前後）曾到長沙，會見了省裡一些原湘派的頭頭，如葉衛東、李敬林等人，他說，李敬林曾向他談了對運動的看法。（完）

注：此件是從姚文元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人民日報社安子貞、何黃彪同志寫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人民日報在「四人幫」的控制和指揮下，到處搜集篡黨奪權的黑材料，企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負責同志。情況組編有手抄本情況，直送姚文元；《情況彙編清樣》和《特刊》必須經姚文元修改定稿後才印發政治局同志。凡為「四人幫」搜集的重要情報，都由魯瑛、劉治平布置情況組及他們認為可靠的人去完成。有的人與肖木多次外出搞祕密調查，受到王洪文的賞識。今年二月以來，魯瑛、劉治平等派出記者和通訊員六十餘人，到湖南、江西、福建等十多個省、各大軍區以及外貿

部、交通部，以「調查研究」為名，搜集情報。他們整華國鋒主席的材料，整葉副主席的材料，整先念同志、登奎同志、東興同志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他們還長期以來從各方面搜集供「四人幫」誣陷周總理的黑材料。今年以來，在一些《情況彙編清樣》上刊登攻擊一些地方和中央部委主要負責同志的材料。

人民日報社安子貞何黃彪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 十、「四人幫」利用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為他們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

「四人幫」利用手中控制的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炮製大量反黨文章，惡毒地影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突出地宣揚他們自己，為他們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

【下面是「四人幫」直接控制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

炮製黑文章的罪證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送江青同志閱。

文元同志：

中央領導同志布置的幾篇文章需進一步加工修改：

評林彪「小國師大國」的賣國哲學；

必須批判「因循守舊」；

評孔丘的「仁」。

以上只是初步方案，當否，請閱示。

此致

敬禮

小謝、遲群  
一九七五年一月卅日



另，此外，還議了一些題目，後考慮先報這幾個。

注：此件是從遲群處查出的。

【下面是兩校「大批判組」王世敏的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是四人幫（幫）通過遲群、謝靜宜直接控制的反黨奪權的輿論工具。三年來，共發表了約168篇文章。其中，由江青點題的有《孔丘其人》、《批因循守舊》等。所謂《批因循守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由江青授意寫成的有《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法家人物介紹·呂後》等，名為吹捧武則天、呂後，實為江青篡黨奪權大造輿論。《光明日報》十月四日拋出的《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矛頭指向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王世敏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 十一、「四人幫」擬定的全面奪取中央和地方黨政軍大權的狂妄計畫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人幫」迫不及待地要進一步篡奪黨權政權軍權，他們擬定了一個以王洪文名義提出的全面奪黨政軍權的計畫，只是由於他們認為時機不成熟，沒有拿出來。

【下面是「四人幫」全面奪權計畫原文（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二）積極創造條件，區別不同情況，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結合。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較好的，只需在鬥爭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組織問題作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去搞。一種是需要作些充實、調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種是一、二、三把手都問題較多，群眾已不大那麼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幫一手的。

（三）國務院各部的問題，這次鐵道部讓萬里同志不管事，專心檢查自己問題，又調了兩個青年幹部去當核心小組副組長，運動有了生氣，看

來是得人心的。這個經驗需要總結，並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積極創造條件，有領導地逐步參照解決。這些部自建立以來，大多沒有好好觸動過。現在的情況是下面變了，上面不變或有變也不大，矛盾越來越尖銳。趁這個機會變一下，廣大基層幹部、群眾是高興的。

（四）軍隊問題，基層是好的，主要問題在上面。比較起來，總參的事情更緊迫些。

注：此件是從王洪文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王洪文處的工作人員肖木的揭發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今年六七月間，反黨分子王洪文竟然喪心病狂地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重的機會，給毛主席寫信，妄圖破壞毛主席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略部署。他對我說，毛主席最近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我看國內問題還是要批鄧。全國運動有幾種情況，一種搞得好的，一種比較一般，還有一種是問題比較多的。這後面兩種，占全國多數，都需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特別是第三種不解決不行。國務院有些部，軍委有些部門，也是這樣。解決的辦法要像有的部已經做的那樣把主要領導幹部換掉。他要我根據他的這些話整理一封給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給他，他準備修改、重抄，並說有機會要送毛主席看。很明顯，王的這封黑信的目的，就是借落實毛主席指示為名，妄圖打倒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實行全面奪權。

肖木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四部分 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罪證**

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重，「四人幫」以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時機已到，他們喪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在毛主席逝世以後，「四人

幫」加緊祕密串聯，陰謀策劃。他們偽造毛主席指示，提出蠱惑人心的口號，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華主席、黨中央覺察了他們的反革命陰謀。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央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小撮餘黨，四出刺探情報，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對抗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四人幫」長期苦心經營、早就預謀策劃的產物。由於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上海廣大工人階級、共產黨員、駐滬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民兵和人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四人幫」預謀的這場反革命武裝暴亂，頃刻瓦解，澈底失敗。

### 一、「四人幫」對毛主席毫無感情，喪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 1.在毛主席病危時江青外出遊山玩水，恣意取樂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在天津喜笑顏開。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毛主席病情加重，但江青卻竄到大寨去遊山玩水。九月二日至五日，江青在大寨騎馬、逗鹿、玩兔。

#### 2.毛主席剛逝世江青外出遊說放毒，吃喝玩樂

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清華大學大興農村分校。

江青十月三日在景山公園。

#### 3.周金銘同志的揭發

【下面是周金銘同志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江青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懷有刻骨的仇恨。九月五日晚上九點半，中央通知她由大寨火速回京。我們工作人員一聽這個消息，都知道一定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病情惡化了，個個心裡怦怦直跳，猶如天快塌下來似的。我們立即把江青從睡夢中叫醒，當向她報告中央電話通知時，我們的聲音都發抖了，然而反黨分子江青卻感到若無其事。她躺在

床上慢悠悠地說：「沒有事，不要慌。」她起床後，我們緊張地收拾行李，她卻高高興興、又說又笑地打了兩個小時的撲克。從陽泉乘火車到石家莊行了兩個小時，她除了吃飯時間就是打撲克。從石家莊改乘飛機到北京，僅僅只有二十多分鐘，她也不肯放過，繼續打撲克，一直打到北京。一路上她談笑風生。反黨分子江青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病危幸災樂禍，真是反動透頂！

周金銘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注：周金銘同志是江青原來的警衛員。

#### 4. 在毛主席病重期間王洪文釣魚、打鳥取樂

【下面是王愛清同志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王洪文對我們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一點感情都沒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間，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護，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釣魚杆拿到毛主席住地開始釣魚。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值班時早晨五點鐘就打電話，叫工作人員給北海公園聯繫，要去北海公園釣魚，聯繫後，下午三點左右就去了，連釣了兩次。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鳥，把汽步槍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處打鳥。在車上說，這個地方那麼多鳥，沒有人打，我來打。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時，又要游泳，馬上從上海要來高級游泳褲，遊了好幾次。有一次他在車上說，本來這裡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溫到三十度，他們不肯燒。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期間經常看電影，有時他親自打電話給文化部的劉慶棠要電影片。有一次他在車上說，今天又看了個《基督山恩仇記》，這個片子很有意思。還說抽時間把這本書和《紅與黑》這本書

看一下。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繼續在值班時釣魚。

我們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開了追悼大會不幾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電影，又到八一靶場去打靶。

以上情況，我們警衛戰士，看在眼裡，恨在心裡。

王愛清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注：王愛清同志是王洪文原來的警衛員。

## 5. 醫務人員對江青、張春橋迫害毛主席的揭發

【下面是醫務人員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我們憤怒揭發「四人幫」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擾破壞。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時江一再干擾說：「主席沒有病，醫護人員謊報病情」，還說：「醫務人員都是反革命特務」，氣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療，延誤治療廿多天，造成對主席健康嚴重損害。

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給主席寫報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報告，硬要主席同意。

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們心情很沉重，而江青與醫務人員每人握手，並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我們聽了很氣憤。主席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老給主席又擦背，又活動四肢，抹爽身粉。當日晚，江青進來就找文件，找不到就發脾氣。我們主張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盡送一般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當時主席床頭燈光已很強，主席怕熱，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燈。江離開後我們即將燈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醫護人員堅決說不能翻，翻了危險。江硬給主席翻身，結果翻身後主席顏面青紫，血壓上升，江看情況不好，揚長而去。

八日晚我們在搶救過程中，大家分頭緊張工作，江青進來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們沒有聽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江青拉毛主席醫療組的醫生給她查體。她還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電圖示波監護器拿去她自己用，我們沒有同意。去天津小靳莊時，不顧主席病重，還要醫療組一些醫生陪她去，我們堅決不同意才作罷。

主席生前江青對醫護人員橫加指責，經常謾罵「醫生是資產階級的，護士是修正主義的」，干擾治療。主席逝世之後，我們都很悲痛，江青卻說：「你們不要愁眉苦臉啦，看我現在就很高興。」

主席病重，張春橋值班守護時，很少進主席的房門，也很少過問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時，主席病情突然惡化，我們到處找不到他。一次醫療組在彙報主席病情時，提出要查血、打針，張春橋聲色俱厲地說：「不打針不查血，你們給治。」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後來我們查了血打了針。

醫療組

李志綏 陶壽淇 吳潔陶 桓樂

周光裕 方圻 王新德 翟樹職

潘屏南 朱水壽 薛世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

## 6.在毛主席病中，江青向毛主席伸手要錢

【下面是張玉鳳同志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來見主席，提出要一筆錢，江青走後，主席對我說：「她們看我不行了，為自己準備後路。」然後主席流著淚，從自己過去的稿費中批了三萬元錢，讓我去辦。我把錢給江青送去。她看到錢馬上對我說：「小張，這些錢對我來說是不夠的。我跟你不一樣，將來我是準備殺頭、坐牢的，這個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養著，這

個難些。」這筆錢主席批給江青已有三年。在這三年裡江青變化無常，經常藉著錢的事來干擾主席，一會說「讓小張替我保管存單。」一會又「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過些天又讓我管，來來去去，江青無數次的打擾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兩天她還在鬧，江青說：「我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些錢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給我，那就讓小張代管。」這筆錢本來就是江青在主席患病期間要的。事過幾年她又改口，企圖把這個資產階級法權的罪名加到主席頭上，用心多麼惡毒。

張玉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

【下面是江青向毛主席伸手要錢的親筆信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玉鳳同志：

那筆錢能否取出八千元？因為如從一九六八年算起，我應歸還八千元，從一九六九年算起我應歸還七千元。當然，可以不歸還，不過還了心安理得。這七、八千元，主要用於照像，購置燈光裝制，燈光我送給新華社了，沒有算錢。是黨和國家財產，不應算錢，不能慷國家之慷（慨）。如不取，請在主席暇時，報主席，再請主席給八千錢。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 7. 在毛主席逝世前五個多小時江青竄到新華印刷廠搞陰謀

江青從大寨回到北京，一面迫害毛主席，一面加緊進行陰謀活動。就在毛主席逝世前幾小時，她還竄到新華印刷廠搞陰謀。她做賊心虛，疑神疑鬼，唯恐陰謀暴露，竟肆意污蔑黨中央在她身邊派了「特務」，搞她的「情報」。九月一日，她要遲群、謝靜宜為她調查「特務」。九月八日下午六時許，她竟不顧毛主席病危，跑到新華印刷廠去查所謂

「特務」去了。

【下面是江青污蔑黨中央的罪證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江青批：小謝、遲群同志：請將新華印刷廠的特務調查清楚告我，不要打草驚蛇！

退江青1/9/1976

來信摘要節錄：他們還把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委派為市委的聯絡員。他們為了探取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公然委派了對新華印刷廠的聯絡員。  
注：此件是從遲群處查出的。

【下面是新華印刷廠連秀榮等九同志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下午六點多，就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前幾個小時，江青事先沒有通知，突然來廠。江青一來一直奔防震棚，當時棚內沒人等候，連秀榮同志趕來時，江對連發脾氣。江說：我就請了一個小時假。你知道我從哪來嗎？我從大寨來。當遲群、謝靜宜來了以後，江急著問遲群：「你給我帶來材料沒有？」江青拿過材料批劃。江與遲、謝三人低語一陣子。後來，江突然問：「小謝，我問你的問題，你為什麼不回答，你知道嗎？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派來高級特務，監視我，搞我的情報。」又說：「工人同志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誰是特務，站出來，自首，保護自首的。」又問遲、謝說：「你要給我弄清楚！」遲群說：「你別急，會弄清楚的。」江又說：「我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

新華印刷廠

連秀榮 韓致仁 李同彥  
趙家玉 伊淑珍 薑信之  
張世忠 葛運通 羅孟琦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



## 二、毛主席剛逝世，「四人幫」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中央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權

一九六九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剛逝世，「四人幫」就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中央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權。他們盜用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通知全國各地，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妄圖切斷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聯繫，由他們發號施令，指揮全國。這是在毛主席逝世後，「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第一著。

【王洪文原來的工作人員米士奇同志的揭發交代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九月十日晚七點多鐘，反黨分子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告訴我，王洪文讓廖帶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訴我，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廖還說，王洪文說了，有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弔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個電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按反黨分子王洪文的黑「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電話。

米士奇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接米士奇的電話記錄原件選印

陝西省委電話記錄原件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點多。

中辦：米思（士）奇電話：

中央領導同志指示：

主席喪期發生重大問題及時報告。有重要問題不好解決及時請示。  
找米士奇同志聯繫。

李瑞山接

### 三、江青盜騙毛主席的文件

從毛主席病危的時候起，江青就想方設法要把毛主席存的文件、材料搞到手，受到華主席、黨中央的堅決制止。毛主席存的文件、材料，包含大量黨和國家最核心的機密、黨的最寶貴的歷史文獻毛主席手稿等。這些文件、材料，理應由黨中央保管。九月二十一日，黨中央封存了毛主席存的文件、材料。江青對黨中央採取的這一正確措施，極為不滿，大哭大鬧大罵，放肆地攻擊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她還趁文件、材料尚未封存之機，盜騙了毛主席的文件，並加以篡改，企圖陷害一些軍隊的負責同志。

【下面是江青盜騙並經她篡改的毛主席文件的影印件】

【下面是張玉鳳同志的揭發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江青陰謀盜騙毛主席手稿和文件。主席逝世後，江青一反常態，每天到毛主席住處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跡。我覺得不妥，這不合組織手續。主席逝世後中央還沒有決定文件怎麼辦，我不好隨便給，沒給她，我推說原稿不在我這。江青、毛遠新看在我這弄不到文件，就給我按上個「偷文件」的罪名，要對我採取「緊急措施」，進行迫害。以達到他們盜騙文件的目的地（的）。

追悼會後，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緊。我很為難。江青走後，我立即通過電話報告了汪東興同志。請示怎麼辦，並請他來。東興同志來後，我報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遠新以要看一下的名義騙取了毛主席和楊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談話記錄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這二份文件。並向我傳達了政治局已經研究，準備封存文件。

張玉鳳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日

#### 四、江青為實現她當黨中央主席的野心大造輿論

##### 1. 江青冒充毛主席、黨中央的代表，招搖撞騙，撈取政治資本

毛主席早已指出：「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江青根本不聽毛主席的話，仍然冒充毛主席、黨中央的代表，到處招搖撞騙。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她又竄到北京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活動。她授意遲群通過新華社記者要北京日報派記者採訪，要發表一個江青《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姚文元示意，這個消息他不批發，要北京市委批發；人民日報不發表，要北京日報發表。這是「四人幫」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北京市委認為，這樣的消息，不經中央批准，地方報紙不能發表。經請示華國鋒同志後，這個所謂江青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沒有發表。

【下面是被中央制止沒有發表的消息大樣原件的影印件】

##### 2. 「四人幫」布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新華社等給江青寫「效忠信」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遲群、謝靜宜盜用清華、北大兩校全體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的名義，向江青寫了「效忠信」。九月十七日，遲群又在清華講：「光是校黨委寫封信還不夠，可以給下邊打招呼，讓分黨委，還有團委、學生會這樣的群眾組織寫一些信。」十月四日，遲群又在清華布置各系發動群眾寫信。九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布置新華社給江青寫「效忠信」。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

呈上兩校全體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給您的信。

我們也一定保持清醒頭腦，狠狠批鄧，準備應付各種可能遇到的複雜情況。一定為主席爭光、爭氣！請江青同志放心。

小謝、遲群

12/9/1976

注：此件是從江青住地查出的。

### 影印件原文

九月二十三日夜

文元同志告：

江青同志的信對新華社的同志們是很大的鼓午（舞）。你們給江青同志寫一信，表示你們堅決按主席指示辦。信寫好後經我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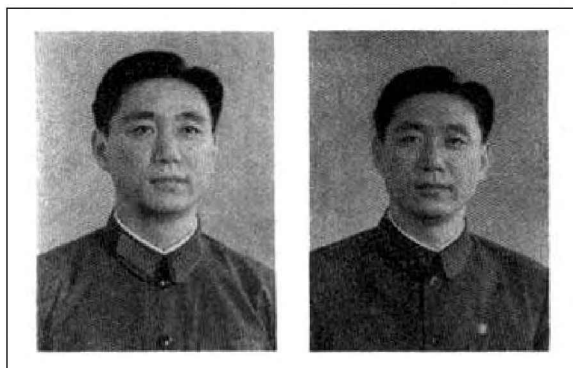
【下面是一部分「效忠信」的原件影印件】

### 3、要江青當黨中央主席的反動信

### 五、王洪文私拍的準備上臺的「標準像」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私拍「標準像」，為他上臺做準備。

【下面是王洪文「標準像」選印】



## 六、「四人幫」製造謠言，刮陰風，燒陰火，煽動反對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四人幫」是一個專門刮陰風，燒陰火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密謀策劃，製造謠言，統一口徑，到處散布，煽動反對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 1.王洪文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在平谷縣的反黨講話節錄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打倒！別人搞修正主義，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義，你們也來造反。最好是不出現修正主義，但這只是個人願望，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建國以來，中國就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後還可能出什麼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不只是鄧小平搞修正主義，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睜的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

### 2.江青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在清華大學的反黨講話節錄

影印件原文

我在主席逝世後的第一次中央會上，就控訴了鄧小平，要開除他的黨籍，沒有開除，要以觀後效，還會有人要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們年輕人宣誓，一定要鍛鍊好身體，和他們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還長著呢。形勢是好的，你們看形勢好不好？但是要警惕。

### 3.遲群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清華大學的反黨講話節錄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大家要堅定、鎮靜，化悲痛為力量，特別要警惕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警惕還在走的走資派的破壞和搗亂。要求民兵樹立高度的戰備觀念，一旦有了什麼情況，能夠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麼

地方就到什麼地方。我們要把情況想得複雜一些，鬥爭想得激烈一些，千萬不要書生氣十足。

#### 4. 張鐵生的反黨講話節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九月十日，張鐵生在遼寧省團委和省知識青年辦公室作了反黨講話。這個講話的記錄，後來送給了毛遠新。

【下面是張鐵生反黨講話記錄（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張鐵生：

現在，我們的國家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父親去世了，家裡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著擔心就在這裡。

華現在是第一號人物了，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麼？我給黨中央和人大寫過信，沒想到主席會去世這麼早。他在計委會上的講話，與洪文的講話就不一樣，不能說絕然不同，但起碼是有差距。

總之一句話，目前，我對國家的領導人，對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很擔心，尤其是對軍隊充滿了擔心。

我真擔心，這樣一個思想路線是右的，滿腦子舊的東西，大搞唯生產力論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這樣的人在支持擁護他。

華的講話對右的人是個鼓舞。有的省有人來信說，他們全省傳達，而不是內部傳達，反響很大，二老爺很猖狂。他可是國家的一把手了。

#### 七、「四人幫」陰謀鎮壓和殺害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張春橋在他親筆寫的提綱中赤裸裸地提出「鎮反」、「殺人」的計畫。姚文元也要殺人，他寫的日記正是張春橋提綱的最好的注腳。他們果真是鎮壓那些反對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嗎？不是！他們磨刀霍霍，是要向反對「四人幫」的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下手。他們要靠殺人來維持他們的法西斯統治。他們一旦上臺，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這是何等的令人驚心動魄啊！

【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寫的反動提綱之一的原件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批鄧三株大毒草。對鄧的鬥爭，報告。

什麼叫轉好彎子？

鎮反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

編書1.著作集，2.專集（論教育革命）

3.發表文章，4.委員會專人

經濟。

紀念。陵，故居，

紀要

注：此件是從張春橋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寫的反動提綱之二的原件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歷史與現實。為今。

時代。

革命與專政。怎樣革、怎樣鞏固政權，

殺人。

注：此件是從張春橋住地查出的。

【下面是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日記（節錄）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3/4

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個方面、部分）卻總是不澈底。為什麼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究竟不是繡花。

注：此件是從姚文元住地查出的。

## 八、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偽造「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為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大造輿論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毛主席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三條指示，一是「慢慢來，不要招急」，二是「照過去方針辦」，三是「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向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並將毛主席的這個親筆指示給姚文元看過，但是，「四人幫」卻蓄意加以篡改。

### 1. 王洪文、江青親筆記錄的毛主席指示

【下面是華國鋒同志向政治局傳達時  
王洪文、江青的親筆記錄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毛主席指示，30/4/1976

照過去的方針辦，慢慢來不要著急。

注：這是王洪文的親筆記錄，是從王洪文住地查出的。

影印件原文

主席：照過去方針辦

注：這是江青的親筆記錄，是從江青住地查出的。

### 2. 姚文元將他們偽造的「按既定方針辦」塞進九月十六日兩報一刊社論

在中央討論《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華國鋒同志致的悼詞的時候，王、張、江、姚參加了討論，他們從來沒有提出過要在這兩個文件中寫上「按既定方針辦」。但是，他們卻有計劃、有預謀地把這個他們偽造出來的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塞進九月十六日兩報一刊社論中發表，並且在宣傳上排斥上述的中央兩個正式文件，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當時的宣傳中心。

【下面是姚文元親筆修改的社論清樣的影印件】



### 3. 「四人幫」利用輿論工具大力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四人幫」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大肆宣揚「按既定方針辦」。從九月十七日起，姚文元不斷打電話給新華社，一再強調要反復宣傳他們偽造的這個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

【下面是新華社記錄的姚文元的電話指示原件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九月十七日

文元同志指示：

國慶報導，強調主席囑咐的「照既定方針辦」。

九月十九日

文元同志電話：

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

(1) 「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5) 關於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

九月二十日

二時許文元同志又來電話：補充一點，以後你們要多反映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化悲痛為力量，按既定方針辦，這方面的內容。

九月二十三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們要銘記主席對我們的關懷、鼓舞（舞），堅決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文元同志三十日凌晨三時電話：

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門城樓舉行工農兵學商代表參加的慶祝國慶座談會。

內容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繼承主席遺志，化悲痛為力量，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 4. 光明日報刊登的反黨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十月二日，華國鋒同志在一個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親筆寫的指示是「照過去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錯了三個。華國鋒同志的批示，戳穿了他們的偽造。「四人幫」一方面由張春橋出面，阻止下達華國鋒同志的批示，說什麼「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另一方面，他們於十月四日用「梁效」名義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肆意攻擊黨中央。這是他們加快步伐，妄圖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信號。

【下面是用「梁效」名義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

反黨文章的影印件影印件節錄的原文】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

#### 九、「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小撮餘黨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對抗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1. 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是「四人幫」長期苦心經營，早就預謀策劃的產物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王洪文接見了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全體成員。他在講話中，以「城市民兵創始人」自居，妄圖控制上海民兵，妄圖建立「第二武裝」，妄圖把上海民兵變成「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工具。

【下面是王洪文九月十八日講話記錄（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洪文同志說：群眾對三位一體反映怎麼樣？能不能設法抓一個區總結一下，這樣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麼不能結合起來，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沒有多大問題，這個問題阻力好大呀！因為是我提出來的，有人不滿意也不敢反，上海認識上也有阻力，其實有什麼不方便。

有一點同志們要清醒，關於上海民兵是經過鬥爭的，今後還是有鬥爭的。我們要謙虛謹慎，不要翹尾巴，特別是以後是不是站得住，同志

們要注意，你們要做點思想準備，人家一巴掌打過來，看我們是否站得住。實踐上都能站得住腳，將來就駁不倒。如我們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站得住腳了，我也可以說話了。有些材料是有說服力的，如三位一體，民兵抓階級鬥爭，這些都要很好的總結。

上海這個地方要立足於自己。關於一三〇炮的問題，過去我和春橋同志商量過，還是要靠自己造，現在看來新八五站住腳了！比一〇〇的性能好。而且輕了三噸，我最欣賞的新八五是自行設計，自己製造的，比一〇〇優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揮部，要搞個編制，把武裝部的人要考慮進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揮（部）拆了，你武裝部要把全部工作給我抓起來，你抓得起來？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沒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這個機構改過去了，我二十年後還是要改過來。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還是要把它改過來。現在有人總是覺得過去的東西順手，方便，還有人說民兵抓階級鬥爭不正規化，還有人罵我們，上海搞第二個武裝集團。什麼叫正規化呢，要服從階級鬥爭的需要，要服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張春橋派肖木送口信給上海市委某些領導人，要他們「經常分析階級鬥爭的形勢」，準備真正經受「嚴重考驗」，並以講林彪為名，示意現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這是「四人幫」妄圖武裝奪權的信號，也是給他們在上海的餘黨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動員令。

【下面是徐景賢親筆記錄的肖木向上海市委常委  
傳達的張春橋意見（節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 9.28肖木來傳達張春橋意見

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馬克思主義剛出來時，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到了列寧，中國懂得馬列的也很少。現在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在世界傳播了，比起那時候來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當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

上海的工作，轉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頭，許多事讓外地去搞，我們要把工作做得紮實一些。上海不搞，別人還會拿出幾條來講你。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 2. 徐景賢的兩個反革命武裝暴亂手令

【左面是徐景賢給王秀珍調動民兵，  
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手令的影印件。】

【下面是徐景賢給上海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的調動部隊的手令的影印件。】

## 3. 「四人幫」突擊發放武器彈藥、調集物資

今年六月，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病重後，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領導人給上海民兵發武器、彈藥。八月下旬以後，突擊發了各種槍、炮七萬四千餘件，彈藥一千萬餘發。

【下面是準備武裝暴亂用的部分武器彈藥】

【下面是為武裝暴亂調集的部分食品物資】

## 4. 準備武裝暴亂使用的電臺、通報暗語、呼頻表

十月九日，「四人幫」一小撮餘黨在上海市區設立的各指揮點，架設了十五部電臺，組成兩個通訊網，晝夜不間斷地進行通聯，一直繼續到十月十五日才停止。

【下面是準備武裝暴亂使用的部分電臺】

【下面是準備武裝暴亂使用的通訊呼頻表、通報暗語表的影印件】

## 5. 反革命武裝暴亂兵力部署圖

注：上面是第二、第三道防線兵力部署圖。

右下角是第一道防線兵力部署圖。

三道防線共部署兵力三萬三千餘人。

圖內「○」表示要重點控制的要害部位、重要目標和交通要道口。

## 6. 朱永嘉關於反革命武裝暴亂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從十月八日到十三日，上海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是「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必然結果。九月下旬，張春橋曾通過徐景賢和肖木給上海傳過二次話，張對徐說：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樣有威望的領袖是不可能了，張對肖說：現在批文件與過去不同了，沒有人把關了，還說：現在比列寧去世時好，那時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過紅軍總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張的這些話無非是貶低華主席，抬高自己，以領袖自居，以斯大林自居，篡黨奪權的野心畢露，張還對徐說：上海還沒有經歷過如林彪上臺那樣的考驗，如果我有什麼事情總是要連累你們的。那就是說，如果誰要處置「四人幫」的問題，誰就是林彪上臺。怎樣才能經受這個最嚴峻的考驗，無非是舉行反革命武裝暴亂。姚文元在今年八月間，要戰後世界歷史長編提前編輯赫魯曉夫如何上臺的材料，他所指的赫魯曉夫無非是我們的黨中央。所以八日到十三日上海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就是沿著張春橋這二次講話的思想邏輯發展過來的。

上海反革命武裝暴亂的過程。八日下午三點，我去康平路小禮堂開會，會議由徐景賢主持，參加會議的有王秀珍、馮國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說：給大家通一個氣，馬天水七日去北京開會，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馬的秘書）打電話回來，說是老胃病發了，估計中央可能出事，會議就散了。另外王秀珍還要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進（金）去北京打聽消息，並約定暗號，如果情況嚴重，就說心肌梗死，同時王秀珍還對公安、民兵作了部署，準備反革命的武裝暴亂。

八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場的有徐景賢、王秀珍、馮國柱等，他們向北京打電話，探聽消息，後來繆文進（金）打電話來講老娘心臟病發了，是心肌梗死，這樣大家認為是「右派」政變，當時我跳出來說：我們得準備鬥，搞成「巴黎公社」，維持幾天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或者先發一點語錄，和赫魯曉夫怎樣上臺的材料。王秀珍在會上說：民兵已經動員了，先動員兩千五百人，三萬一千人待命，要發槍發子彈，連夜搞巡邏，還說輿論工作叫我去準備。徐景

賢和馮國柱、張敬標商量後，宣布幾項決定：一、現在開始作武裝暴亂的準備，二、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與馮國柱去民兵指揮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園，三、部隊方面要做一點工作，四、張敬標仍留在辦公室值班。

散會以後，我立即到文匯報、介（解）放日報、廣播電臺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四人幫」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決定，不發中央的消息，只發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嗎？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回寫作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準備語錄和赫魯曉夫如何上臺的材料，至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還沒有來得及討論。

十二日晚，在上海的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召集部分人員開會，這時，從各方面來的消息，都證實「四人幫」是出事了，於是又重新提出八日晚上那個方案，口號是「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要出動民兵保護報社電臺，封鎖交通要道，港口只要沉一條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機場去幾輛大卡車，便能封住跑道，還問了全市煤、電、糧的情況。

我經歷的反革（命）武裝暴亂過程，大概就是如此。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事情暴發在上海，根子是在「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上。

朱永嘉

注：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常委、寫作組負責人。<sup>31</sup>

<sup>31</sup> 根據中央文件原件列印，原題為：中共中央通知。

## 王洪文研究論文

1. 鐵驥.《周恩來與「全面整頓」》[J].黨員之友，1994，（8）.
2. 陳東林.《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自身錯誤的認識與糾正》[J].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1）.
3. 李豔君，婉君.《張春橋與「安亭事件」》[J].黨史博采，1996，（6）.
4. 張壽春.《力薦英才作棟梁——周恩來與鄧小平重新出山述評》[J].南京社會科學，1998，（2）.
5. 王玉貴.《毛澤東六選接班人》[J].黨史縱覽，1998，（5）.
6. 葉永烈.《「四人幫」興衰》採訪手記[J].黨史博覽，1999，（10）.
7. 王凡.《釣魚臺內外的江春（上）》[J].黨史博覽，2002，（1）.
8. 陳家付.《刻骨銘心的歷史記錄——十年「文革」中的十次抗爭》[J].黨史縱橫，2002，（5）.
9. 柳鈞.《毛澤東與八大軍區司令對調》[J].黨史博采，2003，（1）.
10. 斯夫.《「文革」中毛澤東提出「三要三不要」內情》[J].黨史博覽，2003，（10）.
11. 金哲.《「文革」紀事》[J].黨史文苑，2003，（5）.
12. 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五）》[J].中國糧食經濟，2003，（12）.
13. 高繼民.《江青四次發難鄧小平》[J].黨史文苑，2004，（1）.
14. 程中原.《1975：鄧小平主持各方面的整頓》[J].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2）.
15. 錢江.《劉冰上書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緣起》[J].黨史博覽，2004，（5）.
16. 張榮輝.《「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來龍去脈》[J].黨史博采，2004，（6）.
17. 程金蛟.《毛澤東和他選擇的接班人》[J].黨史縱橫，2004，（6）.
18. 煥然.《從工人到黨中央副主席躍變的「文革」神話序曲——「安亭事件」始末》[J].黨史縱橫，2004，（10）.

- 19.張仕文.《謝振華將軍蒙冤《三上桃峰》內幕》[J].軍事歷史,2004,(6).
- 20.餘煥椿.《「文革」中輿論導向的扭曲(下)》[J].百年潮,2005,(3).
- 21.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J].黨史博采(紀實),2005,(6).
- 22.《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J].黨的文獻,2005,(4).
- 23.王勇.《馬天水夢斷上海灘》[J].黨史天地,2006,(3).
- 24.金鳳.《王洪文、王效禹採訪追記》[J].炎黃春秋,2006,(5).
- 25.霞飛.《「文革」發跡前的王洪文(上)》[J].黨史博采(紀實),2006,(8).
- 26.霞飛.《「文革」發跡前的王洪文(下)》[J].黨史博采(紀實),2006,(9).
- 27.霞飛.《陳阿大沉浮錄》[J].黨史博覽,2007,(6).
- 28.霞飛.《「安亭事件」中的張春橋》[J].黨史縱橫,2007,(11).
- 29.霞飛.《王洪文的「小兄弟」陳阿大沉浮錄》[J].文史博覽,2008,(2).
- 30.陳抗美.《王洪文挨「鬥」記》[J].文史博覽,2009,(5).
- 31.葉永烈.《「文革」中是誰向毛澤東推薦了王洪文》[J].蘭台內外,2010,(4).
- 32.李海文,蘇承業.《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四人幫」餘黨覆滅記》[J].文史參考,2012,(9).
- 33.金光耀.《一個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記錄——從葉昌明的《工作筆記》看「工總司」》[J].書城,2013,(1).
- 34.楊孟衡.《三上桃峰》五易其稿[J].炎黃春秋,2013,(12).



##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48. 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4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50. 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51. 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52.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54.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55. 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56. 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57.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 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60.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61.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62. 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80.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1.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2.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 83.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4.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5.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 8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 87.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 8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89.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 90.[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1.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2.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3.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4.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5.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6.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112. Ross, Jatnes R. (James Rodtm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113.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4.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115. 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116. 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117. 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118.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119. 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0.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 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22. 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123. 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124. 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125. 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1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7. 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128.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129.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13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 141.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142.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 143.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 144.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 145.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 146.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 147.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 148.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 149.「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 150.《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 151.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 152.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 153.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 楊健采寫, 《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t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 174.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75.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 176.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 177.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0. 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1.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19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3. 張志明，《走出迷穀——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194. 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195. 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6. 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197.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198.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199. 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200. [英] 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1. [英] 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2. 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203. 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204. 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205. 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206. 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207.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208. 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元元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209.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0. 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2.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213. 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4. 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5. 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6. 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217. 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218.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219. 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0. 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221.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2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223. 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224. 中嶋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225. 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22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2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2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29. 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3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231. 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32. 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33. 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234. 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5. 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36. 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237. 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238. 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239. 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267. 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273.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274.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275. Escherick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276. 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277. 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278. 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279. 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280. 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281.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282. 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3. 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284.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5.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6.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287.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288. 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289.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290. 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291. 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292. 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293. 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294. 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295. 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296. 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297. 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5. 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6. 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7. 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8. 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9. 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320.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21. 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322. 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2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324.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325.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326.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360. 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361. 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362. 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363. 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364. 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65. 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66. 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67. 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68. 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369. 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370. 嚴永西，《多味人生一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71. 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72. 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73. 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74. 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75. 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76. 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sup>32</sup>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sup>33</sup>他

<sup>32</sup>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sup>33</sup>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檔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sup>34</sup>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ld/ljld/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ld/ljld/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sup>34</sup>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王洪文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5  
冊；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9-10)  
BOD版  
ISBN 978-986-92955-4-3(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5-0(下冊：平裝)

1. 王洪文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4641

文革風雲叢書09 PC0486

##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 王洪文與「文革」（上）

---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責任編輯 / 杜國維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楊廣榕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5月 BOD一版  
定價：4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2955-4-3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在各條戰線上，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迅速地掀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的新高潮。堅決做到，緊跟毛主席，永遠幹革命，海枯石爛，紅心不變。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一條真理：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就要失敗，這個拿鮮血換來的經驗，我們廣大的工人階級永遠不能忘記！

王洪文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發言  
(1969.4.14。節錄)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時間跨度為1967-1976年，收錄王洪文的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下冊時間跨度為1977-1981年，收錄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以及特別法庭判決書等。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王洪文藉由群眾暴政獲得提拔任用，最後被捕監禁的史實。